

專題報導：
學而「實習」之

——113學年環境規劃設計實習一

城

鄉

通

訊

NO.

39

八月號

AUG.2025



目錄

編輯室報告

..... 1

專題報導

前言
..... 2

上學期成果總結
..... 3

老師寄語
..... 5

NTU-K-BP臺大附幼與臺大的(不)斷裂
..... 8

快閃事務所：城鄉所搬遷及規劃設計
..... 14

〈滯留／流〉：洲美、社子島與區段徵收的
張力與辯證
..... 20

〈蘭城排練中〉從演藝廳看見地方文化的
空間表現
..... 26

回顧臺大城鄉所實習課：傅柯視角下的
工綜館搬遷計劃
..... 32

傅柯的空間與權力分析：
以實習課的宜蘭演藝廳策展實作為例
..... 36

教職員動態

理論、實作與很多溝通：實習課與參與式
設計的基礎——劉可強老師專訪
..... 38

劉可強老師回應〈傅柯的空間與權力分析：
以實習課的宜蘭演藝廳策展實作為例〉
..... 45

以參與式設計作為信仰
——劉柏宏老師專訪
..... 46

校友涸流

規劃的原點：施佩吟學姐專訪
..... 52

跨域實踐與學術歸鄉：陳盈棻老師專訪
..... 57

活動紀實

《困難東亞：重構日本帝國殖民地
刑務所記憶》書籍發表會
..... 64

城鄉評論

東本願寺——獅子林：
不義遺址中錯置的鬼魅
..... 66

翻牆地景到逃逸地方：
建中翻牆文化的反叛與劃界
..... 71

行為藝術的臨時性空間生產和微觀政治：
「相同但不同」2025春分集體行為分析
..... 78

BP's Picks：靈感清單

..... 82



初入城鄉所的重要回憶，莫過於屬於同學們必經過程的「實習課」了吧？除了要跟來自不同背景的新同學們針對特定議題或場域進行規劃與構想，其中所共同經歷的凝聚、共識、不解或齟齬，更是許多同學如今仍可細數的重要求學歷程。

本次八月號的第 39 期城鄉通訊，以紀錄本屆 (R13) 實習課的成果為主軸。本次實習課用了一學期的時間嘗試以「模組式」和滾動式調整的教學方式進行，R13 的同學在上學期經歷過三次打散分組，並各自處理「工綜館空間改造」這個大題下的三個子題模組。而在下學期則是拆分為三個大組，用一個學期的時間深入探討負責主題，每次的分組與轉換不同討論場域，都對同學們來說是個大挑戰，更是大家研究所一開始的新奇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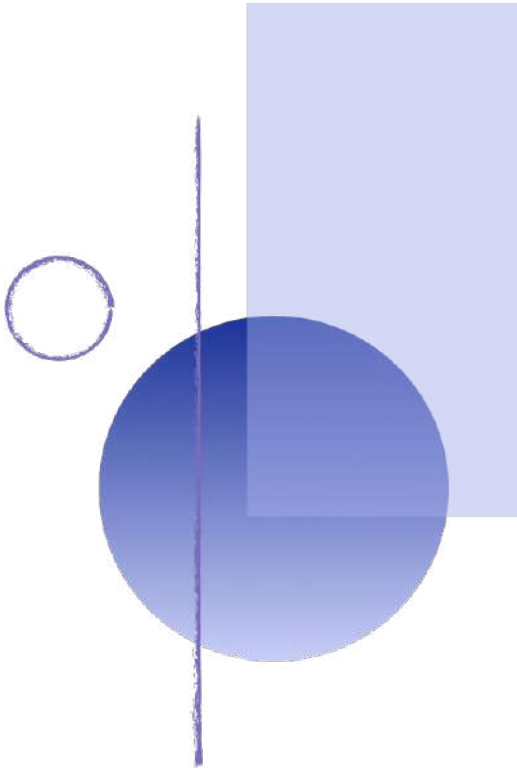
學而「實習」之，真的「不亦樂乎」嗎？在同學們體會緊湊的規劃進程下，確實激發了大家的技能跟協調能力，但過程總是伴隨了各種的酸甜苦辣。而對於課程規劃方式的評價，也一如過往的眾說紛紜。第 17 期的編輯群在回顧 106-108 學年間實習課改革時如此寫道：「即使有明確的目標，但卻難有完美無缺的手段，尤其因應社會環境的變遷與資源的限制」。課程模組化的改革在過去曾引起所上老師間的討論，而部份系所的模組化課程規劃在強調混搭之外，也會更強調對應的專業能力，讓學生更有方向的探索。如果這學年的類模組化設計是一場未完成的實驗計畫，它是前進、停滯抑或倒退？我們希望透過多個深度專訪，嘗試把實習課一路走來的過程以拼圖的方式呈現，了解這些領舵手希望帶著我們這些第一次上路的船員前往怎樣的目的地，邀請大家從前人經驗中思考實習課、城鄉所價值、專業通才與參與式規劃可以有何種面貌，也透過各組的成果總結和投稿感受這一門課的五味雜陳，然後再行定論。《城鄉通訊》的指導老師王老師說我們選取了一種溫和的方式去述說實習課，現在想來這可能也算是一種溫和的批判。

除了訪問實習課指導老師林家暉老師與劉柏宏老師之外，本期也邀請了劉可強老師分享相關經驗，另外從琢允、庭誼同學的投稿中，可以看到同學

如何嘗試回應並挑戰這樣的課程設計。在「校友洄游」中，我們邀請了曾擔任實習課評圖老師的陳盈蓁學姊，以及從事規劃專業並曾在實習課分享的施佩吟學姊，兩位學姊從求學生活到畢業後都與空間密切相關，從而串連起過去到現在的實習經驗。此外，曉渝的投稿也呼應了實習課的策展藝術的主題，帶我們看到另一種藝術形式背後的權力流動。當然，本次更有軍皓和挺之的投稿帶我們看到獅子林作為不義遺址，以及建中生翻牆地景等有趣的空間議題。最後，本所的黃舒楣老師也於近期出版新書《困難東亞：重構日本帝國殖民地刑務所記憶》，因此也藉由新書發表會的側記，為本期內容增添豐富度。

第 39 期為新編輯團隊的初試啼聲，我們嘗試於本次呈現出關於實習課空間規劃的成果以及伴隨課程而生的討論與經驗對話，對我們而言，或許這也算是一門實習課。若有任何疏漏與指教，還請各位讀者不吝與我們告知。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5.08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No. 39 AUG. 2025

.....

創辦人 畢恆達

發行人 康旻杰

指導教師 王志弘

本期主編 曾曉渝

封面製作 宋燁博

美術編輯 宋燁博、曾曉渝

文字編輯 宋燁博、林彥彰、紀懷超
張維哲、曾曉渝
(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列)

投稿請洽：thentunews@gmail.com





▲ 評圖現場 (攝影：陳彤〔圖左上、左下及右下〕、鄭羽芳〔圖右上〕)

前言

在上學期，實習課以林家暉老師為召集人，與康旻杰老師、劉柏宏老師的組成教學團隊，深化 R11 學長姊對工綜館空間改造議題的關注及建築師其後統整的初步方案，透過模組化的課程設計，帶領新的同學循序漸進地探討系館改造下的三個不同卻又相互呼應的系館空間議題，順序為：城鄉所空間性格、廁所空間與桌椅的細部設計發想、工綜公共空間的規劃設計。下學期，劉柏宏老師則延續了上學期奠下的基礎，帶領大組同學持續參與系館改造，試著在搬遷的過程中以使用者的視角與多元的規劃途徑，構思出擁有城鄉所 DNA 的系館空間。林家暉老師大組則將視野轉換至臺大附設幼稚園，同學們化身「大哥哥大姐姐」進入了幼兒園，除了

跟園方討論需求外，更透過密集的課程參與，在童稚的互動下理解孩子們的想法，在這場冒險下，沒有劇本，但卻充滿著驚奇。康旻杰老師大組則是以策展為主題，分別拆成兩小組討論了宜蘭演藝廳、洲美聚落與社子島的空間議題，小組成員分別將宜蘭演藝廳獨特的三面式舞台再現到工綜館大廳，並將展覽場域融入宜蘭的各種非正式排練元素，讓觀者彷彿也參與了空間的排練。另外，洲美與社子島小組將盤踞兩地的區段徵收、都市開發辯證議題帶到了臺大校園，開展了為期一週的展覽，透過密集的田野調查以及邀請重要行動者的對談論壇，帶領大家理解兩地的空間進行式。

上學期成果總結——林家暉老師

◎ 訪問及撰稿：宋煒博

113 學年環境與規劃設計實習—
主要召集老師

「其實在我接這一年的實習召集之前，所上老師們已經有過一番討論。」林家暉老師回憶道。這番討論反映了實習課在多年教學過程中逐漸產生的問題：對參與教學老師們造成的負擔、跨領域學生組成在空間專業知識上的不平均、如何讓不同背景的共同教學老師有效協作，以及減輕師生雙方在團體操作中的工作量重疊等問題。

上學期的教學策略：刻意的混亂

林家暉老師採取了一個相當大膽的策略——刻意在上學期創造一個相對混亂、快節奏的學習環境。「我的做法是去壓縮這些負擔，強化我們想要達到的訓練目的。」他解釋道。

這種策略的核心在於，透過上學期的緊湊步調和複雜情況，讓學生快速進入狀況。林家暉老師強調，上學期的訓練是期待讓學生能夠熟悉彼此、了解老師們的教學個性，並且無論是否具有空間專業背景，都能快速進入 Studio Based 課程的高壓力環境。這種刻意創造的混亂並非毫無目的，而是一種「濃縮」的過程，目的是讓大家建立出默契或共識。林家暉老師坦承，這種做法確實會讓同學感受到溝通或教學銜接上的張力，但這些都是課程規劃初期就已經預期的結果。例如有同學反映在處理搬遷這一龐雜議題時較難找到著力點，或是做了許多前期調研，但不知如何運用到成果發表上等等。這些都是隨著課程進行而發展出的實質問題，老師們也盡量試圖配合調整。

本學年上學期實習課面臨了所上搬遷的特殊挑戰，使得課程必須承擔雙重任務：既要完成教學訓練，又要回應搬遷議題。林家暉老師認為，由於搬遷至今仍是進行中的狀態，「以搬遷為目的的實習課，它的目標是否達成，現在還很難檢視」。

教學過程中的深刻觀察

林家暉老師對整個教學過程有著深刻的觀察，特別提到了三個令他印象深刻的面向。

首先是「不停持續滾動的協調」，這種協調存在於不同形式、不同張力、不同相互關係之間，是實習課教學過程中最為顯著的特徵。無論是學生之間、師生之間，還是與課程命題之間的協調，都構成了實習課教學的核心動力。其次是「永遠都會有突發或偶然的狀況」，這是 Studio Based 訓練的特殊性。突發狀況會在各種面向中出現：分組過程、師生互動、個別學生的專業背景差異，甚至是私生活與學習壓力的



▲ 林家暉老師在實習課 (來源：附幼小組)

衝突。第三個面向是實習課需要處理的「複雜性」，這種複雜性不僅來自空間規劃訓練的技術層面，更重要的是要回應城鄉所的核心價值：通才訓練、民主式的溝通手段、參與式規劃等傳統，該如何體現在教學中。

上下學期的設計邏輯

林家暉老師特別強調，上學期的設計是為了下學期而鋪陳的。這種設計邏輯體現了他對實習課整體規劃的深度思考。

「如果沒有上學期一個複雜、快節奏的整合，我認為下學期不會有這麼實質的進展。」林家暉老師如此評價這種設計邏輯。透過上學期的密集訓練和適應過程，讓學生能夠在下學期更好地發揮自主性和創造力。下學期採取分三組的教學模式，每個老師對自己的小組都有較強的自主性。這種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上學期建立的基礎。許多老師和所上的觀察都認為，這一屆學生在下學期的實作成果表現亮眼，在近年來的實習課成果中相當突出。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在人際互動和協調能力方面，各個大組內部的團結與和諧，也較以往實



▲ 林家暉老師在實習課（來源：附幼小組）

習課中常見的人際張力有所不同，這展現了本學年城鄉所強調的溝通協調能力培養成效。

結語

113 學年度的「環境與規劃設計實習一」展現了課程設計的複雜性。任何課程設計都有其利弊得失，好壞各有判斷標準，這是教育實踐中不可避免的現實。正如林家暉老師所體現的，課程設計總是需要不斷調整，沒有一成不變的完美模式。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持續調整的過程中，是否真正能夠汲取並傳承城鄉所多年來累積的寶貴經驗。實習課作為必修課程的核心價值，不僅在於技術層面的訓練，更在於如何將所上的傳統精神——通才訓練、民主式溝通、參與式規劃等理念——在時代的變化中得以延續和發展。

本學年的實習課證明了在維持傳統價值的同時，課程結構是可以具有彈性調整空間的。展示了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下，通過精心設計的教學策略，在傳承與創新之間尋找平衡點。儘管過程中必然伴隨著各種挑戰和爭議，但正是這種勇於嘗試的精神，為這門具有深厚傳統的課程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未來的發展開啟了新的可能性。

老師寄語



► 林家暉老師



113 學年度所內碩一必修的「環境規劃設計實習」課程由我擔任召集，並與康旻杰老師及劉柏宏老師共同授課。本次實習課程上學期以所內搬遷議題為主軸，下學期則由三位老師各自命題，並各自指導一個大組進行規劃。我所帶領的大組以「空間觀點下的參與式規劃實踐」為題，透過與臺灣大學附設幼兒園的教學方案合作，進行反思與設計。

一學期的規劃實作分為幼教課程參與、規劃討論、規劃聯展交流及成果整合等階段。在幼教課程參與方面，同學們定期參與台大附幼的課程活動，與幼兒及園方教師進行協作與互動，並於期中和期末與附幼教師共同召開整合會議。在規劃討論層面，同學們定期撰寫參與日誌，反思田野

觀察並融入理論進行檢視。課程成果亦在整合後參與本屆全國規劃系所聯合展覽，並獲得佳作的肯定。最後，同學們綜合課程所學，分別以空間實作、圖像再現與桌遊轉譯等方式，展現並檢視各自的規劃論點與想像，成果豐富而精彩。

相較於過往的實習課題與操作模式，本屆課程在設計與執行上更具複雜性與革新性，對同學的適應與投入都提出了新的挑戰。作為召集教師與命題指導者，我深切感受到同學們的實質蛻變，特別是在專業溝通、批判性思維以及空間轉譯能力方面，都展現了明顯的成長。經過一整年的觀察，我欣喜地看見他們逐漸體會到所上對空間規劃的堅持與關懷，也看見他們成長為更成熟且具有批判視野的專業規劃者。在課程結束並邁入研究論文階段之際，我衷心祝福同學們能延續這一年累積的韌性，結合日益成熟的專業知識與技巧，持續在這條道路上發光發亮。



► 劉柏宏老師



參與式設計在臺灣雖然已蔚為風潮，但我們必須警覺，許多實踐只停留在表面。臺灣人常說「最美的風景是人」，但這往往流於口號。許多人學會了參與式設計的工具，卻忽略了最核心的元素——溝通。

溝通不只是聽取意見，更重要的是要能說服他人接受正確的普遍性價值。當前我們的民主雖然朝好的方向發展，但細緻度和深度一直不夠。如何改變這種狀況，是我們應該承擔的任務。

在城鄉所的訓練中，學生要學會看到這個問題——不是說參與式設計不好，而是要深入理解參與式方法的深度與核心在哪裡。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材料、工具和方法來應對各種挑戰。面對不同的社群和社區，需要不同的溝通策略，這需要我們有判斷力，才

能讓事情往好的方向發展。

快閃不是永遠存在的，它是大家在共同的空間或理念下，讓事情更有亮點、更有新鮮感，大家一起努力在那個時間裡盡力把它做好。我在課程中也安排一些我覺得應該非常放鬆的環節，像喝咖啡、吃飯等等，其實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讓同學們用最開心、最喜歡的方式，來理解我一直讓他們練習的，參與式設計的方法跟精神，雖然時間不夠，但希望讓參與式規劃設計的精神得以讓同學認同。



▲ 康旻杰老師 (攝影：黃琢允)

2025 實習一下，我主帶的大組承接了工綜館改建計畫的一個實驗操作，嘗試將過往實習課及城鄉基金會的空間—社會實踐展示於未來的所館。當代的機構展覽大多是特定策展論述下，透過作品(work)再現生活世界萬象及藝術世界想像的過程和場域。作品及展場的形式美學是展覽無可迴避的命題，但城鄉所有限的所館空間並非封閉、視覺美學優先的白盒子，其中展出的「作品」具很高程度的檔案性格，或田野地層豐饒、或社會議題鮮明、或批判立場尖銳、或社區交陪深刻，即使回到城鄉所異地再現，從檔案詮釋、篩選、編輯、田野重返、展出，無一不政治。因而關於再現的詩與政治之動態交錯，成為學生策展的核心挑戰。

經由實地現勘後，選擇再現洲美與社子島實習成果的小組，以「滯留／流」為策展主題，辯證基隆河兩岸同因區段徵收開發爭議、長久懸宕於禁建和非正式蔓延狀態的傳統聚

落地景，如何從閹限門檻的兩端被迫進入與之截然對比的都市，而歷年的實習課又如何介入兩地不同階段的田野掙扎與行動。選擇宜蘭演藝廳的小組，則由關鍵角色訪談、大量規劃設計檔案的梳理，探討當年城鄉基金會如何具體操作模式語言及參與式設計方法論，打破鏡框舞台的劇場框限，再藉三面式舞台的開放形式，重新定義演出者與觀眾間的相對關係。小組提出「蘭城排練中」的策展論述及展覽空間調度模式，企圖以「排練」所象徵的非正式演出動態，回應落地掃的設計初衷，並對映演藝廳與舊城南緣的生活鏈結。小組始終認為，演藝廳的機構圍牆並未阻隔它與蘭城的內外關聯，演藝廳的活力仍緊扣著周遭街區的日常。

雖事與願違，工綜館的修繕趕不上實習一的進度，兩組各自靈活地找到合適的場域，並以極低的預算完成展覽。「滯留／流」在活動中心為期一週的展示計畫，不僅再現了多年實習課積累的地方實踐，更首次跨河串連了洲美社子島的滯／治洪命運和抵抗政治。「蘭城排練中」則將工綜入口大廳瞬間轉化成穿越內外的「鏡像」三面式舞台，甚至從二樓到地下室的梯間另闢蹊徑，揭露演藝廳鮮少曝光的後台及貓道場景。二十八年參與規劃設計最深的劉可強、陳育貞、慕思勉老師化身舞台中的演員，與置身觀眾席的評圖老師及同學，在詰問與對話中共同完成一次關於演藝廳的批判式演出。我想到詩(poetry)的希臘字源 poiesis，其實更接近 making 或 bringing into existence 的浮現(emergence)過程。兩組兼具創意及論述的展覽計畫，由城鄉所出發，最終回到城鄉所的「再現」(representational)空間，正是一次直面再現的詩與政治的精彩行動。



NTU-K-BP 臺大附幼與臺大的(不)斷裂

◎ 編輯：曾曉渝

01

指導老師：林家暉老師

組員：宋燁博、施毓璿、陳彤、黃宇韜(海豚班)；張維嫻、許家豪、劉安哲(企鵝班)；張哲誠、曾曉渝、雷淑德(花鹿班)

基地簡介：位於臺大校園中的幼兒園

一、現況概述

臺大附幼為私立幼兒園，隸屬於「財團法人臺灣大學校園建設基金會」，主要服務臺大教職員工子女。園內設有海豚班、企鵝班與花鹿班三個混齡班級，現有教師 7 名，在園孩童約 80 名。強調親師共育，戶外活動空間寬敞，面積甚至超過室內空間。

臺大附幼位於臺大校總區內，鄰近公館商圈。校園面積約 2,515 平方公尺，其位於臺大校園內，可充分運用其多元空間與資源，作為教學支援。

二、組織文化與教育實踐

附幼於 1996 年設立，比起智育發展，更強調「情意教育」與「品格教育」。教師團隊透過協同教學建立高度互信的合作機制，園長從領導者轉為支持的「園長媽媽」角色。教學著重人格與社群互動養成，「大小手」制度幫助新舊生建立情誼，同時附幼也促使家長形成支持網絡。另外，從招生簡章標語「我們為孩子提供舒適如家的環境」，可見其組織精神對附幼空間環境的影響。



▲ 規劃範圍說明圖
(來源：實習課臺大附幼小組)

議題關懷：各種不連續性／斷裂性

在臺大附幼中，最顯著的議題便是充斥於時空與行動者間的各種「不連續性」／「斷裂性」。時至今日，即便我們能看見附幼努力地為孩童創造適合其成長的「教學—環境」，但仍有不少矛盾、衝突與斷裂混雜其中。

一、物理不連續

在環境上可顯而易見地觀察到附幼以實體的外牆、大門及森嚴的門禁系統來區隔內外。考量到臺大附幼位於大學校園內的特殊性，這種物理區隔造成的封閉性及內外交流阻隔，

可能導致臺大校方在進行校園空間規劃時，忽略附幼之存在。在身體尺度上，我們則發現附幼環境內部也有因為成人與孩童的身高差異而產生的張力。

二、感知不連續／斷裂

對於附幼教學團隊而言，臺灣大學是其教學設計的重要背景與資源。附幼亦常將臺大的環境帶入其教案之中，比如以臺大的植物種類、著名景點作為教學主題。然而，教案對臺大的導入僅止於此，背後之脈絡常在教學中被抹除，遂無法幫助孩童更深入理解這些臺大空間及資源與其之關聯。

三、彌合斷裂：從課題辨識到規劃標的設定

因此我們基於對「參與式觀察」與「兒童視角」的重視，希望將問題更積極地界定為：我們如何協助附幼在現況中更進一步，在空間專業中探索彌合附幼不連續性／斷裂性之可能，使附幼教學團隊與孩子們共同實踐出更好玩的附幼環境？

三、基地歷史沿革

1950-70 年代的附幼校地曾是美軍空軍基地。1966 年被駐臺美軍接收，1978 年臺美斷交後臺大收回土地。建築留有翻修痕跡，圍牆上的流刺網與幼兒園氛圍格格不入。厚重圍牆、隱蔽大門及外圍停車場，讓附幼在臺大校園內宛若「飛地」般封閉存在。



▲ 臺大附幼全區配置圖

行動方案：參與田野—規劃設計作為方法

一、全員會議

為促進討論效率及內容深度，本組曾舉辦一次全員會議，了解園方目前的困境及疑問。本組於會中邀請附幼老師以成人視角指出目前附幼需要改善的空間及課題，此次使用者意見蒐集成為我們後續規劃設計的重要成人視角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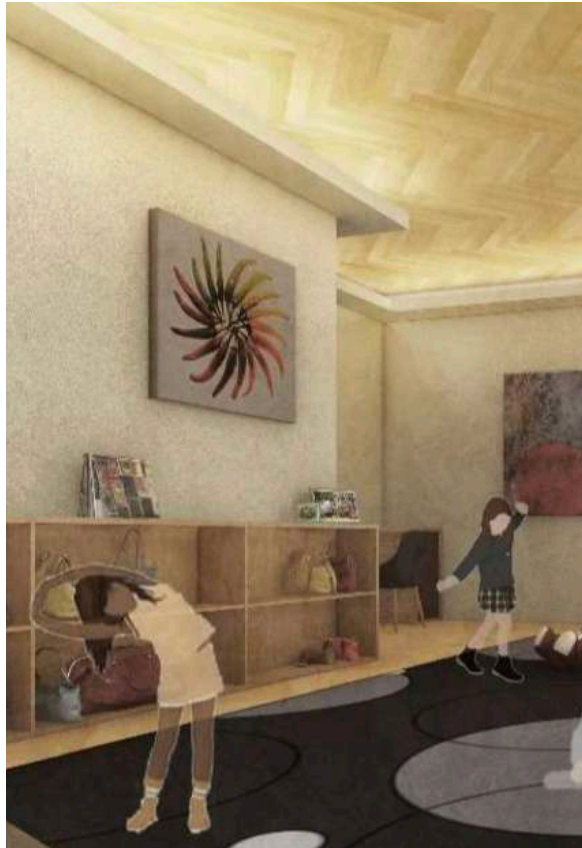
二、整體環境規劃設計提案

在田野參與後，我們回到自身的空間專業，嘗試以規劃與設計作為方法，回應田野中觀察與蒐集到的各類課題。我們發現教室內尺度配置、園區與外部空間的銜接、人行通學動線與公共設施皆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適配。

(一) 室內空間：創造平衡與互動的學習環境

方案一 | 重塑教室動線與尺度

針對現有教室空間，本組以「尺度的平衡」與「互動動線的最佳化」為核心，重新調整教室結構與使用邏輯。將主要出入口配置於教室中央，使孩童進入教室後，自然集中於核心空間。動靜態活動區依「功能性質」整合配置，並增設成人尺度桌椅。



▲ 企鵝班教室內部

方案二 | 閒置空間再生

我們將其重新構想為「探索玩聚場」——一個多功能的彈性活動空間。此空間既支持日常教學活動，也可轉化為孩童的創作與策展場域，實踐《兒童權利公約》第 12 條所保障的表達與被聽取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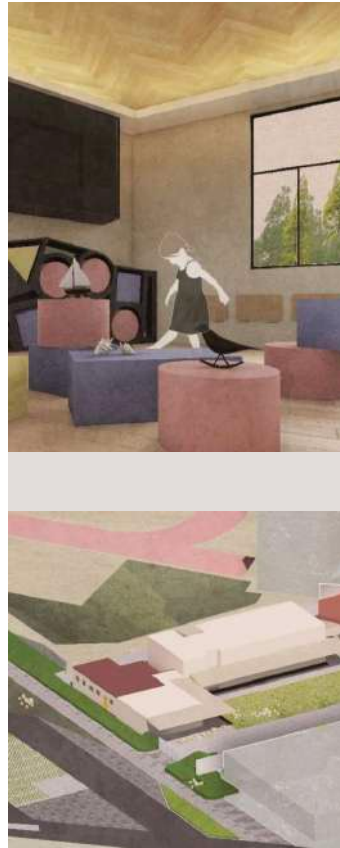
(二) 室外空間：童趣遊樂與自然親近的身體探索

方案一 | 行人友善空間

將附幼入口前方的部分停車位轉化為行人友善空間，並以植栽帶圍塑步道界面，使園內的綠意自然向校園延伸，串聯附幼與臺大之間的景觀系統。

方案二 | 模組化家具設計

我們提出以邊長為 30cm 的方塊箱子作為基礎零件，既滿足孩童自由堆疊、建構遊戲的需求，又能透過組合轉換成成人可使用的桌椅。這樣的設計打破了傳統罐頭式家具的單一性與固定性，讓行動者



都能依情境自由定義空間。

方案三 | 活化圍牆邊界

針對圍牆周邊高差明顯但空間利用不足的現況，將此區域改造成草皮斜坡。斜坡表面嵌入攀爬網、攀岩點及小型溜滑梯，形塑出一座結合大肌肉活動的遊戲坡地。

(三) 附幼園區外：打破界限，將附幼帶入城市互動之中

出於安全考量，孩子們的日常移動往往受限於大人的安排，同時孩子走出幼兒園後面對的多是為成人設計的城市環境。本組希望以臺大附幼為起點，重新檢視孩子在城市中的參與可能，從園內到園外，從校園到社區、再到城市空間。透過空間改造設計，期望化解邊界阻隔，讓孩童能真正參與城市生活。

方案一 | 情感展亭

我們設計了多座位於附幼後方圍牆的開放式展亭，展亭以半開放結構與透明材質為主，讓孩童的作品、聲音與活動自然流露至大學校園。

方案二 | 童趣步道

針對附幼外羅斯福路側人行道，鋪面以鮮明色彩引導不同用路人的步行動線，透過插畫式

標誌直觀分辨行人與自行車空間。分道方式更運用景觀植栽形成巨大化標誌意象，以視覺、尺度與氛圍自然區隔，將危險感稀釋為親和感，讓孩子建立與城市空間正面的身體記憶。



▲ 附幼園內室外部分改造



▲ 展亭與天橋部分改造

方案三 | 天橋再生

將原本只是「通道」的天橋，重新打造為孩童與成人都願意停留、互動、創造回憶的「目的地」。設計上，四面以透明玻璃帷幕圍合，橋面則置入移動性遊具。

三、各班實作挑戰

除了整體環境的規劃設計提案外，我們也希望讓自身的空間專業與幼教專業進行更深入的對話，於是三小組分別在三班既有的教案脈絡下，找出更多空間專業者參與的可能。

(一) 企鵝班：地圖認知體驗與建構

企鵝班本學期的主要學習主題為「美食探險家」，藉由在臺大校園中行走，尋找校內與美食有關的建築物進行記錄，並由老師介紹沿路的重要記憶標的物。我們參與的一次園外散步中，觀察到老師透過標的物如地質系館、翹屁股的樹等，引導孩童辨識與記憶，建構孩童地圖上的點。對年幼孩童而言，空間的認知多是碎片化、點狀而非線性與整體的，老師因而選擇在特定地點駐足說明，讓孩童將地點內化成「記憶地標」。活動結束後，老師帶領孩童製作他們認知中的地圖，但連結的線條尚只呈現地標出現的順序，而未有實際距離、轉彎等細節資訊。我們則嘗試優化，製作可操作的摺頁式互動地圖，希望將碎片化地圖與



▲ 各班實作

精確地圖的優點進行結合，分別為「塗鴉區」、「實際路線區」、「文字敘述區」及「路線繪製區」。

(二) 花鹿班：Kevin Lynch 城市意象與幼童實作教案開發

我們以花鹿班中小班孩童作為教具設計的主要對象，設計一系列結合空間認知、繪圖實作與桌遊開發的課程。整體構想源自城市設計師 Kevin Lynch 在《城市的意象》中所提出的空間意象理論。透過簡化後的五個城市構成要素——路徑、邊界、區域、節點與地標——轉化為幼兒園適用的課程架構與遊戲素材。課程分為兩階段：「我的附幼地圖」繪製課程，孩童展現出驚人的空間感知力與敘事能力；其次將孩子們繪製的圖像轉化為「校園大迷宮」桌遊，卡牌分為植物卡與地點卡，每張卡背後附有與校園五感學習相呼應的問答題目。本次計畫嘗試將 Kevin Lynch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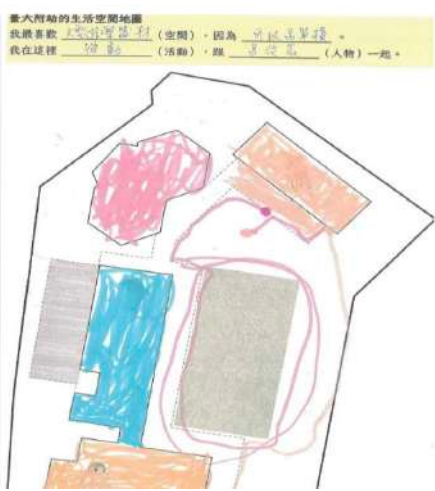
城市空間意象理論，轉化為適齡化的幼教實作內容，並透過繪圖與遊戲設計，促進幼童對日常空間的認識與情感建構。孩童在遊戲過程中與他人互動、分享記憶，進而加深對校園的認同感與參與感。

(三) 海豚班：「展亭」空間裝置設計

「迷宮」作為海豚班孩童認識環境的教案，其實踐過程不僅與孩童創作有關，也涉及家長的參與。以迷宮教案結合附幼面臨的「不連續性」議題，海豚班小組提出「展亭」的空間裝置設計實作計畫。展亭的概念在空間規劃層面上探討了園區內外的不連續性如何被化解。考量現實施作無法打除圍牆的條件，我們利用附幼園區久未開啟的後門，作為模擬園區與台大校園連結可利用的破口。展亭對附幼而言，重要之處在於展覽機能的實現，配合孩童學期成果發表的活動，城鄉所學生以展亭之物質實踐介入教案的成果發表。展亭不只是規劃專業對空間不連續性學術理論的反思實驗，同時也是社區參與空間生產的實踐。

成果總結：沒有劇本的田野冒險

本團隊透過為期三個多月的「沒有劇本的田野冒險」，從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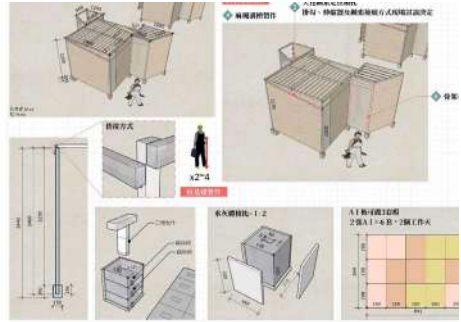
▲ 孩童製作之地圖

▲ 「我的附幼地圖」學習單

初的迷茫、被動觀察，逐漸學習與田野中的人（孩童、教師等）互動協商，並淬鍊出對「兒童視角」的覺察與省思。帶著這樣的覺察，團隊重新審視臺大附幼及其周遭環境，逐步定義問題、確立目標，最終透過規劃設計作為方法反饋田野，展現從觀察學習的「田野參與」再到設計介入的「參與田野」蛻變歷程。同時三個小組在每班特定教學脈絡下，逐步找出空間專業於幼教場域的著力點，並透過實作進一步深化學習。

回顧與反思：幼教場域中的規劃行動者

回顧整學期的實習歷程，團隊從理論走向實踐，從觀察學習者轉變為試圖在幼教場域實踐空間專業的「規劃行動者」。這不僅深化了團隊對空間專業知識的理解與應用能力，更重要的是，讓團隊體認到規劃設計的核心在於對「人」的關懷以及對真實需求的細膩回應，特別是如何在成人主導的世界中，看見並尊重兒童的空間權利與獨特視角。



▲ 展亭設計施工圖、迷宮展亭成果發表活動

引言：把視角拉回校園

過去的實習課主題，時常帶領著所上同學走出課堂，在不同尺度的空間與議題上，進行田野調查與規劃設計。而這個學年的 R13 實習課，將視野重新回到了最熟悉（也可能是不甚熟悉）的城鄉所空間。適逢「城鄉所搬遷工程」，工綜館的一到三樓將會逐漸轉移為城鄉所空間，在過去所上曾經經歷過大大小小，攸關拆與留的「流離史」，不論是上學期每個小組都對於城鄉所不同空間進行了歷史爬梳與空間規劃，抑或是下個學期有我們作為專門的大組，以一個學期的時間，參與了城鄉所搬遷至工綜館的規劃設計過程，大家都在思索著從流離到定著的空間轉換，該如何定義、設計、規劃出屬於城鄉所的系所空間。因此，由劉柏宏老師、陳佩汝助教還有十位同學組成的實習課規劃團隊「快閃事務所」於焉組成，藉著以參與為核心，發掘系所真實空間需求並融合「城鄉所的 DNA」，提出具有批判性跟開放性的空間提案。

分析：工綜作為規劃基地

目前的城鄉所處於工學院的中間地帶，兩側建築分別是工學院綜合大樓主體建築與工學院綜合新館（亦稱：機械新館），而城鄉所身處兩者之間，為不同系所移動穿梭的過渡區域。從外部環境來看，城鄉所處於第一活動中心（以下簡

02

快閃事務所：城鄉所搬遷及規劃設計

◎ 編輯：張維哲

指導老師：劉柏宏（助教：陳佩汝）
組員：王芯玫、王挺之、林辰韋、林庭誼、張博鈞、陳睿奕、彭軍皓、劉亭妤、柳瀨葵、北原史香

稱：一活）的正對面，許多同學會直接橫跨工綜館穿廊前往用餐，因此在中午與傍晚兩個時段，有許多其他科系的學生途經工綜館一樓空間，特別是在南北向的短軸路徑。因此，我們認為這個區域可視作城鄉所最容易與外系所對話的空間，未來亦有發展成「城鄉所入口意象」的潛力。

而從現況來看，工綜館北側外有一小廣場（面對心裡系館側）是「城鄉所繫」門牌所在地，我們認為此區可視作城鄉所與外部環境還有校園對話的潛力場域。但我們也發掘此區同時作為工學院的卸貨區域，因此在空間需求交疊可能面臨衝突之下，需要重新規劃。另一側，則是工綜館西南側入口以及一樓大廳空間，原先雖是作為主要出入口，然而因為外部被機械系展覽館所遮擋，動線受阻後反倒成為了較

為開闊的空間，目前此空間雖歸屬於城鄉所，但因其大廳的寬闊設計仍然具有公共性、開放性，因而可以成為城鄉所與工學院的互動空間，同樣具有共享與展演潛力。最後，以工綜館的空間進行動線分析來看，三層樓的主要動線皆為中央的長向走廊，雖會有外系所的學生路過，但經過實際觀察下，其實數量很少；相對地，一樓的短向路徑，反倒是作為主要出入



▲ 工作坊實作狀況（攝影：司馬）



▲ 工作坊實作狀況（攝影：北原史香）

口路徑，較常有外系所學生路過。此外，城鄉所在工綜館有兩個主要上下樓動線：其中一個即位於上述主要出入口區，由電梯與安全梯間構成；另一個較少學生使用的上下樓動線，則位於西側，這個動線位於大廳空間，由兩座 L 型樓梯所構成，整體空間為挑高空間，因此極具成為展演空間的潛力，因此我們命名為「次要動線／展覽動線」。由此可知，兩側空間分別具有動線的流動性與空間的開放性，那該如何妥善的運用空間特性，創造出城鄉所專屬的空間呢？我們認為在規劃前，需要先理解使用者的需求。

需求：從使用談起的空間配置

此次整體規劃順應著前期計劃（建築師與所上制定）進行，以

專題報導：學而「實習」之

1500 萬 +500 萬為經費，以增加規劃的實踐可能。在整體規劃的部分，我們透過決定空間的定型定量與對應之空間，以滿足需求為基礎，為後續的空間想像與具體設計保留更多可能。

首先，與學校協商後的城鄉所空間為工學綜合大樓地下一樓至地上三樓，以及五樓部分教室。因為經費考量，本次以公共區域、教室以及碩一生缺少的研究室為首要施工對象。其他如：位於地下一樓的階梯教室、各老師研究室與部份未有明確機能等空間，僅先以修繕漏水、增設空調或牆面粉刷為主。換言之，本次規劃主要以地上一樓至三樓為主，經過所務會議、搬遷會議等相關討論定案後，這三層樓的空間配置規劃如下整理：

一樓

- 碩一展演空間 (A、B、C、D)：碩一新生尚未開始撰寫論文，且課程內容需要較多分組討論，加上實習課有評圖需求，為此規劃出此一專屬空間。
- 102 城鄉基金會空間：基金會面臨轉型，也可與之結合，成為社會實踐與學院教育的橋樑，更是一種彈性的博物館式空間。
- 115 共享討論室：為城鄉所大桌空間精神與個人研究需求的結合，回應了目前個人研究室利用率低，共享模式更能妥善利用研究空間，成為學生自主營造的空間類型。
- 106 建築設計教室：建築設計學程為大學部學生接觸城鄉所的重要媒介，該配置位於共享研究室附近，共同形塑入口意象。
- 104 城鄉客廳：作為畢業校友的交誼空間，凝聚畢業師生以及在學同學，提升跨屆的連結，構築出「家」的感受，更可舉行相關小型對談與活動。

二樓

- 主要教室空間：共有三間教室，各容納 20-30 位學生，加上三樓的 313 教室來負擔所上的授課需求。
- 所儲藏室：收藏所上歷年來相關資料，亦可整理成圖書館的展覽形式。

三樓

- 教師辦公室：佔了三樓主要的空間。
- 學生研究室與共享空間：此樓層規劃了兩個共享空間，作為師生交誼、論文指導會議、所務會議等空間。位於西北側的學生研究室群落與共享研究室形成公共休憩區以及放映區。東側共享空間內則設有電腦教室、影印室、茶水間作為核心的共享空間。



▲ 工作坊實作狀況 (攝影：北原史香)

為了了解所上需求，本組積極參與所務會議跟公館樓會議，也特別訪談陪伴城鄉所走過多年歲月的吳秀妹小姐，因為城鄉所的組成不僅有學生，支撐起系所教學的教授，維持所上日常事務運作的行政組員，更是這個空間的重要使用者。例如所辦人員就提到：「學生總會希望公共空間多一點、大一點，但身為管理單位會覺得公共空間越少越好。因為我們沒有環境自治的資源，所以只能用獎勵金請同學協助打掃。」亦有教授向我們提到，在公館樓時「教授研究室隔壁就是學生的研究室，有時候聽到學生在討論、爭執時，我也會湊過去講個幾句話。」但同時也有其他教授認為教職員空間與學生空間仍需要做出區隔，因此如何在新空間創造老師與同學交流的機會，同時保持彼此空間成為規劃上的課題。而在多次所務會議中不同教授們也提議了錄音室、練團室、廣設茶水間等師生多元需求的空間，以及城鄉所接待外賓的會客空間，或是客座學者教授來訪的個人空間。梳理了多元的需求，也顯見大家在搬遷的過程中，順道檢視了既存空間與其不滿，並嘗試在新的規劃下體現系所的真实需求。

參與：打開空間也打開討論

在參與方面，本組希望「打開空間設計參與的門檻」，讓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夥伴，也能共同參與空間的專案發想與構築，因為空間的設計與實踐不僅僅是建築師、設計師的專利，而是每一位使用者、參與者所共享與建構的場域經驗。為此，我們開設了工作坊作為設計過程中的互動機制，希望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與協作性的空間設計過程，其中更特別強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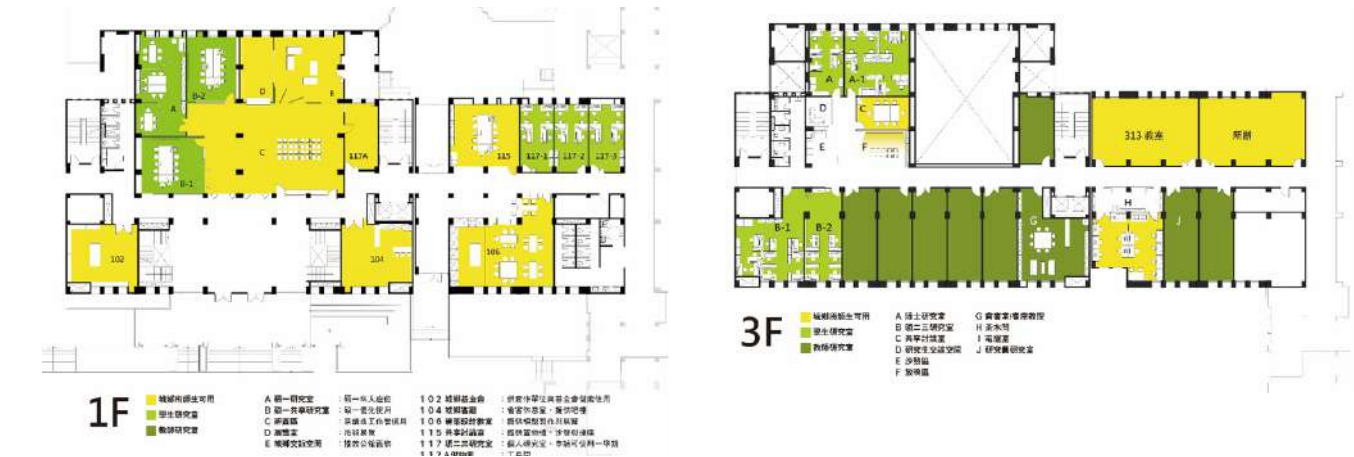
一、跨專業參與的可能性：不論是資訊整理、圖像選擇、影片製作、情境設計，甚至空間敘事的構築，非空間專業的夥伴都能透過適當分工，找到屬於自己的參與位置與貢獻方式。

二、讓參與者真正感受到影響力：透過設計良好的互動過程，參與者不只是填寫意見卡或單向的回饋，而是能在討論中對空間提出具體想像，甚至能在設計過程中發揮主動創造的角色。

而工作坊的舉辦，本組決定在本次搬遷工程的重點施作場域，也就是工綜一樓大廳，將過去較少人穿越的空曠空間，轉化為公開討論未來想像的議題空間。第一部分的「研究室議題工作坊」，我們試圖搜集大家對「共享研究室」與「個人研究室」的想法，對此我們結合了「模式語言」的概念，將常見的空間氛圍與功能，轉化為圖像小卡，試圖讓參加者快速理解「誰」、「在何種空間」、「以何種方式」的空間可能。大家經過討論後，使用者大多期待具有包覆感、深度專注的研究空間，同時也著重視覺上的舒緩與清新，尤其發現同學多偏好臨窗座位。綜上所述，學生普遍尋求的是，既能專注於個人研究、又能與同空間內的他人保持鬆散連結的混合式學習環境。

而在第二部分「公共空間工作坊」中，我們以一樓未來落成的公共空間為例，提供模型與各種美術用品，引導參與者「做」出自己所希望的空間。同學們提到目前城鄉所的空間，都是一個個小單元拼湊而成，缺少一個大型、完整的空間可以進行展示，於是該提案便以此為主軸，打造開放式的展示空間。另一組同學則是以評圖空間為核心，亦兼顧放鬆休閒的空間機能，讓評圖的重要場合並非完全緊繃。當然也有同學打趣地將空間變成「社會運動練習所」進行天馬行空的空間改造：練習砸雞蛋、直接設置料理台煮火鍋、練習抗爭口號、大大的我們反對旗幟，在戲謔中也傳達了長年累積的批判傳統，空間使用上也呈現出刻意的紊亂與流動，以呼應存在於既定規劃邏輯中的亂流與不服從，凸顯所上同學的巧思與精神。

最後一部分則是「大廳改造工作坊」，也呼應工作坊本身的舉辦地點。旨在透過手作體驗的方式，引導參與者一同思考、想像未來工綜館大廳空間的各種可能性。這不僅是一場創意實踐的活動，更是一個共同想像、討論價值的過程。工作坊中，參與者



▲ 平面圖

可以大膽地構想公共藝術、吧檯、吊繩裝置、攀爬網等各種元素，藉此探索空間在功能與感知上的多樣發展。過程中，我們也透過學習單、關鍵字引導同學們想像空間的創作提案。我們特別準備多樣化的手作材料包括黏土、竹籤、色紙、玻璃紙、絲帶、冰棒棍等簡便易用的素材，讓參與者能以直接、親手製作的方式，具象化自己對未來空間的想像。在成果上，有同學有粉色黏土打造出兩層樓高的旋轉溜滑梯、懸吊式的公共藝術、將公館樓的「鍾馗」再現於牆上、以冰棒棍搭建展櫃、設想大廳內外的綠色植栽等。

透過參與式工作坊，讓系館改造不僅是閉門會議，而是大家可以一起討論的過程。在彙整之後，我們認為多數參與者皆認為，未來空間須具有高度的彈性與可轉換性，以因應不同使用情境而靈活調整。此外，更可以去設想大廳與走道的熙來攘往，如何協助、創造師生非正式互動的契機。最後，未來的空間應該將師生的日常經驗納入考量，同時傳達城鄉所意象、精神與學術特質。

改變：跨尺度的設計與嘗試

系館改造工程將會於 2025 年七月開工，但在這之前，我們也嘗試透過實習課的評圖場合，改造大家所熟悉的工綜 313 教室。透過日常微觀尺度的空間調整，來讓大家



▲ 評圖現場 (攝影：北原史香)



▲ 評圖現場 (攝影：北原史香)

▲ 小組討論狀況
(攝影：陳佩汝)

思考空間重新配置後的權力關係以及舒適度。具體而言，我們認為現今的教室，在簡報呈現上有太多干擾（如白板、電視），桌椅的擺放方式也難以促成對話發生。因此，這次的行動旨在創造新的對話機會，以及在各種報告場合找尋一個更好的使用方式。大多同學的回饋都圍繞於打破大桌的圍繞感，更有開放性與親近性，以及對於聽講空間變化的新鮮感。但也有同學提到，這樣的桌椅配置動線狹隘、讓人難以出入，沒有桌子的情況下也不利書寫與筆電使用。因此，空間的改造仍然需要各種人事物的支撐，才能盡力滿足人員需求。這也提醒了我們：儘管在事前，我們在工綜館海報區、公館樓一樓張貼了互動式海報來調查大家的習慣，嘗試模擬一套「空間劇本」，但當實際演出時，仍然要著重演員們（也就是使用者）的互相配合，以及如何跟場景互動得宜，空間才可以運作順暢。

循著這些提醒，在階段性的規劃提案上，我們也提出了一套整合多方嘗試的工綜整體空間劇本。一樓的部分，將從狹窄筆直的走廊變成可以駐足、觀看與互動的「展演空間」，含納了評圖、小型展演、所上成果展示、校友交誼等共享功能。大廳作為另一個規劃重點，我們也考慮到了「城鄉五十」之際，如何將大廳融合城鄉所的展演場域，我們利用既有的空間，嘗試將一樓大廳、二樓廊道與二樓大演講廳，串聯成一個特殊活動的場地。另一個「劇本」，我們以必修課為主，打造一個碩一必修的重要空間，滿足碩一階段的小組討論需求，同時更回到大桌空間的典範，形塑一個開放式的交流場合。同時也將城鄉基金會長年的社會實踐納入規劃中，將基金會銜接上所內的教學與社會持續的實作，捲動城鄉綿延不絕的人事物關係。

在個人空間上，我們強化了目前研究室的機能，提議制度化空間管理（如成立委員會），或透過非正式的方式形塑大家使用公共空間的公約。同時引入科技管理工具，打造出更安全、更便捷的研究室空間（如電器智慧開關、既有刷卡門禁），透過共享與個人並行，找到研究空間的最大公約數。



▲ 工作坊實作狀況 (攝影：北原史香)

結語：快閃與恆常

名為「快閃」，但未曾只是短暫的設計行動。「快閃事務所」作為實習課中的集體設計實驗，更是由全體城鄉所使用者共同參與的實作，不僅回應了制度性的搬遷條件與實務限制，更是一場關於「我們是誰」、「我們要怎麼住」的集體自我提問。

過去城鄉所的空間記憶總在「拆」與「留」之間搖擺，在抗爭與協商中摸索自主性。在工綜館的再規劃中，「快閃事務所」將這些爭辯化為實體設計語言，從願景工作坊到參與式海報、從期中評圖到實驗性空間劇本，一步步試圖建構一種既批判又具彈性的空間治理模式。它承載的不是瞬間即逝的提案，而是一種延續了五十年、仍在持續發展中的「城鄉所精神」：關懷社會、參與式討論、擁抱不確定、信任集體、實驗行動。

「快閃」，是方法；「恆常」，是精神。參與式設計不僅是意見收集的過程，更是一座讓不同觀點相遇、彼此理解與整合的橋樑。橫跨上下兩個學期，從最初認識城鄉所的歷史，到藉由公館樓的搬遷將其濃縮、再詮釋於工綜館，這學年的實習課我們也跟隨著搬遷的討論，持續調整並介入其中。未來空間落成後的使用與維護，仍然是屬於所上師生，因此我們更要關注「真實需求」，尤其學生研究室、教師研究室、茶水間等基礎功能空間不能被忽略。而城鄉所的學生一直以來都熱衷於親自構築、改造空間，所以我們建議在空間設計上要透過留白，讓未來學生們也能參與空間的實踐。藉此，我們方能將城鄉所與空間的互動視為一個持續性的、不會閉幕的持續過程。不需藉由一次計畫就到位的空間，背後試圖傳達的乃是「如何讓每個時代的學生，都能實踐屬於自己的空間」，成為城鄉所與空間最緊密的傳統。



〈滯留／流〉：洲美、社子島與區段徵收的張力與辯證

◎ 編輯：紀懷超

指導老師：康旻杰

組員：張翼纖、張維哲、紀懷超、

李亭瑩、鄭羽芳、林彥彰

引言：策展作為行動

2025 年 6 月，在學期尾聲的期末週，我們六位同學在活大 103、104 展間，策畫了一檔為期一週的展覽。本次展覽，我們將焦點放在洲美與社子島，兩處田野地都是過去城鄉所長期投入、同時面臨到區段徵收爭議的地方。回顧展覽，我們將再次梳理本次的「策展作為行動」的命題，整理策展過程中的論述、調查及行動介入，並思索後續如何回應與田野的關係。

基地簡介：社子島、洲美的區段徵收與地方敘事

洲美因北士科的開發需求，已於 2019 年完成 1-8 鄰舊聚落拆除與安置，走入流離又「安置」

的徵收後階段。如今大部分聚落已成為方正格局的街廓以及集合式住宅，留下的 9-10 鄰，卻彷彿被遺棄於都市角落。洲美在遷移與流變之後，訴諸留存生活記憶與情感聯繫以重構地方意義。

社子島則在 2010 年水利署的防洪計畫中被納入築堤範圍，須待區段徵收尚能開發。然而至今仍然延宕不決，每次的公聽會與計畫修正都牽動著地方敏感神經，規劃案一修再修、公聽會一辦再辦。急遽的拉扯之下，在縫隙竄入的是各類不動產開發商，彷彿鬼魅的顯形，縈繞在這個延宕不決的空間。

2025 年的當下，已完成徵收的洲美，有意於北士科落腳的廠商持續進駐，同時關渡平原開發的呼聲也不斷浮上檯面；社子島則在 4 月 17 日，因開發計畫環評未依程序進行，被行政法院宣判違法，雙方正持續處於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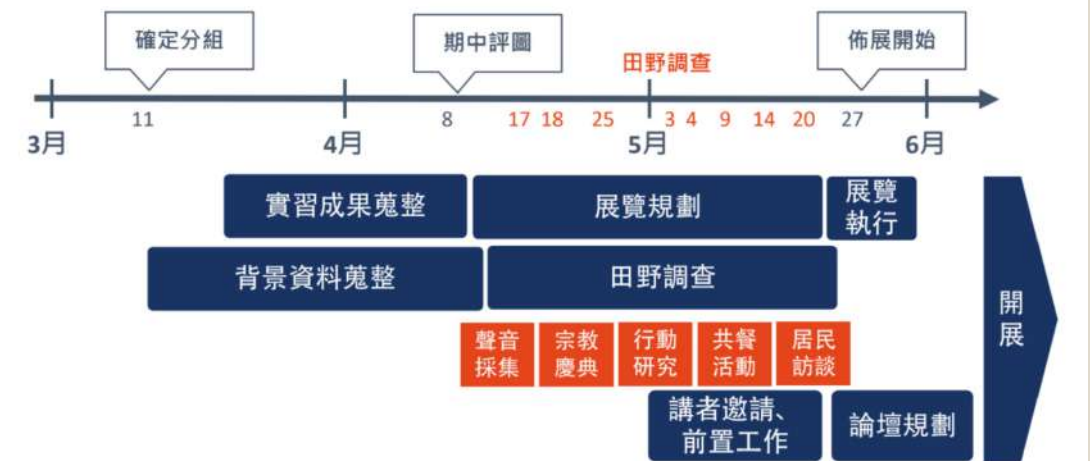
議題關懷：在「留」與「流」之間的策展論述

不過，即然過往實習課成果及相關研究已十分豐碩的情形下究竟還有什麼是值得做的？因而，

在有限的時間及資源下，我們認為較適當的方式是在臺大校內展出。城鄉所作為外來行動者，乃立足學校及規劃專業者的身分介入地方，以我們的身分更能做的是試圖觸及身旁的群眾，讓周遭的臺大學生也能看見「城鄉所在做什麼？」、「為何社子島需要關注？」開啟校內的對話空間。

於是，本組以「滯留／流」為策展論述，從「策展作為一種行動」出發，不僅呈現地方記憶與人地關係的變化，也試圖突破主流都市發展敘事中發展／守舊和流動／停留的二元觀點。策展可以是規劃實踐的補充力量，也是訴說未被聽見的故事的媒介，當制度尚未真正打開民眾參與的空間時，展覽與論壇提供了另一種讓在地經驗被理解與轉譯的方式。

調查分析：田野過程與經歷



不到一學期的時間可說是非常有限，從 4 月開始，我們就密集地深入兩處田野地，起初進到洲美徵收範圍外的 9-10 鄰，透過社區團體「土也工作室」認識了拆遷前洲美的樣貌，由於土也在拆遷前曾耗時投入傳統家屋的測繪，也出版刊物、拍攝短片記載人物的故事，因而取得了大量珍貴的文史資料。而同時，我們也認識了專案住宅住戶的受訪者阿平、薇薇安等人，實地進到住宅瞭解徵收後的日常生活。

而要進到社子島這個開發進行式、地方關係充滿張力的地方則更顯挑戰。跟隨反對開發的社子島自救會的腳步，我們參與了徵收公聽會、環評的行政判決，對於初來乍到的我們，無非是一大震撼。而當我們走進菜寮，這個鄰里間一起吃飯、耕種的集會場所，看著阿姨流暢地整理出這個禮拜摘了哪些菜、何時出發耕種、煮了哪些料理，足跡踏遍的廟宇、柑仔店、路邊攤，也都拼湊著社子居民生活的圖像。雖瞧見了「反抗拆遷」論述基礎背後真實生活樣貌，但當聽到他們說起家裡的地板如何龜裂、漏水，又如何自行改建，禁限建的陰影又在我們面前顯形。



▲ 拜訪社子島自救會，了解從過往至今的抗爭（來源：實習課社子島小組）



▲ 聽福安社社長分享南管北管戲曲、兒時與水共生的故事

而在檢視過往城鄉所成果時，我們意識到所上歷來的教學理念，時常需要要求學生實際走入田野，盡可能貼近地方需求提出規劃方案。但這通常並非一次的實習課便可以達成，因而多半為高階實習的形式進行，有些屬於具體提出對抗區段徵收的替代方案，有些則用地景敘事創作的方式，在這個高度爭議性的場域中持續維持聯繫。因此，在期中評圖之前，我們便盤點過往在兩地曾進行的所有課程，聯繫當時的學長姐統整當時的成果資料，並建置網站呈現，在本次課程結束後也會持續傳承。

在展覽正式開始之前，我們也建立「滯留／流：社子島與洲美的變與不變」粉絲專頁，並規劃一系列宣傳文，以提升活動的能見度與參與度。我們定期發布與展覽相關的貼文，包括進入田野的見聞、議題簡介、展覽理念、講者介紹等內容，透過演算法觸及有興趣前來看展的民眾，也在展覽之前透過書寫，整理田野素材，並透過粉專項更多人分享發生在洲美與社子島的事件，以及我們進入田野的感受與反思。此外，我們也以電子邀請函邀約相關系所的師生共同參與，同時在校內張貼海報加強宣傳。



▲ 實際參與在社子島區段徵收公聽會、記者會現場



▲ 與洲美當地人一同下廚共餐，交流關於安置宅的記憶

行動：「滯留／流：社子島與洲美的變與不變」展覽

本次展覽的緣起，來自於 113-2 學期的康老師班設定以「學習策展」為課程目的，嘗試爬梳過去所上課程在洲美及社子島的相關成果，除回訪田野報導人也持續追蹤議題。展覽期間訂於 2025 年 6 月 2 日至 6 月 6 日，於活大 103、104 展示室舉行。整個展區設計，分為區段徵收概述、洲美、社子島、歷年檔案四個展區，並設有放映室。

除此之外，6 月 4 日晚間我們也舉辦了一場名為「區徵下的地方：在地的組織萌芽與行動」的論壇。邀請社子島自救會的李華萍、土也工作室負責人郭琬琇、環境權保障協會副執行長許博任。本場講座旨在拓展「策展作為一種行動」的命題，也就是跳脫展覽的靜態與單向的再現，推動一種雙向的對話與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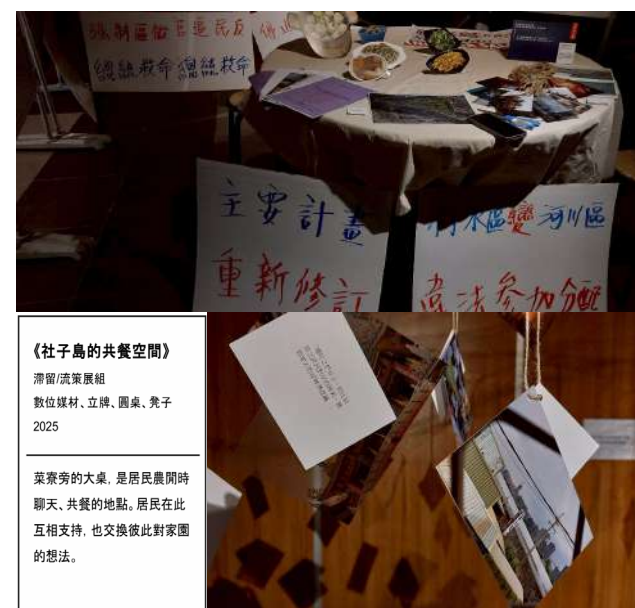
在實際到場交流下，華萍姐分享了社子島自救會成立的動機，

琬琇也分享了作為洲美女兒在拆遷當下的情感糾結。博任則在有限時間內，言簡意賅地解釋區段徵收之所以不公平的地方。最後也在康老師的總結之下，說明城鄉所或任何規劃專業，不應該只是抗爭的後援部隊，更應該是「具備規劃與設計的能力」。真正的保存，不是被迫留下來，而是「讓想離開的人能離開，想留下的人有留下的條件與尊嚴」。

展品精選



▲ 展品精選：《紙盒劇場》



▲ 展品精選：《社子島的共餐空間》



▲ 《物件、遷徙與遺留》互動式展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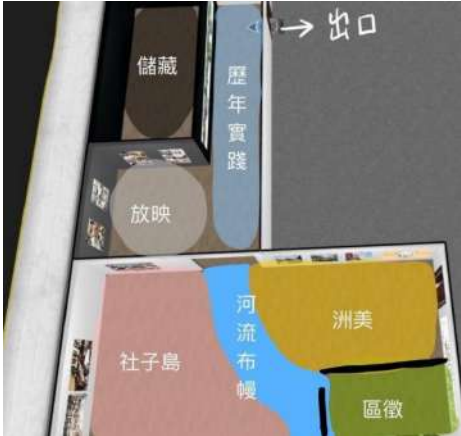
回顧與反思：多元地方敘事的對話與傳承

在展期的一週內，一共觸及了近百位學生、民眾前來觀展，論壇也吸引了逾 40 位聽眾報名。雖展期僅短短一周，但仍提供了一個對話空間，協助我們重新梳理整學期的田野經驗及知識，精準傳達自身想要表達的訊息，並與不同立場的人交流對話。其中也不乏立場傾向開發的民眾向我們提出挑戰，考驗了多數時刻處於同溫層的我們該如何回應並勇於溝通，實現「策展作為一種行動」。

令我們理解到的是，對於區段徵收這樣牽涉財產權、地方複雜關係的議題，其並非單純是開發與保存之間的對立，也不盡然是推崇進步或浪漫化地方敘事般的扁平想像。展覽結束後，我們也持續將論壇的內容，整理後發佈在社群平台，未來社群帳號也將不定期分享各種活動、議題的資訊。而田野過程中蒐集到的檔案及照片，也將整理存放在 Google Drive 雲端空間，連同期中所架設的網站持續傳承下去。

最後，希望本次策展，不只

是結束於其落幕，而是一條更長遠的實踐起點——促使更多人關注地方發展背後的社會意涵，也期待未來有更多跨領域、跨立場的對話，在洲美與社子島這些「滯」中之地，充滿了「流」與「留」的可能性。



▲ 展覽分區圖



▲ 放映室



▲ 計畫網站首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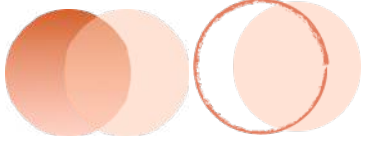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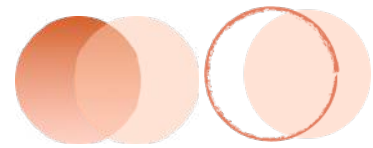


▲ 論壇活動成果

感謝名單

社子島自救會全體成員、洲美土也工作室、永裕大哥、江亮儒、余宗軒、林丹威、林宜嫻、林琨堯記者、柳志昀、徐世榮、徐念廷、許博任、惠萍、楊凱傑、廖宏翊、榮華大哥、福安社李元泉社長、曉蓉、賴彥安、鍾智豪

以及其他在田野中給予我們諸多協助的每個人。



引言：對宜蘭演藝廳的重新詮釋

1989 年游錫堃上任宜蘭縣縣長，宣示以文化立縣、觀光立縣的施政總目標。同時，「北宜高速公路」計畫定案，預告宜蘭與北部區域的連結更加緊密，亦影響著宜蘭文化立縣的目標與在地文化的孕育，演藝廳之興建成為當時重點項目之一。在設計上，宜蘭演藝廳採用 Christopher Alexander 的建築模式語言 (A Pattern Language) 作為方法：透過識別空間問題 (課題) 並提出相對應的、經實踐驗證的解決方案 (模式)，藉此形成共享的設計詞彙。在城鄉基金會的脈絡下，模式語言的操作尤其強調「參與式設計」，更是規劃中的關鍵內涵與其所寄託的多元期盼。

宜蘭演藝廳的規劃階段中，產生了約 60 個相互關連的模式語言後，進入設計實質操作時，設計師團隊即開始由個別模式尋找適合該「事件模式」的三度空間幾何形式。原先規劃第一期興建以三面式舞台為主的劇場，但進入設計階段時，被要求此三面式舞台必須增加鏡框式舞台的功能，並相應調整觀眾席設計以滿足鏡框式舞台的觀演需求。

「三面式舞台」作為回應宜蘭地方戲曲傳統與開創當代表演實驗性的核心模式，同時因為台灣表演界當時習慣在鏡框中演出的現況，因此呈現出如今所見的混合設

04

指導老師：康旻杰

組員：林宜嫻、黃琢允、何智麗、

許心宇、李和庠

〈蘭城排練中〉從演藝廳看見地方文化的空間表現

◎ 編輯：林彥彰

計。雖然與最初純粹開放式舞台的模式理想有所妥協，但最終設計也反映了將舞台生產放回台灣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反省該社會能夠孕育何種空間的務實考量。儘管如此，此一實驗性設計仍為後來的無獨有偶工作室的《怪奇馬戲班》(2014)、宜蘭戲曲節的《西北雨傳說》(2019) 提供了將表演延伸至觀眾席並打破舞台界線的獨特機會。

本策展計畫的核心，在於呈現宜蘭演藝廳的歷史之外，透過反思的過程對其初始設計理念、實踐歷程及其間的可能落差進行檢視，並以包含多重敘事的影片及展覽形式進行再現。此一過程即是策展論述的組成部分，說明我們對此文化空間的理解。

分析：舊城振興計畫的理想與現實

宜蘭文化立縣的目標，以環城公有地再發展為起點，由縣政府的跨

單位、多角度切入，以一連串、多種類的實施內容，形成「舊城振興計畫」。其範圍包括：南門細部計畫、縣政府及宜蘭監獄遷移、土地徵收及都市工程、宜蘭設治紀念館設置、宜蘭演藝廳興建與營運、南門林園規劃、社福大樓設置、碧霞宮保存及楊士芳林園設置、台灣銀行保存與宜蘭美術館規劃、南門林園系列歷史空間的修建。宜蘭演藝廳正地處於「新月環帶」當中非常中心的位置，同時承載



▲ (a) 表演語彙 (來源：宜蘭演藝廳組提供)



▲ (b) 邊界之間 (來源：宜蘭演藝廳組提供)

了宜蘭市重要的藝術表演功能，即成為整體計畫中的發展重點之一。

「舊城振興計畫」在推動之初，即標槩了明確的價值與目標：「以都市更新結合傳統民俗技藝展演的都市活動，作為南門地區再發展的主軸架構」。亦即以公有地的再發展為濫觴，帶動宜蘭舊城，將之轉化為現代化人文生活城鎮，以迎向北宜高開通後的產業發展趨勢。

然而，「舊城振興計畫」最終並未如願完全發揮其作用，僅有今宜蘭演藝廳西側的「新月廣場」百貨商場建成後，吸引大量宜蘭市及其周遭居民前往消費，由此帶動附近文化據點、公營旅遊景點或博物館的觀光人潮，而與市民就文化與藝術相結合的遠景則呈現出了明顯的斷裂。

採訪在演藝廳臨街從事婦產科醫事之當地居民則表示：「演藝廳對於當地居民之存在，其實就是一個已經融入都市與市民生活的一棟建築物，或許外地來的人會覺得這是地標，但它更像是一個正在發生日常生活的場域，音樂表演、傳統戲曲、話劇節目抑或是小朋友們的表演成發，更多的並不是關注這棟建築物的特徵，而是它能帶給居民或是來訪的人什麼？」因此，演藝廳或許已經不像從前計畫那樣具有一個宏大、廣泛的社會責任，反倒是成為蘭城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又同時代表了蘭城的「都市性格」。

本組嘗試透過訪談、現場踏查以及對歷年營運資料的分析，來評估這些初衷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哪些得到了實現、哪些產生了轉化、又有哪些因時代變遷或執行限制而產生了落差。

參與：宜蘭演藝廳建成環境使用後評估 (POE) 其他地區展演活動與演藝廳的關係及影響因素

除了宜蘭演藝廳的核心角色外，表演藝術活動也逐步擴展至縣內其他地區，特別是礁溪鄉與羅東鎮。

1. 礁溪鄉：「礁溪劇場」及近年新增的「礁溪德陽園區」(或稱礁溪德陽營區)作為重要的藝文活動地點。例如，2011年起礁溪劇場就有戲劇、音樂、舞蹈等演出。近年(如2022-2024年)德陽園區更是舉辦了多樣化的系列展演，如「藝起FUN礁溪」、「攏蘭 chill 藝下 # 草地同樂會」等，包含戲曲匯演、青少年劇場、親子互動、舞蹈、馬戲等，吸引了不少人潮。

2. 羅東鎮：「羅東文化工場」也是一個重要的戶外及半戶外展演空間，承接了戲曲節的部分活動、傳統戲曲社團育成匯演、以及其他音樂、戲劇等多元表演。例如2013年起羅東文化工場就有各類演出場次，2023年的宜蘭戲曲節也有在此辦理演出。

使用者本身與鄰里關係 無家者

經過小組的訪談與調查發現，演藝廳長年與無家者共存，管理方雖未具強制驅離權力，仍致力於維護場館整潔與活動秩序。當場館有演出時，工作人員會提前告知無家者某段時間內需離開，無家者們通常也會配合，表演結束後則再回到場地。此外，當場館人員發現無家者在水池取水飲用時，會主動提供飲水機的水。有時表演結束後多出的便當，也會由警衛分送給無家者，展現了館方人員在人性與實務之間的體貼與彈性。而且，環境本身亦是無家者長留於此的原因之一。鄰近中山公園，場地有水、有電、有遮蔭，附近還有長期提供免費便當的團體進駐，加上與館方人員的熟悉與默契，讓這裡成為無家者聚集的地方。



▲ 評圖現場(來源：《遠見雜誌》)



▲ (e) 從圖紙到現場
(來源：宜蘭演藝廳組提供)

東嶽廟

由於宜蘭演藝廳與東嶽廟僅隔一條馬路，廟會活動所帶來的噪音，有時會影響場館內的演出。館方人員指出，廟宇偶爾會在演藝廳中庭辦活動，而場內剛好正進行獨奏會或小型演出時，外部活動的聲音便會傳入場內，對演出品質造成干擾。對此，觀眾曾向館方反映問題，館方也積極嘗試改善。然而，由於多數更新與升級仰賴中央或縣市政府的大型補助，日常僅能依現有預算進行小規模修繕，難以徹底改善問題。整體而言，館方展現出在有限資源下的彈性應對，針對僅偶爾、特定情況下出現的噪音干擾，也積極嘗試解決，惟結構性限制仍需長期關注與改善。

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位於宜蘭演藝廳正門對面，它意外地成為周邊商家的重要景觀資產。業者表示演藝廳不僅是窗外的日常景觀，更是行銷賣點。根據訪談，月子中心業者提到月子中心有幾間房型稱為「演藝廳房型」。業者也強調，演藝廳及其周邊空間是家屬與孩子們放鬆、散步的好去處。總括而言，演藝廳與周邊的公園綠地已成為月子中心的重要景觀與生活資源，甚至成為業者以「演藝廳視野」為主打的行銷亮點。這種延伸性價值意想不到地強化了演藝廳作為公共空間核心的作用。

意象與地方性

演藝廳的興建可追溯至1990年代舊城更新與地方文化活化的時代背景，原意在於打造結合地方特色的公共文化空間。隨著時間推移，演藝廳的文化象徵性並未如預期般持續深化。居民對演藝廳的感知逐漸從文化象徵轉化為生活背景與地標，僅在學校成果發表、家庭成員參與表演等特定時刻才進入場館。

訪談中的居民表示，雖對場館懷有童年回憶，兒時曾在這裡參與展演，長大後也仍將它視為生活圈的一部分。但她也坦言多數宜蘭人平日並未積極關心藝文活動。通常會進場看表演的，都是為了支持自己小孩、親友，或者因為對演出的表演團隊有所認識的在地人。此外，雖然演藝廳位於市區、地理位置便利，但居民普遍認為它並非一個具有觀光吸引力的場地。

這顯示出演藝廳在地方意象中，更多被視為地

方內部的文化空間，而非外來觀光者的目的地。然而，居民也補充指出演藝廳及其周邊空間的確是居民日常中放鬆休閒的好地方，既是藝文場館，也是社區日常場域。

此外，表演者在宣傳、票務與活動推廣上，仍多由團隊自行主導，演藝廳主要扮演場地提供與支持的角色，而非全面性的宣傳平台。即使演藝廳設有官網與臉書專頁，但資訊更新緩慢，常在活動臨近時才公告，使觀眾難以提前安排時間。這樣的訊息落差與觀眾的期待不完全同步，尤其對需要提早安排時間的觀眾來說，可能會覺得較難掌握演出規劃。



▲ (c) 地方策略(來源：宜蘭演藝廳組提供)

成果：〈蘭城排練中〉從演藝廳看見地方文化的空間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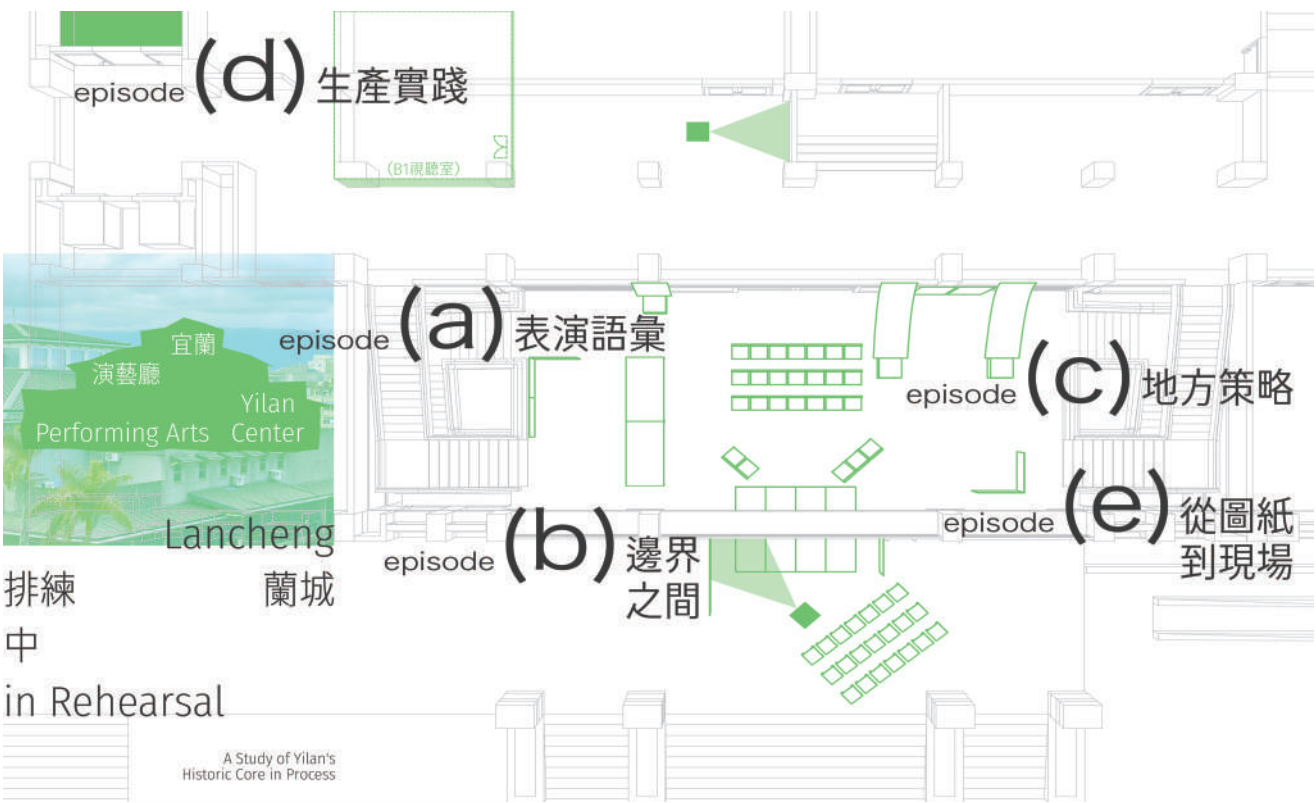
宜蘭舊城裡的演藝廳，像是一個仍在排練的現場。排練的，不是一齣明確的戲碼，而是這座城市如何被觀看、被使用、被記住的方式。舞台未升起，故事卻早已悄然展開；在建築與舊城的交界處，地方被不斷地製作、再現、延宕、協商。

「排練」作為一種觀察的角度，嘗試貼近這個空間在日常與儀式之間的搖擺。一座文化設施，也許不只是劇目的承載體，而是張力與辯證的所在之地：一面向外，展現著城市現代化與治理秩序的意象；一面向內，承接著地方信仰、酬神戲、與那些非正式的小型表演。就像社會劇場中角色的流轉與位置的調度，這座建築的運作與想像，也處在一種未定型的敘事當中。這樣的「雙面性」貫穿許多層面：一面是室內的三面式正式舞台，另一面則是公園的戶外平台，無牆、開放、偶爾沉默、或成為誰的家；一面是冷氣與聚光燈下的劇場演出，一面是酬神儀式中的「落地掃」，在街頭搭起的臨時棚架；一面是建築師筆下的劇場構想，另一面是地方團體的排練、借用與自行編排。

這些彼此錯置的段落，並非對立。它們是地方生成的節點，是空間在現實與意圖之間試探的縫隙。在這些裂縫裡，生活的演員與制度的腳本並置，演出尚未確定角色的地方敘事。

展區共分作五區，(a) 表演語彙再現觀眾與表演者的互動模式、(b) 邊界之間呈現出建築與表演場域之間的協商關係、(c) 地方策略擴大場域到演藝廳與周邊市場、火車站、社區機構之間的空間關係、(d) 生產實踐在實際面上討論劇場人員的生產行為及隱憂以及建築設計，最後的 (e) 從圖紙到現場說明現今營運制度與地方共構的多重軌跡。透過這五個不同面相，了解宜蘭演藝廳當前的使用狀況。

綜上所述，「舊城排練中」，是本組對一種觀看行為的提問：我們是否總是期待地方能夠「準備好」被觀看？又或者，它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排練與重演之中，自行發聲？



▲展場空間配置（來源：宜蘭演藝廳組提供）



▲評圖現場（來源：《遠見雜誌》）



▲ 實習課搬遷小組參加所務會議討論
(來源：實習課工綜館搬遷小組)

評論投稿

回顧臺大城鄉所實習課： 傅柯視角下的 工綜館搬遷計劃

◎ 撰稿：林庭誼 | 審閱：曾曉渝

一、前言

2025 年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以下簡稱城鄉所）迎來了又一次的搬遷課題，此課題源於城鄉所在與校方對於校地使用的協調商討下，計劃將系所空間整合到「工學院綜合大樓（以下簡稱工綜館）」，並將承載數十年回憶與使用經驗的「公館樓」交還於校方，引起許多城鄉所師生的關注。此外，此次搬遷計劃被整合為113學年度環境規劃設計實習一（以下簡稱實習課）的課程內容，包含上學期的模組三，由全體碩一同學分組操作，以及下學期由劉柏宏老師以參與式規劃為題，帶領十位同學操作。筆者作為劉柏宏老師實習課的一員，既作為規劃者，亦為此次搬遷影響下的學生，因而以此為契機，記錄下自身的觀察。

本文以米歇爾·傅柯 (Foucault, 1977) 提出之理論框架為基礎，分析為何工綜館受到公館樓使用者的排斥，公館樓又為何受到當今使用者的喜愛，引入「全景敞視主義 (panopticism)」與「規訓權力 (disciplinary power)」的概念，揭示空間如何作為治理的技術延伸，探討身體、行動、知識與主體性之間的空間政治關係。本文主張，城鄉所的搬遷並非單純的空間轉移，而是一場關於治理、規訓、知識及權力的重構過程，空間從一種學生主體營造的非正式場域，轉變為制度規範明確、受到監視與管控的教學場域，原先作為「異質空間」的潛能因此受到壓制、重構與再現 (Foucault, 1977)。

二、空間治理下的公館樓與工綜館

首先，傅柯 (Foucault, 1977) 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中提出「全景敞視主義」的觀點，揭示現代社會如何透過空間佈局與可視性 (visibility) 來實現權力運作，在分析過程中，傅柯借用邊沁 (Jeremy Bentham) 設計的全景監獄模型 (panopticon)，指出現代權力已由暴力與法律制裁，轉向規訓式的權力 (disciplinary power)，而空間在此過程中成為關鍵的媒介。此邏輯下，空間不只是物質性容器，也成為被設計的誘導裝置，被監視者在無法確認是否被監視的情況下，漸漸自我約束，進而內化規範 (internalization of nor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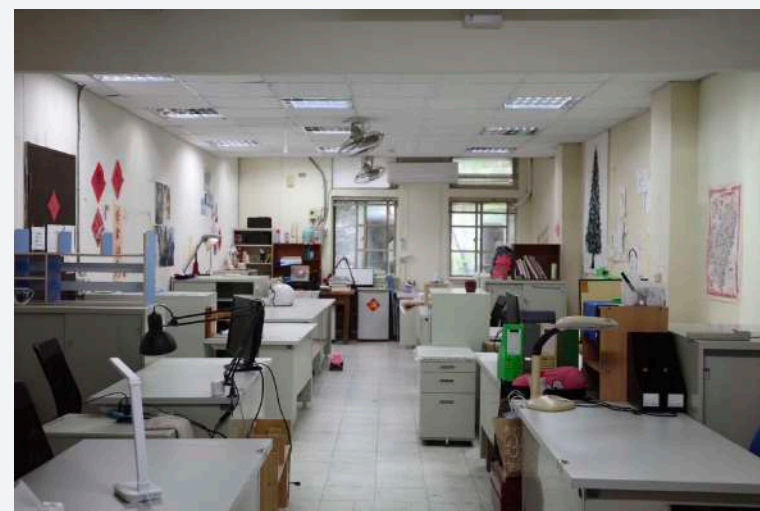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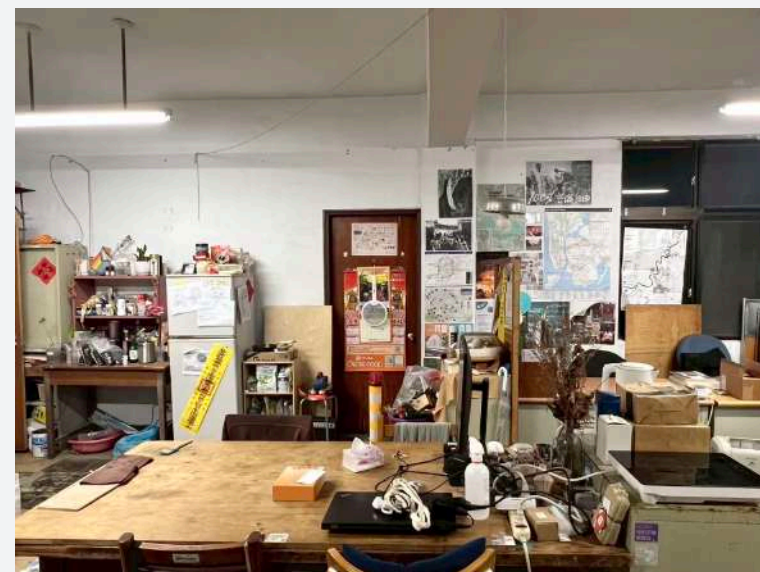
在筆者自身觀察下，城鄉所原先在公館樓的空間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視性，形成校園空間規訓下的模糊

地帶，允許學生自行營造、裝飾與界定空間，也能將原本無明確歸屬的公共空間，例如走廊與樓梯，變成學生對社會議題進行討論的再現空間；學生們也在二樓其中一扇窗戶前放上幾塊磚頭構成樓梯，將原本無法輕易抵達的屋簷變成陽台花園。這些經驗能看出，學生在公館樓的空間實踐，使公館樓脫離原本建築師設定的使用模式，形成一種自主與彈性的知識空間實踐。公館樓作為臺大校園的邊陲空間，藉由城鄉所師生的空間營造，創造出校園空間的異質性，也展現城鄉所的某種精神。

然而，遷入工綜館後，受到校方與院方的影響，教室與研究室空間的開放程度、門禁制度，以及教職員工主導的使用守則與管理機制，使整體空間成為全景敞視主義下的治理裝置，「沒有監視器等科技監控」的論述成為合理化規訓制度的最佳理由，沒有硬體監控所營造出的透明、開放之空間結構，也成為「一種可見性陷阱 (visibility is a trap)」(Foucault, 1977)。傅柯 (Foucault, 1977) 認為權力並非壓制性的法律，而是產生性的機制，透過空間規劃、分類、觀察與記錄等過程



在目前的搬遷過程中，城鄉所的空間轉變可被視為從「空間即自治實踐」走向「空間即治理載體」。學生不再是自由形塑空間的主體，變為由所方定義、監視與規範的使用者。



▲ (上圖) 公館樓研究室；(下圖) 工綜館研究室
(來源：實習課工綜館搬遷小組)

◀ 實習課搬遷小組參加公館樓學生搬遷會談
(來源：實習課工綜館搬遷小組)

程，製造了「合格的主體」，也產生了規訓式的權力。如此治理邏輯下，實質物理空間的監視成為輔佐，城鄉所成員對空間的討論，也被限縮在空間的使用規範與制度層面，逐漸地一部分學生與新進學生接受了「如何合理合規地使用空間」的思考邏輯，另一部分反抗性較強的學生也會因突破部分制度而滿足。能以此觀察出，治理並不只是直接地制約主體，也會在治理內部再生產出新的、受到規訓的主體，如傅柯所言，「權力不只是限制，更是使人說話、行動的條件 (Foucault, 1982: 790)」。

由此，城鄉所在工綜館搬遷下的空間營造，也漸漸脫離了空間層面的討論，轉為對制度與規則的反抗，原先在公館樓長久建構的精神價值，也隨著其物質性的消散（被拆除或說失去該空間）而消逝。

三、實習課作為規訓的制度化的實踐

除此之外，工綜館搬遷計劃被編納為實習課程的一環。從筆者的觀察來看，參與實習一課程的學生大多為一年級新生，進入城鄉所不到一年，並非公館樓的長期使用者，在本身並無參與過往空間實踐的情況下，加上時間有限，僅能經由課程安排、訪問學長姐、資料爬梳與個別體驗來理解城鄉所與「城鄉精神」，能真實表達師生複雜意見的能力有限。即便在課程過程中，有引導授課學生理解城鄉所的空間歷史與精神象徵，或安排建築模式語言等課程內容，其成果也高度受限於各班課程設計、課程評量與授課學生自身積極程度。在實習課沒有不同年級學生的參與下，也產生「公館樓學生之於工綜館學生」與「高年級之於低年級」的部分認知差異。例如，碩一學生是否需要研究空間？碩四以上學生是否能申請個人研究室？這些問題始終沒有共識。

在劉柏宏老師的參與式設計課程編排下，筆者作為其中組員，數次參與以教師為主的搬遷會議、舉辦工作坊、訪談了不同年級的學生、教職員與退休教師，得到了許多寶貴且真摯的

分享，但仍然難以斷言已顧及到城鄉所如此複雜且多元的成員的所思所想，數次的參與式設計成果也有限。其一原因是受限於時間，由於需要在一學期的時間內產生出設計成果，影響了參與式過程的設計；其二，參與式過程容易被認知成僅為實習課程成果，許多城鄉所成員不確定是否會真正地影響搬遷計劃，而沒有參與其中；其三，將搬遷計劃的規劃者侷限於實習課學生，難以真實反映城鄉所內部的多元主體，換言之，原本需要協商與對抗的空間議題，某種程度上被簡化為學生的課程任務，也不可避免地讓部分學生以修習學分的心態看待搬遷的規劃，造成學生對搬遷計劃的投入程度參差不齊。

此空間治理邏輯不僅作用於學生，也同樣強化作用於對教師的規訓。根據劉可強教授的分享，在過往的公館樓空間中，教師能與學生共享一種輕鬆且非正式的空間氛圍，房門時常是敞開的，偶然地路過、自然地加入對話，教師研究室外的空間並非十分嚴謹的空間，反倒成為學生與老師對話的最佳場域。此時，教師作為知識共同生產者，而非權力運作下的監視者，公館樓也成為系所自治與教育實踐的基地。然而，工綜館的空間，其空間使用規則、設備維護、能源管理、活動申請等內容，皆受到工學院的規範，導致教育的實驗性與批判性漸漸消失，一方面教師與職員作為學生的規訓者，強化秩序；另一方面，教師自身亦為被空間結構與制度規則凝視的對象，構成



▲ 實習課工作坊（來源：實習課工綜館搬遷小組）

了一種雙重規訓的狀態。此時，學生與教師共享的不再是一自治空間，而是層層堆疊的「自上而下」與「自我監視」之治理結構。

四、結論

總結來說，在目前的搬遷過程中，城鄉所的空間轉變可被視為從「空間即自治實踐」走向「空間即治理載體」。學生不再是自由形塑空間的主體，變為由所方定義、監視與規範的使用者；老師們作為監視者與被監視者，其教學自主性也受到限制；其中受搬遷影響最大的公館樓學生，其意見也被搬遷計畫的討論制度忽視。藉由傅柯 (Foucault, 1991) 治理術的觀點，能以「技術—權力—主體」的三元視角作為結論：在工綜館搬遷計劃中，「技術」體現於制度化的空間管理措施，包含空間技術 (spatial techniques) 下的門禁制度、知識技術 (techniques of knowledge) 下的研究室與教室空間設計、話語技術 (discursive techniques) 下的搬遷會議與論述方式；「權力」則滲透於這些技術背後的治理邏輯，使教職員與學生的行為受到引導、監視與規範；而「主體」則是在這些治理過程中被形塑而生的，是那些在制度中學會自我管理、合理使用空間，並調整其論述話語以符合規範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作為學生以為自身是「自由參與搬遷計畫」的主體，實則已被納入治理邏輯當中，這樣的治理機制並非單向的壓迫，而是一種透過細緻空間技術操作所運作的權力體系，使每一位個體都在治理中參與治理、在規訓中

建構自我，最終導致原本充滿自發性與實驗性的「異質空間」被逐步制度化、自然化，空間潛力與知識生產的方式也在此過程中被重新編碼。

筆者認為，本次的搬遷議題被課程編排與學分制度簡化成課程成果，弱化了學生、老師與實際受搬遷影響之學生的參與機會，消弭了城鄉所內部群體的複雜性。即便以參與式規劃為搬遷核心，實習課每位學生盡力搜集每位城鄉所成員的意見，成果仍然有限。作為提醒，我們必須接著關注，如何讓該搬遷議題的討論更開放，且「參與」不該被收編為制度下的一環，而使得知識與空間的生產（搬遷的討論與呈現的最終結果）失去了應有的批判張力。或許值得慶幸的是，搬遷尚未動工，搬遷議題仍未結束，此次搬遷也不會是城鄉所流離旅途的終點。希望藉由分享筆者自身之參與及觀察，期許後續搬遷過程的順遂。



▲ 公館樓走廊成為社會運動的對話場域（來源：筆者拍攝）

參考文獻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Vintage Books.
- Foucault, M.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G. Burchell, C. Gordon, &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 87–10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4), 777–795.

評論投稿

傅柯的空間與權力分析：
以實習課的
宜蘭演藝廳策展為例

◎ 撰稿：黃琢允 | 審閱：曾曉渝

一、前言

當代大學中以「實習」為名的課程，往往肩負地方參與、知識應用與學生職涯能力培養的多重期待。然而，在這些看似開放的制度設計中，學生所面對的選擇與行動自由，往往受到結構性框架與話語規範的深度制約。筆者參與的城鄉所實習課程即是一例，該課程以宜蘭演藝廳為核心，要求學生進行策展操作，旨在呈現該建築作為城鄉所重要里程碑的意義與其模式語言的象徵價值。然而，在執行過程中，我們不僅面臨場地未定、教師指引多變的情況，更感受到對立場與詮釋方向的隱性要求，整體經驗充滿了治理性操作的痕跡。

本文將以傅柯晚期的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分析框架為基礎，探討學校如何透過制度性話語、空間調度與實踐規範，塑造出一種具備特定地方想像與象徵意義的知識實踐主體。本文將分別聚焦城鄉所實習課程的制度與宜蘭演藝廳的空間象徵角色，分析其中如何運作權力技術、如何生產地方治理的心態，以及作為學生的我們，是否可能在其中產生反身性的主體實踐與批判縫隙。

二、城鄉所作為實踐體制的治理場域

在傅柯 (Foucault, 1991) 的治理術概念中，權力並非自上而下施加的壓力，而是一種

在制度、語言與日常操作中生成的「導引」，也就是一種讓個體看似自由，實則在既定規則內調整自身行為的作用。城鄉所實習課程在形式上雖以學生主導為口號，實際上卻透過「開放討論」、「地方連結」與「文化行動」等進步語彙，建構出一種高度預設的實踐框架。教師並未明言策展期待，卻在各種暗示中逐步形成期待輪廓。例如宜蘭演藝廳作為「建築典範」與「地方治理成果」的定位，無論在討論、回饋或課程說明中都被默默推至核心。即便學生心中有疑問，是否能在展覽中呈現出觀眾冷清、地方連結薄弱的現實面，卻很可能礙於展覽地點的不確定，形成一種隱形壓力而難以明確表示。傅柯所言的「治理術」正是這種過程的體現：不是直接壓制批判，而是將批判從選項中消除，讓學生看似「自願服從」——儘管看來有更多的無奈。更重要的是，策展空間本身一直到期中皆未定，學生在學期課程的一半，仍然不確定策展空間是在工學院大廳還是宜蘭演藝廳或其他空間。這種空間的不確定性，非但未提供靈活操作的自由，反而成為一種治理的延伸，讓學生因為場地未定而更需迎合課程期待，也更依賴指引中的象徵性語言。

這種治理並不只由上而下發動。學生間的比較與競爭也成為治理機制的一環。「誰更積極？」、「誰與地方團體建立連結？」、「誰的設計更具地方特色代表性？」，這些非正式評價標準構成一種側向監控，讓學生在彼此的眼光中自我規範。再加上課程要求與場地安排的不確定性，使學生長期處於準備與等待之中，使主體主動調適以適應風險，而非反問風險本身的存在是否合理。傅柯提醒我們，治理性最大的力量來自於其「非暴力性」與「自願性」。就動機而言，學生願意投入，是因為這是未來職涯的資本；學



▲ 宜蘭演藝廳 (攝影：黃琢允)

生配合組織方向，因為這是取得好成績的正當途徑。然而，正是在這種非強制性的結構中，權力得以深化、擴張與自我再生。

正如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對全景敞視主義 (panopticism) 的描述，現代教育空間雖不再需要真正的監視塔，但透過評量制度、師生互動與自我期待，學生自動地內化來自上位者的凝視與評價，進而調整自身行為 (Foucault, 1975)。在城鄉所的課程中，我們不會被明言要求「說好地方故事」，但我們早已知道什麼樣的敘事是被期待、被稱許的。這種「可見性下的自我治理」正是全景敞視邏輯的延續。

三、宜蘭演藝廳作為象徵治理的空間技術

若說學校是治理的主體場域，那麼宜蘭演藝廳則是治理操作的對象空間，甚至成為治理性的象徵投影。這座建築在課程語境中，被不斷形塑為「文化里程碑」、「建築語言成果」、「在地治理案例」。這些定位看似是事實，實則是一種學術話語下的象徵工程。學生被要求透過策展「重新詮釋」宜蘭演藝廳，但實際上詮釋空間已被語言所包圍，我們無從真正介入現實中使用者對這座建築的情感與疏離。

事實上，筆者觀察到宜蘭演藝廳當前在地參與度低、觀眾稀少，其文化象徵力早已不如課程所假設，

◀ 實習課現場場勘 (攝影：黃琢允)



「宜蘭演藝廳在城鄉所實習課程中的角色，遠不僅是一個被策展的「場地」，而是一個具有高度治理性意涵的象徵裝置。」

策展的背後似乎隱隱暗示著彰顯城鄉所的光輝與社會貢獻才是策展的真實主體與目的。此外，學生在課程設計中，似乎也被賦予了「補上落差」的任務，而非一種回應演藝廳今昔落差的洞察。學生成為象徵治理的技術補丁，用創意手法填補政策語言與地方現實之間的裂縫。這不只是一場展覽，更是一場對地方認知的治理性再製。

在傅柯的治理術分析框架中，空間並非權力作用的被動背景，而是治理策略得以具體實踐、象徵化與事件化的關鍵場域 (Foucault, 1991)。空間承載的不只是物理功能與使用權限，更是一種「心態 (mentality)」的物質結晶。從這個角度來看，宜蘭演藝廳在城鄉所實習課程中的角色，遠不僅是一個被策展的「場地」，而是一個具有高度治理性意涵的象徵裝置。首先，宜蘭演藝廳在本課程中被界定為一種「值得書寫的地方」、「具有模式語言可被展示的空間」，這種象徵性定位實質上來自於一種內部的、學術制度自身的治理需求。它不只是策展的對象，更是一種地方治理話語中被構造出來的「地方性」典範。從演藝廳的建築設計、建成脈絡、以及其作為城鄉所與地方文化發展關係的歷史節點來看，它確實曾被寄予厚望，作為宜蘭文化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然而，這種「歷史性價值」在現今是否仍具有在地連結的實質效力，以及是否仍能驅動使用者與居民的文化記憶與情感認同等議題，是課程設計未能有所觸及開放討論的。在課程的介紹與指導教師的策展建議中，回過頭看見的反而更多是宜蘭演藝廳的建築本體，以及相



▲ 演藝廳對面的東嶽廟 (攝影：黃琢允)

關的表演藝術工作者，當然學生應該要有能力自行去挖掘更多的田野資料，但教師的資訊與建議再次造成前述的「導引」效果。如此，學生也僅成了在象徵性地位已經被預設的前提下，進行一種形式上的「再詮釋」的敘事者。這也體現了知識 (包括對真實的認定) 與權力之間相互生成的關係。



▲ 小組指導老師康旻杰老師 (攝影：黃琢允)

四、結語

從課程設計到空間的操作，我們看見治理如何透過語言、制度與空間安排，使學生成為能夠自我管理、自我合理化的知識主體。這並非來自單一命令的強制權力，而是透過一套導引選擇、形塑意志的規範機制。若從傅柯權力理論的歷史演進來看，這樣的治理模式可視為對早期「全景敞視主義」的一種轉化延續。雖然沒有明確的監控者或評鑑標準，但制度性話語與同儕關係已形成一種隱形監視結構，使主體在可見性中主動調整自身行動。在這樣的敞視環境下，學生不只是被教育的對象，更是治理邏輯的自我實踐者。同時，宜蘭演藝廳在課程語境中所承載的「地方象徵性」，亦被形塑成一種「異托邦 (heterotopia)」 (Foucault, 2008)：一個理想的文化節點，一個象徵地方治理與機構貢

獻的空間鏡像。這樣的異托邦操作，強化了特定權力話語的可視性與正當性。唯有透過反身性、語言批判與倫理實踐，學生才能在這樣的治理框架中培養出一種不順從的敏感性，進而探索知識實踐的另類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可能逐漸建立面對專業的權威感時，如何看、思、做，或者說 (Schön, 1987)。在治理性密佈的教育場域中，全景敞視主義仍潛藏於機制中，而異托邦式的象徵空間亦仍主導著「真理」的呈現方式。

參考文獻

- Foucault, Michel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Foucault, Michel (2008) "Of other spaces." (trans. Lieven De Cauter and Michiel Dehaene). In Michiel Dehaene and Lieven De Cauter (eds), *Heterotopia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in a Postcivi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Schön, D. A. (1987).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劉可強老師 (攝影：曾曉渝)



前言

在本學期的實習課中，康旻杰老師曾經邀請劉可強老師於實習課課堂上與陳育貞老師一同分享當初參與宜蘭演藝廳設計的經驗，在實習課最後的評圖中，老師也一同與演藝廳組的同學完成了本次的評圖。因此，本期的城鄉通訊特別邀請到劉可強老師與我們談談宜蘭演藝廳的參與式設計，並分享當初回到城鄉所成立城鄉基金會的過程，以及老師過去帶領實習課的經驗。

在訪談當天，老師也邀請了最近出版新作《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並也曾經歷實習課的劉昭吟學姊到現場跟我們分享¹。本篇文章收錄了當初學姊在實習課中的經驗，透過與老師的對話呈現出學生與老師對於實習課想像的差異。

¹ 《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的書籍介紹，請見本期頁83。

理論、實作與很多溝通：實習課與參與式設計的基礎——劉可強老師專訪

◎ 訪問：林彥彰、曾曉渝 | 撰稿：林彥彰

從美國回到臺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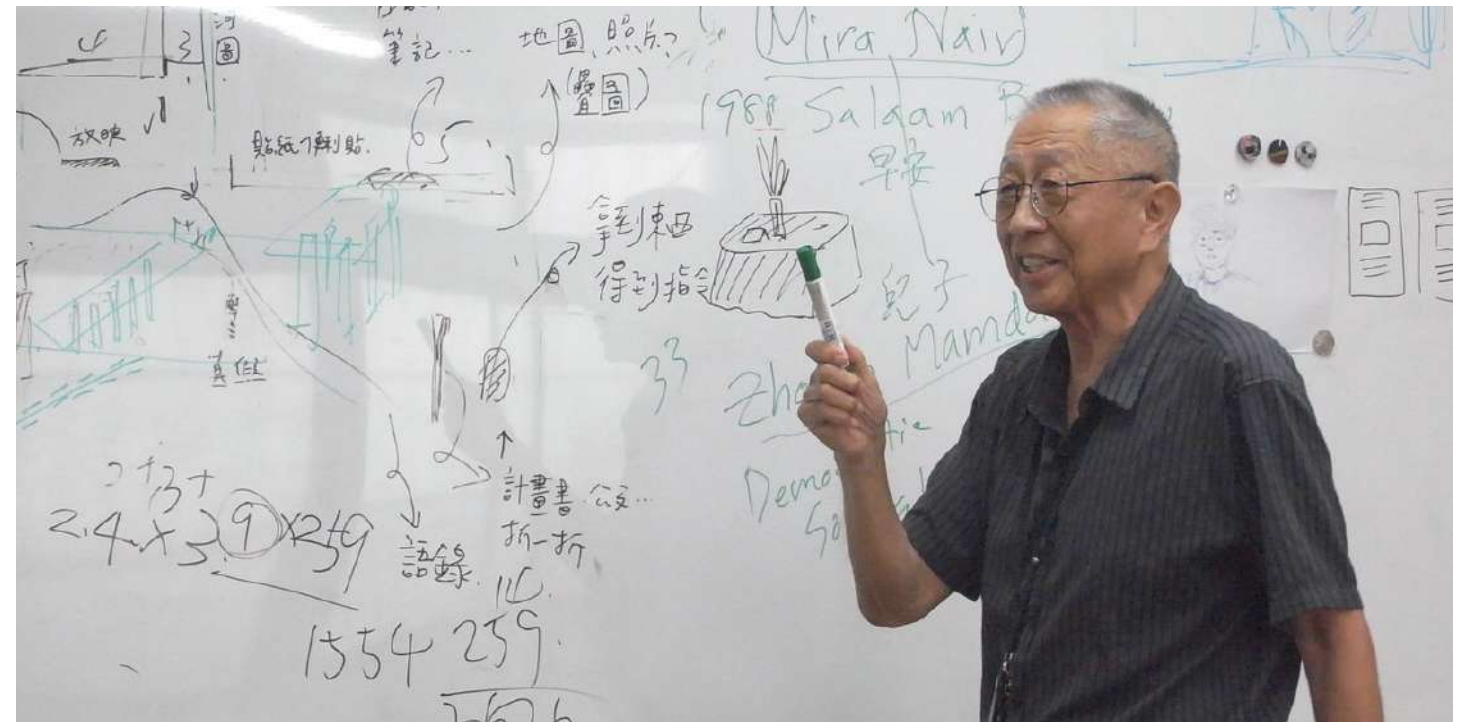
1990年，原先在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擔任講師的劉可強老師受華昌宜老師邀請，回到臺灣協助老師研究工業區開發，1990年的春天，劉老師便跟著城鄉所的師生一同參與此計畫。

計畫結束後，老師們詢問劉可強老師是否有意願在臺灣長期投入於實務課程。然而，劉老師認為比起單純地教書，實務層面的規劃設計是他更願意投入的領域。進而促成了城鄉基金會的成立，從實務層面與教學研究進行搭配。

基金會成立

在真正成立基金會前，老師們先成立了城鄉所的規劃室，規劃室主要目的便是協助城鄉所，接真實的規劃案；也透過這個機會，讓劉老師可以另外再去聘僱剛畢業的學生，或是在其他業界已經有一點工作經驗的工作者。

這也反映到原先實務課程的困難，在尚未設立規劃室時，老師會帶著學生去接案子，然而，對學生而言，要一邊念書、上課，同時進行實務工作的壓力過大。透過規劃室的專業工作者為主，結合實習課學生的成果，可以有效減緩前述老師與學生在接實際規劃案的壓力。



▲ 劉可強老師正為同學引薦電影《早安孟買》與導演Mira Nair。(攝影：曾曉渝)

實習課改革

起初的實習課受接案的形式影響，多半沒有連貫性，也沒有一定的尺度，對於多數非專業背景的學生而言，如此的課程設計沒有辦法讓學生有較系統性地學習空間規劃，因此劉老師建議必修的實習課應該讓每一位同學都要能夠接觸到大尺度、中尺度、小尺度的設計。這種對教學的堅持源自於老師自己學習建築的經驗，結合城鄉所不同背景的學生共同學習的實際情況：

你如果是建築背景的話，多半你是「從小到大」的，先設計一個小房子；甚至從室內設計開始，老師給你出一個小題目，然後我們那邊（指做設計的學生）再做得比較大，像是都市設計。可是規劃學院的訓練比較是從大尺度的變成小的，那我們現在城鄉所不同背景同學都混在一起，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讓每一位同學，不管你的背景是什麼，可以是中、小尺度都有一點經驗。那我自己是建築背景，我大學是在美國唸的。我那個學校也有一點怪怪的，就是我一開始做設計，第一學期就做了一個很大尺度的題目（也因而牽涉到周遭更多人事物），我那個時候就很好奇，他們那種教學方式到底是為了什麼。後來我很多年以後，我慢慢體會到，如果是一個好的建築，它多半是跟他周遭的環境有一定的互動跟關聯，它不是獨立存在的。

老師也以現在的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北藝中

心）為例，北藝中心的設計與周圍的聚落紋理差異過大，讓城市變得更加混亂，而使它無法被稱作一棟好的建築。因此，若實習課可以讓學生嘗試結合區域、地方、建築等不同尺度，或許有助於學生們在學習的過程中思考好建築的必要特質為何。

除此之外，劉老師也認為通才的教育是城鄉所的特殊之處，也是城鄉所教學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王鴻楷老師在很早的時候就提出這個通才的概念，後來很多年以後，大家有點把它忘掉了。我們再把它提出來的時候，就有人說通才是「什麼都不是」，這才叫通才。但我們那個叫做專業的通才，意思是說，你有你自己專長的那個部分。如果你是化學系的，你是理工系的，或者你是文科的、哲學的、文學的，你有你對事情的看法、研究的方法、價值觀跟態度。這個是你的專業，你繼續發揮沒有問題，但是我們現在要來共同解決我們面臨的環境課題。

老師鼓勵非空間專業的學生們可以對自己的空間感更有自信，也鼓勵這些學生可以更加踴躍地嘗試繪圖。老師同時提到對空間的看法：「我們沒有人躲得開空間，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空間，我們身體就佔據那個空間，我們就活在那個空間裡。」鼓勵我們以身體為度，去思考空間的尺度以及如何將圖面繪製出來。老師認為現在許多建築



▲ 劉昭吟學姊 (攝影：曾曉渝)

專業系所在訓練非本科學生時，時常會希望將這些學生訓練為建築科的學生，這種做法並不尊重原先非本科的專業。

但同時，在城鄉所多元專業的前提下，學生要如何整合不同專業？不同專業之間對地方的看法也會因為專業不同而有差異，在此情況下，實習課時常會成為學生之間存在張力的場域。

非專業背景學生視角下的實習課

談到實習課的實作過程，劉昭吟學姊也以學生的視角分享了她當時與其他同學互動的過程：

我們那個年代其實專業背景的都會被我們非(專業)背景的欺負，非背景最厲害的就是那張嘴巴，我不會做，可是我讀書比較快啊，然後嘴巴講出來比較快。其實我們那個年代本來有一些很有創意、很有設計感的，但是建築專業的來了以後，都講到他們都做不出設計來了……我們那時候太強調批判，你怎麼說、怎麼做都是錯的，我們非背景又被老師罵，就是你永遠有一個對立面，就是你被那個對立面打，或者是你打他們。加上我在研一的時候結婚生子，所以我的實習課跟這個基礎環境設計，都被同學放過了。後來就沒有人指望我要有空間的概念……一講到空間，我就說這個我不會啊、你們弄吧；你們怎麼弄我都同意。

學姊認為他在實習課的過程中，體驗到的並不如老師所想的如此和諧，而是一個自我矮化的過程，學姊感受到沒有人對他的空間設計能力有期待，這也讓學姊開始對自己的空間感感到不信任。

一直到從事研究嘉庚故里的模式語言時，學姊才認知到空間作為一種本能，是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也是可以被喚醒的。因此，與劉老師對於非空間專業的同學的鼓勵相似，學姊也認為，作為非專業背景的我們可以更加相信自己的本能，給予自己的空間感較多的信心。

除此之外，老師則認為實習課的機制其實與政府的運作過程相似，一個都市計畫的案子通常也會涉及到不同專業背景的社會人士一同參與，在這樣的情境下僅以都市計劃或建築專業進行設計是不足

的。實習課的存在可以讓學生在學校時便開始學習，如何與不同背景的同儕相互合作。而這種跨領域的合作時常也能夠催生出意想不到的解決方案。這也與老師一直以來致力於以參與式設計作為設計方法的目標相似。

參與式設計：宜蘭演藝廳的實踐

回到老師剛回臺灣不久的1990年，宜蘭縣政府委託劉老師與當時的規劃室為宜蘭縣設計演藝廳，受到柏克萊黑人劇場(Black Repertory Theatre)的啟發，老師認為不同的族群都有自己講故事的方式以及偏好。以非裔社群的表演方式為例，他們通常會有許多不同的故事同時演出；甚至會將臺下的觀眾也作為表演的一部分，最終在將之串聯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這種劇本設計與傳統的劇場設計必然有所出入。因此，在劇場設計上必然會需要能夠與他們的表演形式可以結合的設計。

老師在設計的過程中開始去思考，宜蘭的文化是什麼？演藝廳與周圍環境的關係為何？又應該如何把這種文化融入到空間的設計之中？最終，借用模式語言，從小到大逐步拼湊，將原先小小的劇本、故事變成一個空間，然後再一點一點把它湊起來。這個過程中，老師也找到了國立藝術學院(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邱坤良老師一同參與設計，由邱老師帶領演藝廳軟體的設計，逐步勾勒出演藝廳的演出形式，以及演藝廳與周邊的環境、廟會和其他的社區的互動方式。

除此之外，老師也十分希望作

為委託人的宜蘭縣政府必須參與到整個設計的過程之中，要讓這些政府職員了解到宜蘭演藝廳的設計過程，讓他們理解為何宜蘭演藝廳需要這樣設計。

那個時候我們做的演藝廳規劃都在海外會(臺大中非大樓)，那時候縣長他們每兩個禮拜親自跑來跟我們開會，然後我們就做模型給他看，然後慢慢去講這個模式到底要如何把它拼湊起來。我覺得這對很多人其實影響蠻大的，不只是演藝廳本身，就是對於後續縣政府如何處理他們其他的案子都有一點作用，他們會要求業主參與更多，也對游錫堃後來當行政院長有有一定的影響。

在這過程中，老師以及老師的團隊不僅需要考慮演藝廳對在地的影響以及如何與在地文化結合，更需要考慮演藝廳對於當地的影響。在現今演藝廳的現址，原本是給老人活動的老人館，最初演藝廳的進駐引起了在地居民的不滿，認為演藝廳排擠了他們使用公共設施的機會。因此，演藝廳的設計也納入了給在地居民的活動空間。

不僅是演藝廳，劉老師在帶領實習課時也十分希望透過參與式設計找出原先不會出現於規劃設計討論中的群體。老師接著提到過去在澎湖二崁的計畫。起初願意參與會議的成員多為聚落中的男性青年，女性多數不願意參與過多的討論。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希望營造出一個不論甚麼樣的人都可以在同一平台互動的氛



▲《城鄉通訊》編輯與劉可強老師、劉昭吟學姊合影 (攝影：林彥彰)

圍。透過改變會議的地點，從廟宇移往其他地方，讓原先不願現身、或者無法現身的家庭主婦出面講述社區的歷史以及故事，更甚至最終超越了原先願意講故事的男性。

另一個案例則是在三重後竹圍的社區公園，一個社區公園中的使用者可以是老人、青壯年、青少年甚至是兒童。因此在最初的設計，兒童亦有參與到設計的過程之中。然而，在最終決定方案的過程中，孩童卻沒有決定權，在當時引起了孩童的不滿，也因此讓決議的過程暫緩，透過溝通協調來確定一個所有人都有機會參與的決議方式，也由此化解了原先的紛爭。這個案例更影響了當初實習課的學生，讓陳允中學長在多年之後投入了香港的社會運動。老師認為：

這個就是參與的效果，它會影響你，不管你在做什麼事情，你可能是在政府機關當公務員，可能是在學校教書，可能根本就不是這個專業的，做一些別的事情。但是你腦子裡有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公共的，那它需要有一個公共的過程，因為這個過程需要讓不同的、受到影響的人，能夠參與進來。更多的就是我們社會還是不公不義；有錢人越有錢，窮人越窮，像美國現在這樣已經搞得亂七八糟了。但是我們臺灣要避免那個越來越兩極化的狀況，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去幫忙那些有需要被照顧的人、那些比較低收入的窮人，例如樂生療養院、寶藏巖等等，讓他們參與，然後再去跟政府溝通。

老師也肯定了許多學長姊目前深耕在地的成果，也認為實習課會是一個能夠給這些學長姊更多協助的方式，建議學生可以主動關注並嘗試提出實習課的提案，但前提是有老師願意指導。老師認為，返鄉工作多少會覺得有點孤單，透過這種方式給予地方工作者關注以及協助，或許可以讓在地方的工作者更有辦法堅持下去。

基金會的後續發展

訪談接近尾聲時，我們也向老師詢問了基金會的未來發展動向。近年來，城鄉基金會逐漸從實務的規劃團隊轉型為政策推廣的平台，在這過程中也遇到了許多的困難，也因為轉型的卡關導致近幾年的實習課與基金會之間的聯繫不若以往緊密。同時，轉向政策面的過程或許也會導致過去基金會與實習課以實作為導向的合作方式出現變化。對此，老師認為轉向政策面並非壞事，許多學長姊在畢業後選擇進入公務體系，然而後來在這過程中有許多學長姐也會感受到不適應。老師認為若是可以在實習課之中接觸到政策面，或許有助於學生提早了解政策制定的運作模式。至於未來在劉欣蓉老師接手基金會後是會否重新將實習課與基金會重新整合或許有待觀察，但老師仍對此抱持期待。

城鄉大桌

劉可強老師回應〈傳柯的空間與權力分析：以實習課的宜蘭演藝廳策展實作為例〉一文*

* 原文請詳見
本期頁 36

Q1. 想請老師先簡單回應同學在文中的幾點評論。

劉可強老師：

此文章主要有三重點，傳柯的治理場域論、實習課本身的操作、以及演藝廳的建築。前兩點我不評論因為我不是當事人，細節了解不多。至於演藝廳本身的規劃過程，我是當事人。文章內提到的有兩點。我的詮釋，一是演藝廳的源起是建立在地地方文化的基礎上，必然要與地方利害關係人緊密的互動連結。可是這連結已式微，看不到動力，也就文章中的「今昔落差」。這觀察很關鍵，但需要大量的田野去佐證它的內涵和細節。如要追這一題的話，建議可先訪問邱坤良老師。他有看法也寫過文章。

第二是有關展示設計是否淪於「形式上的再詮釋」。這一點我覺得實習課同學們其實有發揮一些創造性，有一些突破，固然是在框架中，例如，把活生生的人當做展示的道具，只有在很前衛的行動藝術展中才看得到的。（只是有點遺憾沒有讓這幾位多些表演的機會。）

關於「培養不順從的敏感性」，我認為敏感性可以培養並內化，但不順從是爭取來的，不是被賦予的。舉例，多年前在實習課中同學們爭取把題目從中正區轉到新店區的溪洲部落，才有今天的都市原住民部落再生的重要案例。

Q2. 請問老師如何看待同學在文章中提到的實習課與在地需求之間的差距？

劉可強老師：

實習課在學院體制內的運作，例如學期時限、具體可被評分的成果、同學間的分工合作等等，都與在地需求、真實的

社區議題的解答，有很大的落差。城鄉所的元老們在創所時就已注意到這差距，也就是說傳統主流的規劃設計訓練並沒有回應在地的需求。因此才有城鄉所特殊的一些師資、招生、課程，及實作練習的安排，試圖克服所認知的落差。其目的在於盡量降低落差，拉近距離。這幾十年的嘗試成效如何當然有待公評。不過既然接受在體制內的運作，必然也得接受它的限制。（除非願意離開體制，案例不多，我只知道例如在美國北卡州的黑山學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但就算如此，也未能真正回應制度的限制解決在地的需求。）

除了以上這個困境外，我們還得面對全球學術文化的霸權。就算我們很盡力拉近距離，盡力回應地方需求，我們大體上運用的理論和經驗都是西方的。這造成一種特殊的現象是進了社區，接了地氣，甚至於成為社區長期的一份子，但思考邏輯、使用的理論基礎都是從遙遠的西方社會移植過來的。（當然包含自己在內。光是要克服這一點就是一個巨大的反身性，反省性工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具挑戰性的發問是建築與城鄉規劃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嗎？到底拿了一個建築與城鄉規劃的學位，碩士、博士，是什麼意思？與地理、社會、人類，土木等學科有何不同，為何要如此分類？這裡我的看法是，如果務實點看待人類生存條件的基礎，大概脫離不了水，空氣，和三度空間。而三度空間是可以被營造，被改變，被設計、規劃的一項工作。也因此空間規劃設計成為人類生存的重要目的之一（例如房地產開發、城市的發展、歷史建築、聚落保存等等）。但如仔細觀察，我們一般都以營造一個「好」或是「美」的空間為目的。這個歷史的過程，把空間作為目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題。我這裡想提供給各位參考的是「空間作為方法」，作為推展社會（社區）進步的方法。如果對空間有此概念上的重新認識，我認為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在規劃設計領域的一些困境。我知道很多人的反應是：對呀，空間原本就是目的也是方法，無須小題大作。但請再想想，空間如何作為方法才是關鍵。（在本期訪談中我推薦了一本新書《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或有助理解我的觀點。）



▲ 劉柏宏老師 (攝影：曾曉渝)



劉柏宏老師最為人所知的身分是經典工程顧問公司和原典創思規劃顧問公司的主持人，也是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發起人之一，並曾擔任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常務理事和理事長。永和的「樂活共生實驗基地」、萬華的「一碼村IMMA」、新店溪畔的老屋「河神的丸子」和馬祖等地，也曾看到老師的足跡。在113學年更增加了另一身分，以實習課導師的角色重回城鄉所。

這次訪談安排在老師的事務所。事務所就隱身在永和區車水馬龍和民居林立的社區大樓當中。八樓的門外堆放著從剛結束的社區空間「樂活共生實驗基地」搬回的物品，各專案的同事不是正在外地奔波，就是在正在前往某個社區的路上。劉柏宏老師此時也是剛結束外縣市的會議後趕回事務所，前一天更進行了馬拉松式無間斷的視訊會議。這種忙碌的生活，彷彿就是

以參與式設計 作為信仰—— 劉柏宏老師專訪

◎ 訪問及撰稿：曾曉渝



▲ (左至右) 連江縣環境景觀總顧問、桃園社區規劃師計畫，與社區討論「里的願景」、永春陂生態濕地公園設計的民眾參與過程 (提供：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劉老師的日常寫照。雖然分身乏術，但劉老師在所長康旻杰老師的盛情邀請下，去年暑假時仍臨危受命接下了實習導師的艱鉅任務，主責推動工綜館規劃設計，並嘗試把自己最擅長的參與式設計融入教學現場，成為「快閃事務所」（劉老師所發想的工綜館規劃組別名稱）的主理人。

劉老師擁有多多年業界經驗，從景觀和都市設計、室內設計跨足策展和各種社區營造。除了是城鄉所的學長，過去老師也曾推動工綜館三樓（目前的沙發區）的模組化使用和執行公館樓的空間改造，無疑是帶領今年實習課的適合人選。但回顧劉老師的學經歷，原來老師並非一開始就確定自己的志向和價值，大學時更一度經歷轉系的轉折，後來更是在業界闖蕩了一段時間後才來到城鄉所進修，嘗試為實務工作中對規劃設計的種種疑問追尋答案。



▲ 永春陂生態濕地公園設計案 (提供：劉柏宏老師)

初生之犢：對自然的嚮往

「其實在大學的第一年，我不是景觀學系，我是讀森林系的」，劉老師娓娓道來這段轉系的經歷。當年他因為喜歡森林而選擇了這個學系，高中時期擔任登山社社長，年紀輕輕就已登上玉山，一直對於自然環境有著濃厚的興趣，也特別嚮往跟著學長姐走進那些原始森林風貌的地景。

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有落差。「但是因為要背樹木學名，我真的很辛苦」，劉老師感歎當時繁複的植物學名成了他在森林系最大的挑戰。與此同時，他開始留意其他與自然相關的科系，也發現自己對建築有興趣，「可以把這個兩個元素加在一起的，我覺得景觀系就是這樣的一個專業」，於是毅然決然轉入了當時剛成立的景觀系。然而當時的景觀系仍在發展初期，課程內容偏重古典園林的領域，對生態的著墨並不深。劉老師坦承心中仍嚮往著自然的生態環境，這也為他後來的職業發展埋下了伏筆。

畢業後的劉老師，即便在當兵期間也沒有忘記專業，「兵營裡面需要有營區的規劃，那長官就交給我」，營區規劃經驗意外成了他職業生涯早期的珍貴訓練。退伍後，他先是進入室內設計領域，在一家有做別墅庭園設計的公司工作，負責從設計到施工的統包業務。此時的劉老師透過工作上的各種訓練汲取了豐富經驗，也慢慢把目光放到更遠大的理想。一年半後，他終於有機會進入漢光建築師事務所，跟隨漢寶德先生參與更大型的計畫，包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重要案子，也有了更多實踐古典園林

設計的機會，甚至參與見習了仿中國江南式園林的南鯤鯓大鯤園與現代式大台北華城社區等的規劃設計。後來在漢光學習兩年半左右後，劉老師開始思索景觀設計在現代臺灣的未來，同時卻剛好收到大學同學的創業邀請，因此正式踏上了創業之路，成立了經典工程，成為職涯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不忘初心：從服務資本回到對人的關懷

劉老師將自己35年的事業歷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私部門的開發案。經典工程成立的前十年，幸或不幸的適逢臺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臺灣那時候的經濟突飛猛進，房子蓋得非常多」。從老師的形容中，可以想像那是一個放眼四望都是新落成的住宅大樓的年代。經典工程積極參與了這波開發浪潮，初期服務的都是建設公司和開發業者。

然而就在這個階段的第三、四年，劉老師開始在大樓設計的過程中意識到現實的困境，這似乎與自身的價值觀產生了衝突，成了心中的疙瘩——他發現了使用者的缺席，「我覺得跟使用者對話，產生使用的機能，然後讓我們的設計可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這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只是跟長輩或是爸爸媽媽談，我是跟他們全家一起談」。這種「參與式」堅持乃部份源自過去室內設計的經驗，對他似乎自然不過，對於案主卻不盡然。在做大樓的開放空間設計時，他想到建設公司已經擁有屋主的名單，「房子根本還

沒有蓋,我覺得這是最最好跟使用者討論的機會,但我建議了幾次,建設公司都不採納」。他認為原因是建設公司不希望讓買方集結,擔心形成集體力量對抗開發商。

「怎麼不讓使用者跟我一起?」,這個單純的困惑促使了劉老師進入城鄉所追尋答案。同時他開始透過小學校園的設計案,進一步應用真正的參與式設計,「後來我慢慢接觸這個工作,我覺得也蠻有意思的,但這方面的論述深度好像也還不夠。我去旁聽了幾次老夏(夏鑄九老師)與老王(王鴻楷老師)的課,我覺得可以再讓自己的專業更進步。」

沒想到這段城鄉所的學習歷程竟徹底翻轉了事務所的發展方向,也改變了劉老師看世界的方式。劉老師回想自己學到最關鍵的概念是「跨領域」。他當時利用室內設計經驗,在工綜館三樓的小區域設計了模組化的隔間系統,讓每個同學都能規劃自己的工作單元,自由拼湊隔屏或牆面,從而找到了跟不同背景的同学溝通的語言。另一重要學習是「運用策略」,當年實習課的題目「臺北超高樓」極具挑戰性,但這過程中訓練出來的策略思維對他後來的事業影響甚巨。而對劉老師的人生最大影響的是,城鄉所的訓練讓他的價值觀產生重大轉變,「我覺得我們好像真的有點偏左,但我很認同」,也因此不再接豪宅室內設計案,比較不違和。

「城鄉所給我的訓練就是比較在以民為主的社會主義方面,關懷弱勢、關懷公共跟參與式設計對我影響很大」,最後公司業務也隨之逐漸調整,由此邁入公司的第二階段。事務所開始承接更多公部門的開放空間設計案,像公園、學校的競圖等。這個階段雖然仍以景觀設施為主,但參與式設計的種子已經深深扎根,並形塑了第三階段的核心價值。

參與式設計:工具背後更是一種精神

「參與式已變成我各個案子一定會用的工具設計方法,這變成了我的信仰。」雖已實踐參與式設計多年,但劉老師表示其信念從未動搖過,「因為我們自己也在一直在調整。」但他對於現況有著深刻的批判與反思。「臺灣常常說人是最美的風景等等,這些都



▲ 兩廳院捷運通道與排練場先期規劃
(提供:劉柏宏老師)

是非常表面」,他認為許多人只學到了參與式設計的初階工具,「一直copy(複製)那個工具。但參與很重要的就是溝通。反而溝通沒有學進去,變得不願意溝通,然後用參與當作表層。這是我也是非常、非常批判的」。

「參與式規劃設計或是說民眾參與已經是顯學,但是內容不夠深。」劉老師特別強調,「溝通不是只有聽或說,溝通很重要,有一部分是要說服你認同」,參與式設計需要深度的溝通策略,特別是當面對不同的社群或社區,而他們是否因認同某個議題在一起的人,抑或只是社區居民,也會影響溝通的策略,「細緻度跟深度一直都不夠,所以如何改善這件事情是我們應該有的任務」。談及參與式設計,劉老師也進一步寄語城鄉所和「快閃事務所」的同學們,「在所裡面的訓練要看到這個問題。不是說參與式規劃設計不好,而是參與式的實踐方法,深度跟核心在哪裡要讓同學知道」。

劉老師相當重視參與式和共好,這種關懷其實也是跟個人特質和背景有關,「我比較喜歡,或是我願意聽別人的想法與意見,這比自己在課程或是或是書上的學習更多。我自己從年輕到現在,甚至年紀越大,也越覺得是這樣的感覺。」在他成為一位父親後,這個特質更被鞏固。「老師跟孩子的對話就是同理,那這也提醒我在參與的時候,應該要有的態度」,在參加臺灣實驗教育現場中,與孩子的相處經驗帶給他很多的收穫,「跟小朋



▲ 樂活共生實驗基地(圖左)、一碼村IMMA(圖右)、河神的丸子(圖下)
(提供: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友都可以討論這件事情,不要說跟大人。我們要更有耐心」。

社區營造:一種永續的共好

「我覺得要為什麼要參與是為了要共好」,當問及何謂「共好」,劉老師給出了這樣的回答。參與式設計雖然是劉老師的信仰,但是這仍只是通往一個更大的目標的其中一種方法。「創造共好」四字,連同其他的理念,被刊登在事務所的官網上,是老師最常提及的價值之一。經典強調的是人與環境的共好;後來原典在2014年的成立則是要「認真去思考你如何跟人接觸」,實現

「人跟人的共好」,亦即透過策略方法去落實前述經典的目標。「所以我們不管經營哪個空間,就是讓大家一起共好」,從樂活基地到河神的丸子,再到IMMA,雖然社區不同、規模不同,但核心價值始終一致。但當擁抱如此價值,卻仍需面對現實中各個公有閒置空間的使用期限,又該如何調適?河神的丸子、樂活基地與公部門簽訂的營運合約都在今年一一到期。老師和團隊則發展出獨特的「快閃」策略。「本來是一個快閃的3年,(因為市政府看到社群的需求),我們變成快閃的9年,那這個快閃又

參與式已變成我各個案子一定會用的工具設計方法，這變成了我的信仰。

參與式規劃設計或是說民眾參與已經是顯學，但是內容不夠深。在所裡面的訓練要看到這個問題。不是說參與式規劃設計不好，而是參與式的實踐方法，深度跟核心在哪裡要讓同學知道。

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發揮影響」，樂活基地和馬祖的經驗都是最好的例子。「我們會不斷的資源再利用，就是這些這些可用的材料跟空間，我們不斷的在不同的地方應用，比較不會浪費」。而且社群曾經建立的網絡關係是持續不斷在滾動當中，把原本在不同地點的人透過各個專案連結起來。

而這種策略背後有著深刻的思考，「我們在設計營運或駐地空間（通常是老屋新用）的時候，本來就有這種心理準備，就是3年、6年。所以在設計和策略上就有這個想法，但是社群經營的影響是永續的。我們可以把它變成是線上，然後下一次如果有機會，又變成實體的空間，要有這種彈性。」劉老師最後強調這些空間應該是有理念的，也是在建立關係的。

在劉老師社區營造的豐富經驗中，深耕十年的馬祖應該說得上是投放最多心力的基地之一，至今仍在持續當中，也是老師的代表作。當地面對極大轉型的挑戰，包括軍人撤離後的發展壓力，常住人口也持續萎縮。劉老師和團隊以三個角色介入：景觀總顧問、文化合作夥伴，以及在地發展的推手。在深入了解當地生活和歷史文化後，劉老師的策略是為馬祖定義兩個

創造共好／ 參與式規劃

“

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讓同學們用最開心並喜歡的方式來理解我一直讓他們做的參與式的方法跟精神，雖然時間不夠，但是最希望做的就是讓參與式的精神得以讓同學認同。



▲ 於馬祖南竿策畫之展覽
(提供：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方向：一個是在產業發展觀光，用永續角度思考馬祖的潛力；另一個是用博物館的概念，四鄉五島就是一個博物館，讓馬祖人了解自己土地的價值。劉老師與團隊同時透過建立記憶庫等方式，記錄馬祖的好。這些社區的經驗印證著劉老師對地方的關懷和經營多年的一連串綿密關係——這些都是永續的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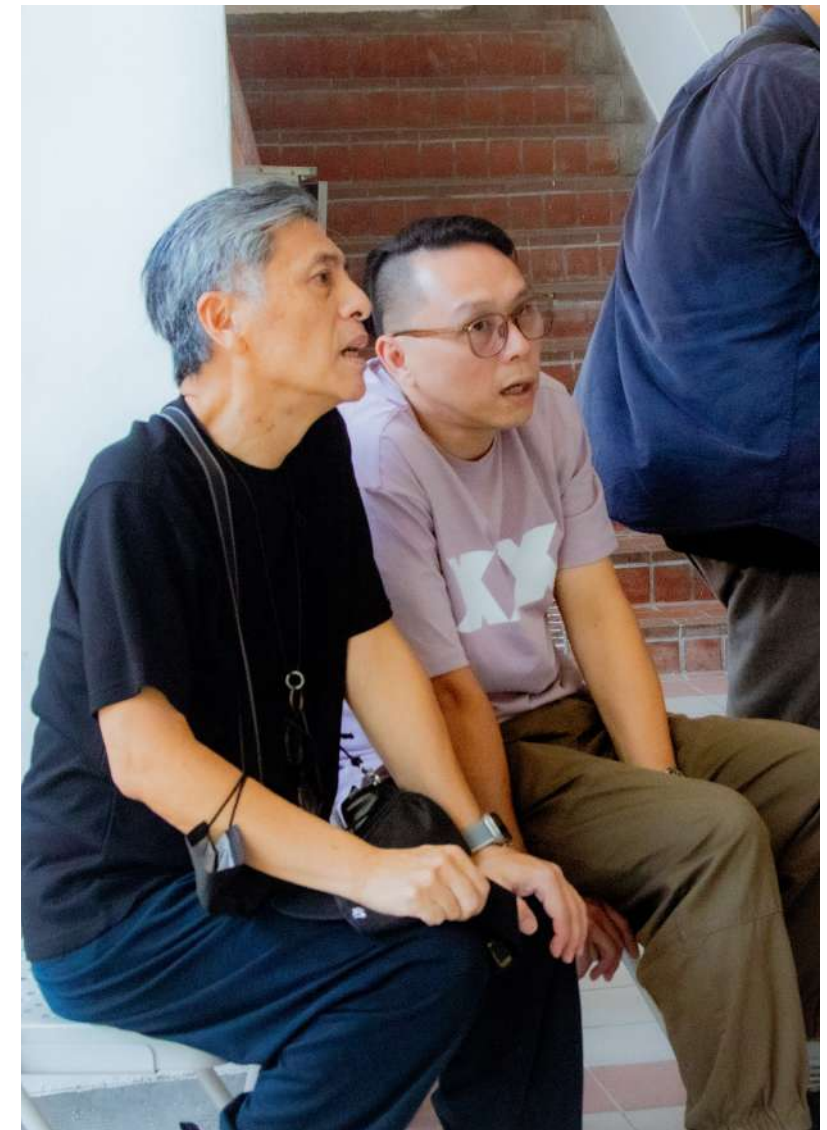
實習課現場：想讓大家喜歡參與式設計

從社區回到城鄉所，參與式設計的精神始終都是劉老師的主軸。在這學年的實習課中，劉老師組別的授課方式，也是秉持著如此精神，讓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和討論的機會，與事務所專業者共同引導學生前進之餘，卻同時給予學生充足的發揮空間。

對於實習課的課程設計，作為教學團隊的其中一員，劉老師認為模組化的操作值得嘗試，可惜的是時間較為緊湊。每一段城鄉所搬遷史的影響、跟基金會的關係，都來不及討論，一年時間在同一個議題上較能讓學生有更深入的體驗和學習，「如果以做參與的概念來看，這樣的一個細流會比較細膩，會有更多的touch（探討議題的機會）」。

從海外會、大禮堂、公館樓，經歷幾段流離搬遷，到這學年劉老師帶領學生為未來工綜館的空間使用作出規劃，劉老師認為城鄉所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仍是師生互動。「我自己在研究所的感覺就是師生之間的互動頻率跟關係，比現在的更多、更好」。他特別重視空間的開放性產生的所內師生、學生間的關係影響，「我們一樓是希望大部分的時間都是開放的，你可以組裝，是可以改變隔間的單位，但原則上都是開放，讓城鄉所開放。」他認為透過這樣的空間設計，讓師生不管在課程或是在教室以外，都可以有機會碰到，嘗試重建過去「基金會跟計畫綁在一起，那種上課在一起、計畫在一起、抗爭在一起，並一起學習、一起管理，這種大家庭的感覺」。

隨著學期結束，一學年的實習課和老



▲ 劉老師參與「城鄉空間實驗室」三階段互動式工作坊（攝影：司馬）

師的「快閃」教學也隨之暫告落幕。「說快閃，其實它不是永遠存在的，它就是大家共同在一個空間或是有共同的想法，去讓這件事情更有亮點，更有新鮮感，大家一起努力，在那個時間盡力把它做好」。劉老師最後為他帶領的組別留下寄語，「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讓同學們用最開心並喜歡的方式來理解我一直讓他們做的參與式的方法跟精神，雖然時間不夠，但是最希望做的就是讓參與式的精神得以讓同學認同」。學期中的小插曲是老師因病必須離開教學幾週時間，最後在一番休養後才得以在同學們在所上舉辦的工作坊中現身支持，這段話也完美演繹了劉老師對教學的用心。

忙碌如劉老師，受訪過程中即便聲音因病沙啞，但談起參與式設計和共好理念時眼中眼神仍舊閃亮。馬祖的新空間即將開幕，樂活基地和河神的丸子的精神正移轉到新的場域，而在工綜館，一個融合參與式設計精神的學習空間也有機會慢慢醞釀。參與式設計作為信仰，不只是劉老師個人的實踐，更是他希望傳承給下一代規劃者的核心價值。

規劃的原點：施佩吟學姊專訪

◎ 訪談：張維哲、紀懷超 | 撰稿：張維哲
◎ 照片提供：施佩吟、郭博勝、城鄉所辦

R94級的施佩吟學姊，在學時期就樂於自己動手打造空間，在城鄉所大禮堂、公館樓的空間改造中都有他的足跡，同時也對於地方創生議題保持熱忱。畢業後，他跟隨著劉柏宏老師進入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成為規劃專業者，期間執行過大大小小的專案，穿梭於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與地方之間。凡事動手做、樂於感知周邊人事物的佩吟學姊，在因緣際會下於2020年來到馬祖，透過空間改造與老屋活化來推動地方創生，擔任起「西尾半島物產店」的創辦人，開啟了臺北馬祖往返的生活，持續將熱情帶到馬祖。近期，他著手開始了「馬祖第一座圖書館」的活化計劃，規劃以離島論述為主軸發展離島書店、登島人接待空間等。

空間的實習課

問起了重視實作、喜歡動手做的個性是從何養成，佩吟學姊跟我們說起：「碩一實習課開始我正式意識到說我是一個喜歡動手做的人，我是從丁組考進去的，所以對於課堂上的那些理論，或者是說對其他組同學們的專業，其實是抱持著一定的距離感以及蠻多的疑問。」而在跟不同專業的同學的磨合跟討論中，他也開始思考討論跟實作之間的搭配：「實習課充滿討論、充滿規劃，然後呢？我們到底要討論多少才叫做夠？有沒有可能討論一點點就同時做一點點？還是一定要討論完全部，再決定要不要去做？」也因此，佩吟學姊認知到了「邊討論邊實作」的想法，也影響了在學期間佩吟學姊在所上進行的空間規劃。

例如佩吟學姊碩二時的研究室位於公館

樓，從碩一大禮堂移動到公館樓讓他很不適應，也認為公館樓的空間需要改善。因此，他開始說服各種專業的同學幫忙、向老師同學借用各種器材，在拼拼湊湊下妝點自己想要的空間。例如，那個時候的公館樓地下室環境破舊又有衛生問題，剛好遇到所上即將進行的地下室施工改造，也因此，佩吟學姊興起了要參與監造與規劃的想法。當時適逢臺北市的日式宿舍跟老屋保存調查，公館樓借存了許多拆下來的木門、花窗、窗櫺、老桌椅。「整個雖然看起來古色古香，但看久就會覺得說，到底這些東西放在這邊幹嘛？我就開始又興起了改造的想法，我就問了張維修學長這些東西我們可以用嗎？學長也是說有一天我們要還回去，假設未來日式宿舍少了一個零件，就可以來城鄉所找，我再把它拔下來還他。」在這過

將規劃所學，付諸行動並持續地介入社會，以致於能在十年後回看行動帶來的影響力與改變，是我認為對規劃實踐最好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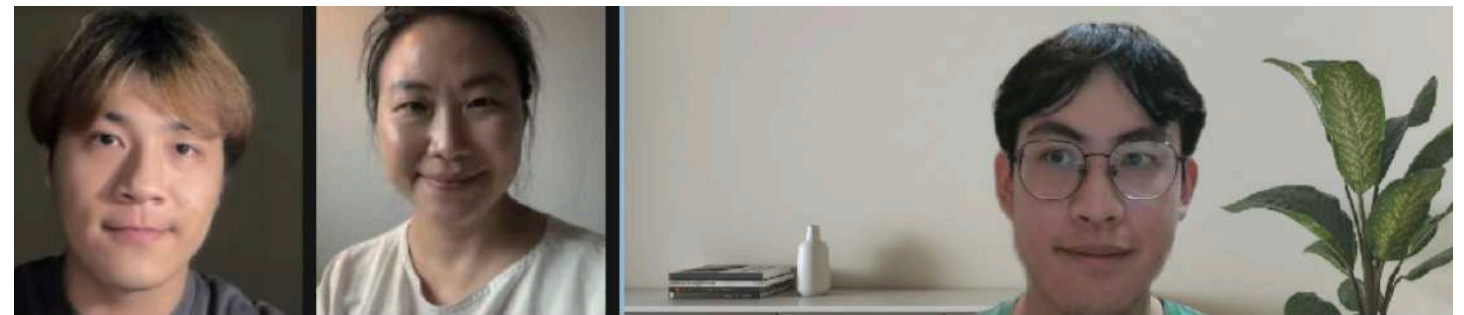
行動／觀察／溝通

程中，學姊找了许多同學一起畫圖規劃，也找了许多管道借用工具，最後，在眾多人不斷地努力下，地下室的花窗改造完成，也體現了在規劃的實作上，往往需要串聯眾多行動者的努力才能成真。

「在當下的環境，我如果看到了一個比現在更優、更好的方案，腦袋中就會出現一個自己規劃的藍圖。但是我不會CAD，我也不會畫畫，我就要開始去跟我的同學們請教。」

在這之下，佩吟學姊與同學們在公館樓打造出功能多樣的（不只是）研究室。「那個時候，我有一個學妹叫做陳盈蓁。他論文寫不出來就會很焦慮，然後就會開始煮飯，用那種很陽春的設備，像是小烤箱跟大同電鍋，但他煮出的成果好像米其林料理，之後她

在煮飯的時候，就開始有人說我要加一、加一、加一，後來變成她都會多煮一點。」學姊聊到與本次校友洄游另一位受訪者盈蓁學姊的研究室經驗，也正是在研究所時期一起煮飯、一起吃飯的溫馨回憶，培養出了盈蓁學姊的烹飪興趣。這也體現出使用者們打造出的空間機能服務，打破了過去習慣中研究室規規矩矩的空間，以及無聊的編制，創造出了人際之間的有機互動。至今，佩吟與盈蓁學姊仍然來往密切，並共同合作發展出「離島便當」計劃，這個透過料理而展開的地方行動，或許也可以追溯至過去在公館樓時的炊事時光吧！而佩吟學姊本身也在研究室中培養出了泡咖啡的興趣，他與同學郭博勝學長在研究室嘗試打造一個小小的咖啡吧臺，學長會自己去五金行購買木角料跟電鑽工具，還自行接電跟打燈，讓研究室多出了一個具有氛圍的咖啡角落。這些經驗也影響了學姊



▲《城鄉通訊》編輯與佩吟學姊線上合影/佩吟學姊（中）



▲ 公館樓吧台與上課狀況

對於規劃的想法：「我會去從這種人們喜歡待的比較久的地方觀察起，畢竟你是先去觀察到人們的行為，才會發現他們的需求，再透過行動形成有機跟彈性的小區域，但這是要慢慢成長的過程。」

遊說的技藝

在畢業後，佩吟學姊來到經典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上班，他也是公司中第一位非空間專業背景的職員。第一年擔任客庄聚落的督導團助理角色，在這之中，他往往需要穿梭於在地聚落居民與客委會之間，擔任溝通的協助角色。第二個案子，則是臺北好好看政策下的綠點計畫，透過參與式規劃引導居民跟社群參與政策，因為在實踐跟設計之前，往往需要跟利害關係人做大量的辯論跟倡議，綠點才能成功播種。後來，佩吟學姊開始思考臺北好好看「以綠地換取容積」的公部門政策價值與所學產生衝突之下，該如何做調適，「雖然城鄉所裡面有在談該如何倡議啊、我們就是要去改變政府。但是實習課是沒有辦法去教『那怎麼去影響政府跟政策？』」。所以學姊認為，面對臺北好好看這個爭議政策，也發揮了動手做的精神到他所從事的規劃工作，提供了身份轉換下的出口跟答案。

在專業規劃者中，每個案子都彷彿在跟時間賽跑，在時間的緊迫下，若沒有及時地介入改變或倡議，事情就會朝著我們不想要的方向跑，因此也訓練佩吟學姊打造了一套規劃實踐策略：「動手做只是一



▲ 2005年初入學適逢大禮堂準備啟用，後排左三為佩吟學姐。

個比喻，若你已經透過你的所學跟專業訓練，去預見了一件事情更好的模樣，你就會開始在你的腦袋裡面快速的轉換，包括改變的路徑、先後順序、利害關係人，要怎麼樣逐一的去遊說？然後產出行動的排序，就是『我要先做什麼，我才可以去影響什麼？』、『我影響了什麼之後，我就可以回來再跟原本的誰溝通？』這個在腦袋裡面形成的一套行動策略。」

因此，佩吟學姊在規劃過程中想辦法在每個階段進行不同的遊說與調整：看到設計圖哪裡怪怪的，就去研究設計師如何畫，再與景觀專業者討論如何將大家的想法融入設計，乃至於實際舉辦工作坊蒐集各關係人的意見，嘗試在規劃過程中長出自己想要的果實。佩吟學姊提到，以參與式設計規劃的經驗來看，如果承接了一個具有爭議或是抵觸了自己所知所學的標案或政策，就要開始思考，若是政策勢在必行，那我們如何走出一條不同的路？透過分進合擊



▲ 2007年畢業前與大禮堂最後合影

的溝通策略，讓自己不僅是政策執行的一環，更是規劃參與的一環，藉此創造出新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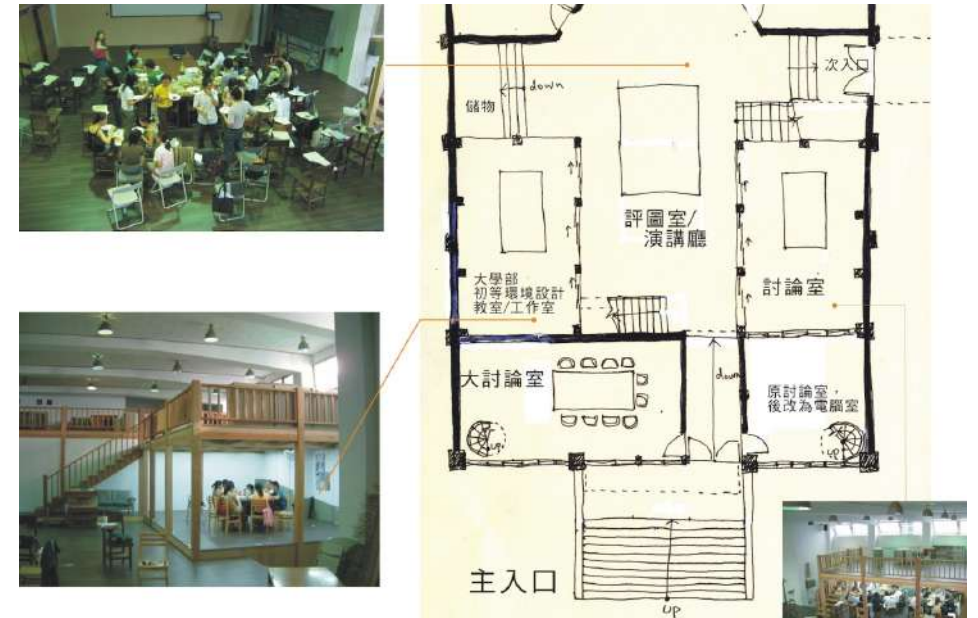
「規劃與參與的流程其實都只是為了一件事情，叫做『示範』，你要去說服市政府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會更好，因為政府它是政策的制定者，不是一個最進步或是最敢創新的一個單位，所以政府其實是非常需要真實的案例，然後這個案例必須要成功。」

佩吟學姊與經典工程團隊，透過數年的努力，讓羅斯福綠點計畫成為一個新的實踐。過去這個計畫曾招來批評，被認為僅能為都市帶來「暫時」的綠地，但透

過團隊的實踐，乃進而將這些綠地打造成不僅社區居民可以使用，周遭社群也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在這個過程中，學姊帶了不下百場的羅斯福綠點導覽，更透過一次一次的訪談去確認居民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串聯不同的專業者的過程中將在地的聲音帶入。「一般人若你不具有閱讀圖面的感知能力，你不具有敏感度去偵測他們想要表達的意思，或你沒有辦法把人們的意思跟圖說對照起來的話，通常這件事情最後就會走向『以設計師設計為前提』的形式參與。」而這也是規劃專業者需要做的：讓規劃不僅是從專業者的角度出來，更能夠囊括在地的視角，打造真實符合使用者需求並創造更多可能的規劃場域，而這些被創造出來的真實案例，也逐漸擴散到更多的都市規劃實踐專案中，讓規劃不僅是「示範」，而也能逐漸成為一股改變都市的潮流。

公共與共治

最後，我們循著參與跟規劃，回到了系館改造的話題。面對今年城鄉所的系館搬遷，我們詢問了佩吟學姊規劃過程中的啟發，如何作為當下議題的示範。學姊與我們提到「大禮堂」空間在他求學期間的重要性：「那個時候的大禮堂可以說是系上的核心，那時夏鑄九老師會把所上任何重要的來賓、國外的講者，還有各種活動都放在這。因為大禮堂的一樓空間是夠大的，它甚至有小劇場的感覺，



▲ 大禮堂空間規劃

也會有展覽跟演講，然後又有同學在裡面上實習課。所以我覺得，研一作為一個進到新環境的啟蒙學習階段，當時我有大禮堂這個空間，對我而言其實有點像是守株待兔，我只要好好地待在那邊，我就會獲得很多的訊息，然後很多的學長姐都是在那邊認識、交流跟見面。」因此，若是城鄉所完全移至工綜館後，能夠保有大禮堂的這種交流學習、不同人事物穿梭其中的自由氣氛，就可以營造出同學跟學習還有議題的親近感。

接著，學姊跟我們說道「空間只是一個議題，它不是絕對，重點還是裡面的 program 如何去支持這些學生們有好好交流的空間。」遙想起大禮堂初完工時，內裝還只有基本的照明與配電，因為當時的班代前去跟所辦爭取改造經費，秀妹姐就給實習課的每一組同學共三千元的改裝費用。有人買裝飾的窗簾、有人買氣氛燈，當

時的大家都興奮地採買布置用具，打造出理想的研究空間。「當第一組已經佈置完的時候，第二組就會覺得：『哇！那我們也要開始佈置……』」然後第二組也去、第三組也去，後來我們每一組就開始像『美勞比賽』一樣，比較著你的三千塊跟我的三千塊，我們各自買了什麼。」這個有趣的經驗，讓學姊印象深刻，也建議未來工綜館完工後，學生的空間是否不需有過多的設計？而透過刻意的規劃留白加上所辦預留的經費，讓使用者可以自己去採購、佈置與經營。而每年該換使用者時，再由所辦或所學會辦理拍賣或二手物認領的活動，讓學生空間透過共同治理，捲動出空間的多樣性，在規劃與落實的過程中也促進了彼此的溝通與討論。透過系館空間改造下，培養同學持續感知身旁空間的能力。對於自在學期間就一直養成的「動手做」精神，學姊認為：「動手做當

然有不同的層次。例如我不會做模型，做模型我超爛的，而且覺得很痛苦，甚至有些東西進到細部設計，我腦袋就會沒辦法運轉，覺得那個東西太細了。但是我自己長出了一個空間的尺度，那個空間尺度中介於物件之間，到生活感、生活空間的協調跟掌握能力。」這也是為何佩吟學姊期待著未來系館能夠有支持同學動手做出空間的場域，因為學姊所擁有的規劃技能，就是從在學時期的敲敲打打、四處穿梭才逐漸發芽茁壯的。

結語

「打開你的感知，去感知周邊的人事，然後以空間為本去持續的推進利害關係人彼此之間考量的事物，找到一個可以見縫插針、去產生介入跟遊說的規劃實踐路徑。」佩吟學姊認為，這就是他所著重的 DIY 實作精神，最終能在規劃場域中實踐的理想。從臺北到馬祖的規劃場域大轉變，也讓他學著開始重新學習一套跟在地溝通的方法。傳統的規劃學習，往往著重「由公而私」的擴散，但在馬祖這個著重在地關係的列島，很多事情都具有模糊跟彈性，而學姊也在這個過程中持續學習「由私到公」的地方參與，逐漸擴大著公共性，體現出跟臺灣本島不同的規劃設計脈絡，可以說，佩吟學姊至今仍然持續不輟地實作。



▲ 大禮堂設計工程

跨域實踐與學術歸鄉： 陳盈蓁老師專訪

◎ 訪問及撰稿：宋燁博

◎ 圖片提供：陳盈蓁



▲ 2021 年第一次離島便當製作 (左一為澎湖海鮮皇族何欣潔主理人；左二為馬祖西尾半島物產店施佩吟)

前言：身份轉換中的教育思考

城鄉通訊曾於 2020 年的第十九期訪問過陳盈蓁老師，五年過去，編輯部於本期第 39 期有幸再度邀請到陳盈蓁老師分享她的近況，同時陳盈蓁老師也作為 113 學年度下學期實習課期末評圖的外評老師參與了研一學生成果發表全過程。陳盈蓁老師的學術路徑充滿了跨域色彩：從城鄉研究所碩士到美國柏克萊大學攻讀博士，再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最終回到台灣在北科大任教。這段豐富的求學與工作經歷，不僅豐富了她的學術視野，也深刻影響了她的教學理念與實踐方式。在這次訪談中，陳盈蓁老師分享了她從學者到助理教授的身份轉換，以及在不同教育環境中的觀察與思考。

城鄉所 DNA 的深層烙印

談及與城鄉所的關係，陳盈蓁老師提到了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的經歷。在柏克萊大學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她參與了一場學生自主辦理的研討會，報告的主題是香港城市與電影之間的關係。令她意外的是，一位完全不認識的地理學背景評論老師在聽完報告後，直接詢問她是否念過城鄉所。

「我就跟劉可強老師說，城鄉所變 DNA 了，就是烙印在我的學術涵養裡面。」陳盈蓁老師如此形容城鄉所對她的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是知識層面的，更是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深層塑造。儘管她在柏克萊的科系是建築與都市歷史理論，與城鄉所關注社區的取向有所不同，但在撰寫論文時，她仍然會回到在城鄉所學到的核心價值。

能，更是一種對社會問題的敏感度和行動力。這種特質使得城鄉所的畢業生在各自的領域中都能保持批判性思維，並且願意為社會公義發聲。

北科大與城鄉所：兩種教育文化的對比

在北科大任教的經驗，讓陳盈蓁老師對兩校學生的特質有了深刻的觀察。舉例來說，當她在天橋保存運動上電視後，回到北科大課堂時，學生們都看到了新聞報導，也表現出對這個議題的關心，但這種關心僅止於課堂討論，不會進一步轉化為實際行動。

「北科大的學生對技術很有興趣，對於把東西做出來有一種苦幹實幹的精神。」陳盈蓁老師觀察到，「但對於要再跨一步去做反思性的行動，他們可能心裡會想，但不見得會有更積極的動作。」這種差異反映了兩所學校不同的教育文化。北科大強調技術實務，學生們習慣於按照既定的方法和程序來解決問題，對於創新和批判性思考相對保守。相較之下，城鄉所的學生由於背景多元，更擅長反思和從基礎開始思考問題。



▲ 111_2 研究所實習課參訪城鄉所基金會展覽(陳盈蓁老師為前排左一)

陳盈蓁老師也指出，兩種教育文化各有其價值。北科大學生的務實精神和技術能力，在實際的規劃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城鄉所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力，則能為規劃領域注入新的活力。

實務技能與社區參與理念的平衡

在北科大的教學實踐中，陳盈蓁老師面臨著一個重要的挑戰：如何在保持社區參與理念的同時，確保學生具備業界所需的實務技能。她以北投市場重建規劃作為實習課題目為例，詳細說明了這種平衡的重要性和具體做法。

「我會有點擔憂，作為一個老師，我好像沒有辦法放任學生在畢業時連一份規劃報告書都不會寫。」陳盈蓁老師坦承，這種擔憂促使她在教學中特別加強學生的實務技能訓練。她引導學生將社區參與的成果轉化為邏輯清晰的規劃報告，包括訪談對象、調查脈絡、設計決策過程等。北投市場的案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案例的背景是北投區的傳統市場因為結構安全問題需要重建，陳盈蓁老師因緣際會帶領學生開始和社區的一些團體有所接觸，也因此將此場域設定為後續大學社會責任計劃和



▲ 113_2 研究所實習課學生製作的北投食農教育移動式廚房提案模型



▲ 113_2 研究所實習課參訪北投農場



▲ 113_2 研究所實習課與北投雲集合作社討論移動式廚房設計方案

長期的實習課操作基地。過程中，陳盈蓁老師嘗試引導學生從最初的社區調研、與攤商訪談，到後期的規劃方案設計，讓他們經歷了同時關懷社區需求卻符合業界想像的完整規劃流程。

在教學策略上，陳盈蓁老師採用了階段性的方法，上學期主要讓學生深入社區，了解實際需求；下學期則將重點放在如何將這些調研成果轉化為專業的規劃報告。她特別強調邏輯思維的重要性，希望學生能夠清楚地說

明「我們訪談了誰，這些人提了什麼，我們做了什麼樣的調查，有什麼樣的脈絡，所以我們做了怎麼樣的規劃設計決定」。

這種教學策略在今年舉辦於台中的全國規劃聯展中帶領北科大的學生獲得了特優獎，證明了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有效性。陳盈蓁老師同時也強調，她會根據每個學生的未來規劃來調整教學內容，「如果是很實務的人，我就會做一些比較實務的題目，因為對你來講那才是有用的。」

在教學實踐中，陳盈蓁老師發展出了一套相對靈活的師生互動模式。她會根據每個學生的背景、興趣和未來規劃來調整指導方式，「我會針對他接下來想做的事情，去設定我能夠要求他到什麼程度。」這種個性化的指導方式源於她對學生多元需求的理解。她認為，不是所有學生都適合相同的學習方式，老師應該根據學生的特質來調整教學策略。對於實務導向的學生，她會提供更多實務經驗；對於理論導向的學生，她會鼓勵更深入的學術探索。陳盈蓁老師認為這種方式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挑戰。「我好像因為一直都很放任式，再加上剛開始還沒有很多學生畢業，所以造成剛進來的學生不是很敢選我作為指導老師。」

技術創新與傳統方法的融合

也因為在北科大任教等等契機，陳盈蓁老師也逐步展開如何將創新技術帶入社區參與實踐場域的研究。她最近開始使用3D空間掃描作為田野調查工具，這個嘗試對於傳統的社區參與方法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創新。「我覺得3D掃描可以作為一個田野調查工具，現在也有一些APP掃完之後上傳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加筆記在準確的點位上面。」她解釋道，這種技術的應用不僅提



▲ 113_2 研究所實習課參加實習聯展獲得特優獎

高了調查的準確性，也為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了新的參與方式。這種技術創新的思考反映了陳盈蓁老師對於教育方法多元化的重視。她認為，隨著技術的發展，規劃教育也應該與時俱進，為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適合的學習工具和方法，同時也藉此打開不同背景學生和社區參與者之間的對話便利性。

跨域合作的豐富實踐

陳盈蓁老師的跨域合作經驗豐富而有趣，這些合作不僅展現了城鄉所校友間的深厚情誼，也體現了跨領域整合的可能性。她與城鄉所校友施佩吟的合作始於一個意外的深夜簡訊，對方詢問她關於馬祖和澎湖食材的料理建議。這個看似隨意的詢問，最終發展成了「離島便當」的合作計畫。



▲ 2023 年初去北科教書前給舒楣老師的感恩九宮格版離島便當

島便當」的合作計畫。

「佩吟學姊半夜傳簡訊問我，如果有馬祖的食材這些那些，跟澎湖的食材這些那些，我會做成什麼樣的料理。」陳盈蓁老師回憶道。這個合作計畫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將地方文化、飲食文化和社區參與結合起來，透過便當這個日常載體，傳達了深層的文化意義。更令人驚喜的是，這個合作計畫最終進入了

國宴，陳盈蓁老師描述當時的情景：「施佩吟帶了一堆東西，馬祖帶來的石頭、貝殼、淡菜殼，然後就被她弄成了一個很有地方感的攤位陳設。」她認為這種種策展方式是「很城鄉所式的策展方式——很因地制宜，但佩吟學姊心裡是有想過的」。離島便當的合作也引出了另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蘇怡帆，她是北投「拾米屋」甜點店的主廚，還是施佩吟的小學同學。這種多重關係的重疊，為合作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可能性。

上面提到陳盈蓁老師在北投的計畫，便是後續延伸與怡帆學姊近年在北投進行食農教育和社區參與做結合。通過這個合作網絡，陳盈蓁老師逐漸融入了北投的在地社群。她開始參與北投的各種社區活動，了解在地的需求和資源。這種融入不是外來者的觀察，而是成為社區一份子的真實參與。透過這個合作，陳盈蓁老師將學術研究、社區參與和商業實踐結合起來，為學生提供了更豐富的學習體驗。這種合作模式也延伸到了她在北科大的教學中。透過與北投在地組織「雲集合作社」的合作，她將USR（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與食農教育結合，發展出仍在發展移動廚房的設計。學生們不僅要做規劃設計，還要實際參與食農教育的推廣，在實際操作中學習規劃的多元面向。

規劃聯展的觀察與思考

作為本屆全國規劃聯展的參與老師，陳盈蓁老師對今年城鄉所學生的表現有著深刻的觀察（林家暉老師小組的同學以幼稚園為主題代表台大城鄉所參賽）。「你們所面對的完全是一群以前沒有想過的參與對象，然後從中間去發展出怎麼跟小朋友溝通的一套方法。」她認為，這種願意跳脫傳統框架，從零開始摸索新方法的能力，正是城鄉所教育的特色。對於幼稚園組，她給予了高度評價，她認為這組學生願意跳脫傳統的參與對象，選擇與兒童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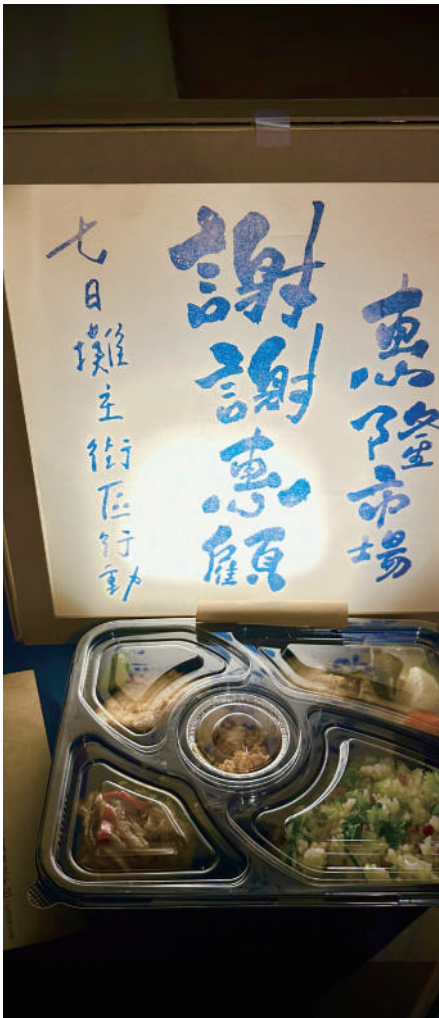
▲ 2024 年初於基隆惠隆市場進行使用市場在地食材進行的惠隆便當社區交往活動（主持人為原典創思副執行長施佩吟）

並且成功發展出與小朋友溝通的模式，這種創新精神值得肯定。

策展作為規劃工具的思考

陳盈棻老師對於策展作為規劃工具有著深刻的思考。她認為，策展不僅是展示成果的方式，更是一種參與式規劃的方法。在她的觀察中，過去策展通常發生在社區參與的中後期階段，是「已經社區互動完了，一起做一些什麼事，然後大家一起策一個展，這個展是想要把社區的知名度打開或者是得到更多其他人的公共意見」。她以施佩吟在國宴的表現為例，強調了城鄉所式策展的特色：「很因地制宜，但心裡是有想過的，這個就很看過程中間這個人一路以來的學養。」這種策展方式不是單純的展示，而是將地方文化、個人經驗和社會議題融合在一起的綜合表達。

這種思考也影響了她對學生作品的評價標準，她不僅關注最終的設計成果，更重視學生在過程中展現的反思能力和創新精神。以下學期實習課期末評圖來舉例，陳盈棻老師作為外評老師參與了全程，其中對於宜蘭演藝廳組，她認為在這方面是很成功的：「他們就很有這個感覺，利用了展出的場地條件呈現出演藝廳對外的舞台，以及演藝廳對內的空間。」她特別讚賞這組學生的策展方式，認為這體現了典型城鄉所式的策展思維。



▲ 2024 年初的惠隆便當

城鄉所校友網絡的特殊性

陳盈棻老師特別提到了城鄉所校友網絡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她歷經美國、香港的學習生活再回到台灣後感受尤為深刻。她認為，城鄉所畢業生在進入職場後，往往會發現自己與傳統規劃產業格格不入，反而與同樣具有城鄉所背景的同儕更有共鳴。「等到妳畢業之後，妳就會更覺得城鄉所是一個很怪的地

方。進來之後有了一些不一樣的思維，出去之後就會覺得跟很多其他單位格格不入她說道，「到了外面的時候你才發現我們都共享著某些價值觀，反而好像跟這些人可以在價值觀共享下進一步合作。」

這種共同的價值觀體現在多個方面：對社會公義的關注、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對參與式規劃的認同等。即使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城鄉所的畢業生仍然會保持這些價值觀，並且在日常工作中實踐這些理念。陳盈棻老師也提到，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回到台灣後，她很快就被學姊們「綁架」參與各種社區活動，這種積極的參與正是城鄉所校友網絡活力的體現。透過這些合作，不僅延續了城鄉所的傳統，也為新的實踐探索提供了可能性。

多元文化背景的教育啟示

擁有台灣、美國、香港等多處學習生活經驗的陳盈棻老師，對於多元文化背景的教育價值有著深刻的理解。她認為，不同文化環境的學習經驗能夠拓寬視野，提供不同的思維方式和問題解決方法。

在美國的學習經驗中，她感受到了很好的工作生活平衡，學術環境相對寬鬆。「在美

國的開心是因為跟大家好似沒有緊密關聯，亦不會需要太多的情緒勞動。」陳盈棻老師說道，因此她也認為，在美國她可能不會做這麼多社區的事情，因為缺乏對當地社會的深度了解和情感連結。香港的經驗雖然因為 COVID-19 期間特殊的政治環境而有所限制，但也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陳盈棻老師認為，每個地方的學術環境都有其特色和限制，重要的是在其中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

對於城鄉所的學弟妹，她建議：「如果有機會，無論是出國進修或是在傳統城鄉所以外的環境工作，我就會覺得都可以試試看。」陳盈棻老師認為多元的學習經驗能夠豐富個人的學術視野，也能夠為未來的工作提供更多的選擇。

未來展望與持續探索

對於未來的發展，陳盈棻老師表示仍在持續探索中。她希望能夠在維持城鄉所傳統價值的同時，發展出更多元的實踐方式。結合前文的敘述，無論是兒童參與、策展作為規劃工具，還是技術創新的應用，都是在探索「有沒有不一樣的路徑去導出更有趣的參與式規劃結果」。

她特別提到了對創新技術的思考：「社區參與作為一個途徑已經做了很久了，在台灣的脈絡快



▲ 2024 年暑假於基隆惠隆市場帶學生與社區居民進行創新技術導入參與式設計工作坊



▲ 2024 年暑假帶學生在基隆惠隆市場進行使用三維空間掃描模型與在地攤商進行空間改善意見蒐集

要 50 年了，我們有沒有可能用一些不一樣的工具去嘗試。」這種對創新的追求，正是她在教學和研究中的重要動力。「我覺得

城鄉所有趣的是創新的能力，」陳盈棻老師總結道，「雖然實習課很焦慮，永遠不知道自己做的對不對，但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培養了一些能力和創意。」

結語：學術歸鄉的意義

陳盈棻老師的學術歷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個「學術歸鄉」的過程。雖然她在海外獲得了豐富的學術經驗，但最終還是選擇回到台灣，在熟悉的文化環境中從事她熱愛的社區參與工作。

「如果學術工作在哪都這麼累的話，還不如在自己覺得有情感然後喜歡的地方。」陳盈棻老師如此解釋自己回到台灣的原因。這種選擇反映了她對於學術工作本質的理解：學術不僅是知識的生產，更是價值的實踐。這種持續的探索精神，正是城鄉所教育理念的核心體現，也是陳盈棻老師在不同教學環境中持續實踐的重要動力。她的經驗和思考，為城鄉所的教育傳統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師生互動模式的未來發展提供了寶貴的啟示。



▲ 城鄉所校友於發表會與黃舒楣老師(右三)現場合照(提供:黃舒楣老師)

《困難東亞：重構日本帝國殖民地刑務所記憶》書籍發表會

◎ 撰稿：林彥彰

《困難東亞：重構日本帝國殖民地刑務所記憶》(Heritage, Memory and Punishment: Colonial Prisons in East Asia)黃舒楣老師在 2019 年與韓國西江大學批判全球研究中心李炫炅助理教授合寫的著作，後由曾就讀城鄉所的李易安學長，將此書以極為流暢、生動的筆法翻譯為中文版。

本書旨在透過探討東亞監獄在現代的轉型與保存，討論監獄作為一種暗黑襲產，它的記憶如何被揀選、修正；甚至是遺忘，本書已於今年三月正式出版。本次活動紀實主要紀錄老師於今年 5 月 17 日於好土：home to 咖啡廳舉辦之座談會，本場座談會亦邀請了臺大人類系的江芝華教授與談，與我們分享當前臺北刑務所的考古發掘現狀。

監獄的現代化意義

座談會之初，舒楣老師先簡要地對於現代監獄的出現進行介紹，18 世紀以前的監獄的形式僅是以監禁囚犯為主要目的，真正的刑罰是對受刑人肉體上施加的懲罰(所謂身體刑)。自19世紀起，懲罰的形式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致使懲罰意義的從讓人受到肉體上的折磨轉向剝奪受刑人的自由，並以教育與矯正行為，試圖讓人在受到懲罰後回歸正常社會。這種懲罰方式的轉向使得原先沒有一定形制、目的在於監禁人的監獄，轉向探討如何以有效率隔離並矯正犯人行為的方式將受刑人隔離於監獄之內。因此衍伸出了如全景監獄、賓州體系、歐本體系等不同的監獄設計。

同時，舒楣老師也提及對於日本而言，監獄的改革也象徵著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象徵，19世紀末的中國與日本同面臨到西方國家透過治外法權威脅國家主權的危機。日本在此危機之下選擇派人出國考察不同國家的監獄形制，小原重哉在參考了香港的監獄後寫下了《監獄則圖示》，成為日本及東亞其他地方的刑罰改革的依據。在臺灣，監獄更成為了政令宣傳的一種工具：「當時非常的重視(監獄內的飲食)，在《日日新報》上面可以看到那張黑白照片，其實是臺北刑務所的廚房，然後那個報導會去呈現受刑人吃得很健康，腳氣

病的狀況都改善了等等。這些成果曾被帶到德勒斯登的世界衛生博覽會。」

同時，勞動也是監獄中不可或缺的其中一項機能，如臺北刑務所的後方便是過去受刑人勞動的工廠以及田地。鄰近的中正紀念堂過去亦是日本陸軍山砲隊的基地，監獄的工廠也被視作軍隊補給物資的重要出處。

暗黑襲產的選擇性記憶

然而，監獄的存在卻與襲產塑造認同的能力產生了一定的矛盾與尷尬感。作為殖民者在當地留下的「侵華罪證」，旅順的日俄監獄並不被中國人視作是襲產：「我認識的中國學者甚至會跟我說那個不叫遺產，那個不能叫遺產，因為遺產是你的爸爸留給你的東西。」舒楣老師亦提到當今去旅順參觀的遊客多為韓國人，有這種特殊的景象來自於旅順監獄與韓國獨立運動的特殊聯繫。

獨立運動在韓國的脈絡可追溯自三一運動起對於日本殖民的反抗，旅順作為日本曾經的租借地，曾經關押並處決於哈爾濱刺殺首相伊藤博文的殺手安重根，旅順監獄的第一個展間便是強調安重根的就義，並且展出安重根所寫的書法作品。雙方也在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過程中相互修正彼此的論述。

同時，當前位在首爾獨立公園內的西大門刑務所當前作為紀念獨立運動的歷史館，亦著重於強調日本過去的殖民歷史以及獨立運動的重要性。然而，在保存的過程中亦有92棟建築物被拆除。而在敘事上亦忽略了後殖民時期西大門監獄的持續使用以及對政治犯的迫害。

舒楣老師為講座前半場作出小結，當代矯正制度讓受刑人需要受到矯正才回歸社會的邏輯，可對照在文化資產呈現在大眾眼前之前，關於文化資產的記憶亦受到矯正，這種對於記憶的矯正會受到地緣政治、記憶對於執政者的重要性，以及許多的不同因素影響，也正因如此，襲產的價值論述是不穩定的、脆弱的。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除記憶外，襲產中存在的各種物件亦得以讓我們去拼湊出當時代人生活樣貌。與談人江芝華教授在座談會の後半，以考古學的角度提到臺北刑務所在考古過程中如何透過物件拼湊出居民生活的樣

貌。以江老師在日治文化層發現的一個玻璃瓶碎片為例，透過這個碎片的特徵、顏色、出土位置等資訊，考古學家便可以拼湊出這個物件的年代以及產品資訊。這些故事在龐大的歷史敘事中或許都是微不足道的一小塊碎片，但卻可以讓我們更貼近當時代的人們的生活。

然而，如同記憶會受到執政者、地緣政治氛圍以及諸多因素影響，出土文物是否具有價值也時常受到挑戰：「這些被放在報告裡面然後被說成是擾亂，是沒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其實不是沒有價值，不是沒有訊息，是我們沒有去好好看，我們沒有去看到它的價值。」

以深埋於刑務所旁的水溝之下的陶片為例，由於史前文化的土層相對未受擾動，而陶片的存在也就證明了這裡在過去史前時代曾經有人出現於此，更讓此處的故事更可往前追溯至圓山文化。

江老師認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就是不管什麼人，你的物件都會被留下來。怎麼樣去談中間的轉化是考古學家的工作。但是那個物件都在，所以我們常常覺得考古就是一個民主的學科，沒有誰的東西被留下來；誰的東西沒有被留下來，所有的東西都會留下一些線索在地層裡面。」

即便如此，這些故事依舊會受限於臺北市政府都發局的框架之下，對都發局而言，監獄的結構發掘結束，也代表了考古的研究告一段落，但這也代表有許多的物件、許多的故事依舊是無法被發現的。江老師也提到過去曾經希望提報這裡做為圓山遺址的一部分，但卻受到文化部從法規上的質疑，認為這裡並不符合法規定義的圓山遺址。

同時，作為民主的學科，江老師也十分期盼考古的現場可以打開，讓更多人可以觀察到這些文物發掘的現場。老師也期望未來可以有更多人參與到政府舉辦的文資審議會議，在會議上發言，透過輿論的力量使政府當前對帶文化資產的態度有所改變。



▲ 圖一 東本願寺台北別院
(來源：《南瀛佛教》第15卷第01號(1937))

東本願寺—獅子林：不義遺址中錯置的鬼魅

◎ 撰稿：彭軍皓 | 審閱：紀懷超

一、前言

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以下簡稱獅子林)，位於熱鬧的台北市西門町商圈，落成當時是都市繁華與進步的象徵，亦是許多台北人的回憶所在。在都市高速發展、資訊快速流通的現代，西門町經歷過興盛、衰敗與再復興。獅子林見證了西門町的興盛、衰敗後，卻並未見明顯的再復興。而在民主化的進程中，政府執行轉型正義，獅子林大樓的前身——「東本願寺」，也被指認為潛在不義遺址之一。

當代數位傳播媒介中，獅子林與「鬼故事」、「恐

怖」等關鍵字緊密連結，其根源指向獅子林的前身「東本願寺」，曾被國民黨挪用作為其威權統治下的行刑場。然而，透過歷史的考證與當年航空影像圖的比對，顯現出一項細微的地理誤差。當年發生拘禁、拷問等酷刑的核心場所，東本願寺「本堂」，實際的位置為現今「誠品武昌店」所在之處。這揭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為何都市傳說與鬼魅現身的地點，並非暴力所發生的「原罪之地」，而是錯置、縈繞於一旁的獅子林大樓？

二、空間的覆寫：從神聖場域到創傷地景

欲理解獅子林靈異傳言的生成，就必須先挖掘其層疊的歷史痕跡。這片土地歷經了抹除與複寫，其歷史演變可分為三個關鍵時期：日治時代的神聖場域、二戰後中國國民黨威權統治下行使國家暴力的修羅煉獄，以及現代化的商業大樓所面臨的興盛與衰敗。

1928年，日本殖民政府於西門町建造東本願寺，最初為木造結構，1930年遭祝融焚毀。1936年原地重建，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獨特的天竺圓頂具有濃厚的古印度建築風格(徐麗婷，2021)，使其成為殖民城市中極具辨識度的文化地標。

戰後，隨著國民黨政府遷台，東本願寺的命運迎來了劇烈的轉折。這片宗教淨土被國民黨迅速「除魅」，並佔用做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看守所。昔日的神聖場域轉變為白色恐怖時期國家行使暴力的修羅煉獄，「東本願寺」本堂更成為拘禁、拷問甚至非法處決政治犯的場所，也成為臺灣最早的政治監獄，是臺灣現代史中，遭受國家機器極端象徵暴力——亦即透過權力將空間的神聖意義徹底顛覆，並挪為己用——所褻瀆的神聖空間之一(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

彼時的中華民國政權，打著保密防諜、反共叛亂的口號，只為了建立統治的正當性，而犧牲了

無數本土知識分子的生命(李淑君，2023)。東本願寺空間的徹底翻轉，標誌著政權更迭下空間記憶與集體情感的撕裂。在白色恐怖、戒嚴的時空背景下，中華民國政權以「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寧」對言論的箝制(彭琳淞，2004)，讓東本願寺裡發生的事成了不見天日的秘密。此一空間意義的劇烈翻轉，迫使我們追問：一個「地方」的意義究竟是如何被建構、覆寫與爭奪的？為此，引入晚近人文地理學的理論思辨，遂成為解析此一現象的必要路徑。

地方的獨特性並非源於僵固的內在，而是多重社會關係的交會點，其形成更需考量權力幾何學的運作(Massey, 1993)。延續此脈絡，索雅(Soja, 1996)的「第三空間」理論進一步揭示，地方不僅是物質的，更是由意識形態與社會關係所形塑的「再現的空間」(Lefebvre, 1991)。東本願寺此一「地方」的獨特性，不再僅是其宗教性，而是殖民權力、國家暴力與全球資本等力量在此層疊、衝突後，共同生產出的一個充滿矛盾的場域(王志弘，1999; Crang, 1998)。

三、現代化的繁榮與衰敗

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西門町作為台北市商業與娛樂中心的地位日漸鞏固，國有財產局也將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的精華土地標售。老舊的東本願寺建築，在擁抱消費主義的新地主眼中顯得格格不入，因此終究面臨到拆除的命運。

1970年代，三棟大型的現代化建築在東本願寺原址上拔地而起，分別是六福大樓、來來百貨(今誠品武昌店)，以及



▲ 圖二 獅子林現況(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獅子林新光商業大樓，象徵著擁抱消費主義的新時代(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然而，此種以商業開發為導向的都市更新，在資本邏輯的驅動下，創傷空間被轉換為可買賣、租賃的經濟資產。這樣的過程，也在無形中幫助政府完成了對歷史的「噤聲」與「掩蓋」，讓歷史創傷失去了明確的載體，成為了遊蕩的鬼魅，潛伏、縈繞在空間中，等待著適當的時機爆發，讓這些過往的創傷記憶得以再現與流傳(Gordon, 1997)。

新落成的獅子林大樓規模宏大，共有三百間店舖、三百間套房，電影院、美食廣場、百貨及超市，食衣住行育樂一應俱全，並配置當時先進的高速電梯等設施。憑藉這樣的氣勢與前衛在開幕時便獲得了1977年「美展建築設計頭獎」，成為當時繁華與進步的都市化象徵(路那，2019)。這樣的風光持續不久後，獅子林發生第一起凶殺案，至此為獅子林的靈異傳言搭建了一座完美的舞台。此後，因建築本身的消防設計有缺陷，而發生無數次的火警，造成人員傷亡。住商混合的設計，讓出入分子複雜。而這種產權破碎的空間，缺乏完善的統籌機制，使得店家不斷遷出。隨著台北市發展軸線逐漸東移、信義計劃區的出現，讓西門町不再是當年的商圈霸主，而獅子林也隨之沒落，部分樓層甚至空蕩的像個廢墟，往日風華亦不復見(聯合報系，2023)。

為何鬼魅最終選擇獅子林作為宿主，而非寄生於地理上更精準的誠品武昌店？答案藏於其空間與視覺所誘發的心理感知。獅子林的空間感受提供了一個理想的「鬧鬼空間」，使無形的創傷可以不經美化、赤裸裸、血淋淋的展現。

四、錯置的鬼魅：記憶與象徵性投射

本文的核心論點「錯置的鬼魅」，至此得以完整闡述。經由航照圖與文史資料比對，確認了一個關鍵的「地理誤差」：白色恐怖時期的主要審問場所為今日的「誠品武昌店」，而獅子林大樓所在地則為當時的「庭院」。然而，靈異傳言卻幾乎無一例外地集中指向獅子林大樓。於此，Freud (1919) 在《論詭異》(Das Unheimliche) 中的概念可用來分析。

根據佛洛伊德的論述，「詭異」指的是「本應被壓抑的事物，突然以一種扭曲、陌生的樣貌重新現形」，是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體驗。在現代，獅子林的空間，恰可視為此種「詭異」的展現。相較於周邊被高度規訓的商場，獅子林內部呈現顯著的混亂與衰敗感，其複雜動線、昏暗光線與閒置店鋪共同形塑了「廢墟化」的氛圍，創造出存續與消亡、新穎與陳舊並置的「時間錯置感」，這種心理上的不安與騷動，使獅子林成為靈異傳言滋生的沃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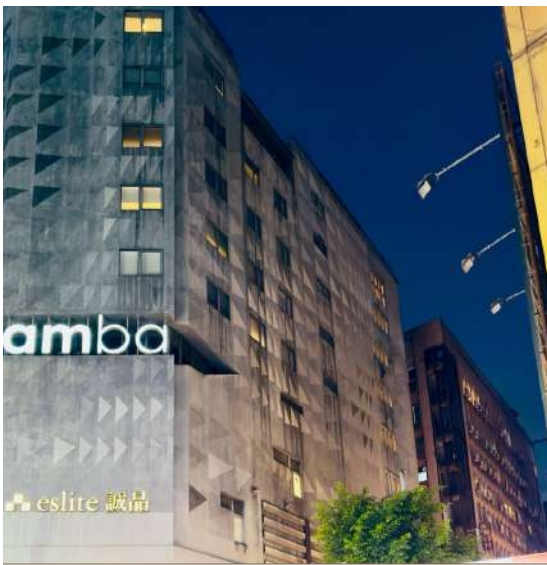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毗鄰的「誠品武昌店」(前東本願寺「本堂」原址)。作為一個高度品牌化的商業空間，經過「符號性淨化」，光線充足、佈局規整，系統性地消解了「詭異」。儘管誠品在地理上是過往創傷的「原爆點」，其空間氛圍卻與靈異傳言所需的混亂、陰鬱、廢墟感完全格格不入。被壓抑的歷史，便尋求一個更能容納其恐懼本質的載體，從而啟動了一場無意識層面的「空間移轉」。

此地理上的誤差不應被視為單純的謬誤，而應解讀為一個承載深刻文化意涵的案例，揭示了記憶、空間與權力之間的複雜協商。官方的記憶對東本願寺的歷史進行了清除，意圖製造「歷史的斷點」。然而，由國家暴力造成的創傷，轉化為一個無處安放的「鬼魅」。當官方選擇沉默、掩蓋，鬼魅就只能在民間集體記憶中尋求得以附著並被訴說的空間。

地理位置「正確」的誠品武昌店，因其光鮮且明亮的空間特質，其不利於靈異傳言的發展與傳播。於是，集體記憶啟動「投射機制」，將源於「本堂」的創傷記憶，投射至空間上極度適合「鬧鬼」的獅子林大樓。獅子林的衰敗與空間結構、部分像廢墟的樓層，恰與創傷的精神及歷史的鬼魅不謀而合。因此，獅子林的鬼魅可被定義為一個「地理上不精確，象徵上極度精準」的文化建構。公眾對鬼魅的談論與散播，實質上是在無意識地指認並重述那段被遮蔽的創傷敘事。



▲ 圖三 獅子林現況 (來源：筆者拍攝)



▲ 圖四 東本願寺現址分別為誠品武昌店(左)、六福大樓(中)、獅子林(右) (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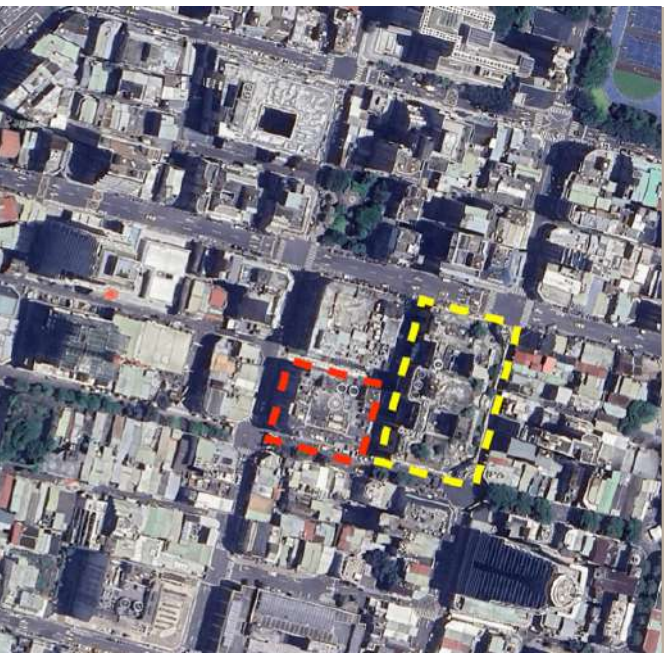
五、未竟的轉型正義

藉助Derrida於《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 of Marx) 中所提出的「魂在論」(Hauntology)，方能理解獅子林鬼魅的深層文化政治意涵。「鬼魅」是過去對現在的持續影響與迴盪。一個場域之所以「鬧鬼」，意味著該處存在懸而未決的歷史痕跡與未能兌現的正義承諾。獅子林的靈異傳言，可被視為具有批判性的鬼魅，潛伏於這個現代性與消費文化的場域中，以其存在持續干擾著和諧的表象，提醒人們在光鮮的外表之下，隱藏著被壓抑的黑暗歷史(Gordon, 1997)。每一次的鬼魅現形，均是在打臉國家威權下的象徵暴力。

而鬼魅的最終指向，乃是臺灣未竟的轉型正義。官方機制未能對這段歷史提供充分解釋與撫慰，這些「未竟之業」，使得歷史創傷無法真正和解與安息。因此，獅子林的鬼魅可被詮釋為此等「未竟之業」的具象化身。只要正義問題懸而未決，鬼魅便會以各種形式持續地「縈繞」(陰魂不散)，其目的或許並非純粹的嚇人、害人，而是向未曾經歷過那個壓抑年代的人們訴說過往，也向整體社會傳遞，過去從未真正過去。就像那句經典的電影台詞一樣，「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徐漢強，2019)。

六、結論

綜上所述，西門町獅子林大樓的靈異傳言並非單純的迷信，而是一個蘊含深刻社會文化意義的隱喻。這個「錯置的鬼魅」，銘刻於臺灣社會的集體記憶之中。其「錯置」的特性，恰是最真實、最有力的面向。此現象揭示了當官方試著掩蓋時，民間集體記憶如何頑強地為無以名狀的創傷尋找代言；它亦展示了空間不僅是物理容器，更是承載、形塑記憶的歷史舞台。獅子林的鬼魅，作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迴響，將繼續以其獨特的方式，向每一個穿梭於現代都市的個體，講述那段關於遺忘與記憶、國家罪行與未竟正義的歷史創傷。



▲圖五 1957年航照影像，與現今衛星影像對比，黃框為獅子林，紅框為東本願寺(來源：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參考文獻

Crang, Mike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Derrida, J. (1994).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 Kamuf, Trans.). London: Routledge.

Freud, S. (1919). Das Unheimliche. *Imago*, 5(5/6).

Gordon, A. F. (1997). *Ghostly Matters: Haunting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assey, Doreen. (1993).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Pp. 59-69 in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edited by Jon Bird, Barry Curtis, Tim Putnam, George Robertson and Lisa Tickner, London: Routledge.

Soja, Edward. (1996), *Third space: Journey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不義遺址資料庫(n.d.),國立歷史博物館。取自 <https://hsi.nhrm.gov.tw/nhrm/zh-tw> (取用日期:2025年6月30日)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n.d.),獅子林商業大樓。取自<https://cmsdb.culture.tw/place/5CC236B7-F40A-45CF-9334-FB030F1327A6> (取用日期:2025年6月30日)

王志弘 (1999),文化概念的探討—空間之文化分析的理論架構,《流動、空間與社會 1991-1997 論文選》,臺北:田園城市。

李淑君 (2023),專題引言:白色恐怖的性別視角:女性受難者、再現政治、監控機制與陽剛國家,《性別平等教育季刊》,101:12-15。

徐漢強 (2019),《返校》(電影)。影一製作所。

徐麗婷 (2021),《台北東本願寺「印度風格佛寺」建築考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國家人權博物館 (2015),《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跡點調查案總結報告書》。新北市:國家人權博物館。

彭琳淞 (2004),威權體制的官方論述—以立法院公報之戒嚴、黨禁與報禁為中心 (1950~1987),《臺灣文獻季刊》,55(1):65-90。

聯合報系 (2023),從白色恐怖刑場到西門町的流行中心 | 1984年獅子林商業大樓。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120910/7089183?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取用日期:2025年6月28日)。

翻牆地景到逃逸地方：建中翻牆文化的反叛與劃界

◎ 撰稿：王挺之 | 審閱：紀懷超



▲ 圖1 日治時期的建中校門與圍牆
(來源：臺北市立建國高中官網)

一、前言

地方 (place) 不僅是劃界與心理感受的概念，更是在特定制度下涉及實作的產物，影響與中介著關係網絡中的社會實踐。地方最常見的定義呈現在三個基本面向：區位 (location)、場所 (locale)、地方感 (sense of place)，分別指是地理位置的客觀描述、物質及社會關係，與對於上述兩者的主觀情感投射 (Agnew, 1987)。地景 (landscape) 存在強烈的「觀看」概念，包括視、觸、味、聽、經驗的感受，是藉由觀察而詮釋的「張

力」(Cresswell, 2004; Wylie, 2007)。觀看者居於地景之外，是置身事外的曖昧外來者；相較於地方的經典代表的「家」，強調自己人、融入其中，我們可以說我們不「住」在地景裡，我們觀看、感受地景，但我們也逐漸辨析、實作出屬於自身的「地方」。

本文嘗試從「圍牆」作為臺北市立建國高中 (本文簡稱建中) 地景的象徵與物質化邊界出發，進一步探討建中活躍的「翻牆文化」作為一種日常實作與空間主體性的展現，結合 John Agnew (1987) 對「地方」的三元分析架構 (區位、場所、地方感)，觸及「建中—地方」的排除性與權力問題。透過建中圍牆地景的現地詮釋，與建中校友的質性訪談，本文試圖回應建中圍牆如何成為被觀看的「地景」？又如何能在學生、校友與社會的實作中，轉化為「地方」？建中圍牆歷經超過百年的物質形式更替，翻牆行為在看似挑戰秩序的逃逸行動背後，持續穩固一套被創造的「建中人」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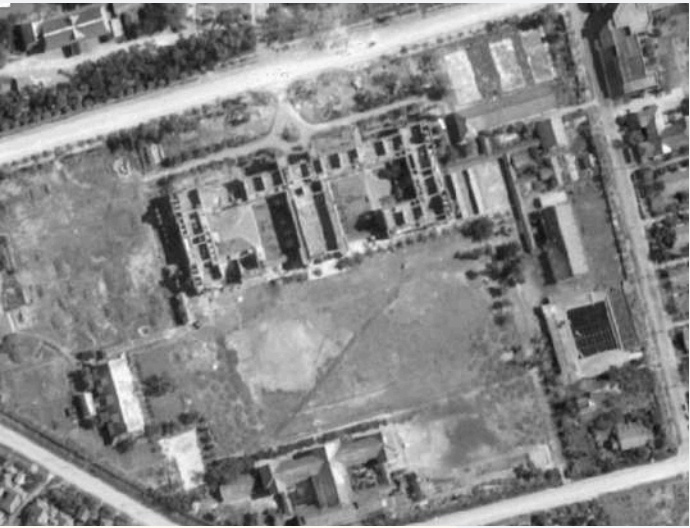
建中作為明星高中的符碼，使翻牆行為得以更輕易地被觀看、書寫與懷舊，形塑出一種隱含文化資本的青春實作。相較之下，若同樣的越界行為發生在一般高中、職校或邊陲地區，其翻牆經驗往往不具備被觀看的資格，甚至被視為失控與違規。地景從不是平等的空間場所，而是在多重資本與社會敘事中被選擇性觀看的結果 (Zukin, 2010)。

二、翻牆地景的誕生

本節將梳理建中圍牆的物質形式流變，透過不同的觀看者：在校生、校友、行人或媒體，與「翻牆」、「爬牆」的實作行動，共同結構為街頭日常地景。建中圍牆由正門的南海路段、東側門的泉州街段、後門的寧波西街段、西側門的和平西路段構成，另有一段與國語實小共構的分隔牆。參考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的照片，當時「台北州

立台北第一中學校」的圍牆應為磚結構，紅白配色，約二公尺高（見圖1）；戰爭期間因遭遇美軍的台北大轟炸，校園主體遭毀滅性破壞，然根據戰後初期照片與美軍空拍圖，日本時代的圍牆應部分留存至戰後。據可見的報導與訪問，約在1960-1970年代開始，後門與側門段的圍牆形式為外部灰色鋪面（或許為水泥）的二公尺高圍牆（內部是否為日治遺構未知），圍牆頂端滿布碎玻璃，保護與阻礙性提高（受訪者C；宋東彬，2009）；目前的建中圍牆主體約在2000年代初期至2009年左右落成，有約75公分高的紅磚基座，牆柱之間為金屬欄杆，在視覺上更具開放性與通透性（見圖4整理）；泉州街側最新的圍牆則完全去除紅磚基座，僅剩金屬欄杆，在2022年落成（見圖4）。從趨勢上來觀察，建中圍牆地景的三階段演變是：「1898~1950s 封閉（日治）」→「1960s~1990s 高度封閉且有敵意（戰後）」→「2000s~ 有限度封閉與視覺開放（近代）」。

沿著建中圍牆走一圈，可發現不少連結翻牆行為的景觀，例如泉州街的東側門處有1977年畢



▲圖2 美軍空拍圖（1945年6月17日拍攝，同年5月31日美軍對台北進行「台北大轟炸」）（來源：中研院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圖3 2009年時和平西路段圍牆（來源：旭日聯合事務所）



▲圖4 建中圍牆示意圖（底圖來源：Google Earth）

業校友協助整建圍牆後紀念設置的「建中圍牆序」，上書「牆非牆，青春關不住」、「狂狷建國、銘誌牆郭」等語（見圖5、圖6）。比鄰國語實小的圍牆上的「維護安全、嚴禁攀爬」噴漆，還有後門的寧波西街段圍牆可以發現輔助爬牆的小工具，讓登牆有如爬樓梯一般便利（見圖7）。



▲圖5 建中圍牆序（來源：筆者2025年5月攝影）



▲圖6 二十九屆校友整建泉州街圍牆紀念（來源：筆者2025年5月攝影）



▲圖7 利用樹幹、瓦楞板構成的翻牆輔助工具（來源：筆者2025年5月攝影）

在制度上，建中並沒有所謂嚴格的「門禁時間」，除了後門、東西側門會在非通學時間會關閉，南海路正門24小時都不會關閉。2009年開始，建中施行「換證外出」制度，學生可以在中午時段自行外出用餐，旨在降低過去學生翻牆外出無法控管的危險性，但成效不彰（宋東彬，2009）。受訪者A（2025）提到：「高一換證外出幾次，但之後就直接走大門出去了，根本沒有人會攔，我都要外出了，不想被控制（13:00 須歸還外出證否則會記點受懲處）」。實地走訪建中翻牆行為最頻繁的寧波西街圍牆，就連四門全開的放學時間，都有學生選擇翻牆進出校園（見圖8、圖9），針對突發的翻牆行為，筆者上前詢問「為什麼不走後門就好？」，同學的答覆是「比較快、方便」。搜尋社群媒體上的建中翻牆行為，甚至出現一位已經租借Youbike的學生，選擇把整輛單車翻過牆進出校園，而不是繞一小段路從正門出入（見圖10），可見「方便性」對於翻牆動機具有決定性因素。



▲ 圖8 放學時間牆邊出現臨停的Youbike (來源:筆者2025年5月攝影)



▲ 圖9 不久即出現翻牆的學生 (來源:筆者2025年5月攝影)



▲ 圖10 帶著Youbike翻牆的學生 (來源: @tw_coconoao 2024)

根據訪談，後門的寧波西街段圍牆因為鄰近超商、飲食購物商圈，遠離校園核心監視區（教官為主），有活動中心建築與樹蔭遮蔽視野，且圍牆內側有可供翻牆者踩踏的花槽結構（2000年後），成為翻牆經驗最密集的区域，並以活動中心後方（鄰近球場與社團教室）與後門旁（與飲食需求最近）為兩大熱區；而在2022年改建前的泉州街東側門段落，因為鄰近教室，距離捷運站近，距離商圈也不遠，也是不少學生的翻牆選擇（翻牆熱區與圍牆型態示意圖4）。至於為何不選擇南海路與和平西路段的圍牆「進出」？除了因為南海路與和平西路車流量大，太「顯眼」，兩地更缺乏商圈機能，且和平西路段圍牆外側花槽有茂密植物，亦降低在這些地點翻牆的誘因（受訪者A、B、C、D）。綜上翻牆熱點的分析，可以發現在所有圍牆結構類似的前提下，好爬、有遮蔽性、鄰近翻牆目標（商圈機能）是構成翻牆地景的主要因素。

地景不僅是被動的觀看對象，更是一種以觀看行為將權力具象化的場域，並在視線與感受之間嵌入敘事張力（Wylie, 2007）。不同的觀看者：校友、師長、過路行人或媒體，在觀看建中圍牆時，自會投射各自的價值與期待。對昔日校友而言，牆體形制的每次更新都標示出不同屆次的「翻牆難易度」，為曾經的青春日常做出標記與懷想。對社會大眾與新聞報導來說，這面牆又成了

窺探明星高中逸事的途徑。2009年，承攬和平西路段牆體改建的建築事務所，在作品集中提到：「建中學生翻牆是傳統，可惜學生家長不喜歡這項傳統，學校也開始正視圍牆的簡陋。進行本工程時，甚至有建中學生大喊『還我圍牆』。嗯，抱歉了，學弟們。」（旭日聯合事務所，2009）這段插曲恰恰揭露了翻牆地景的曖昧本質：牆越高，翻牆行為便越顯意義；但正因拆除改造，才更凸顯出師生對這面牆賦予的日常價值。在特定的歷史與制度脈絡中，圍牆與翻牆行為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多方行動者——校方、家長、學生社群、媒體，共同編織出的「街頭日常」。透過一連串的翻越、凝視與敘述，建中圍牆與翻牆地景相互折疊、彼此共構，並在動態的人—地關係中持續演變。



吃冰 別爬牆！
北市昨天中午炎熱高溫，一群學生抄捷徑，「爬牆」到後校門旁的冰店享受吃冰的清涼。
講求效率，「捷徑」或許可減少時間，但應在合情合理合法的範圍下。學生想趕快吃到冰，「捷徑」是選項，但「爬牆」絕非唯一途徑。
圖與文／杜建重

▲ 圖11 放學時間牆邊出現臨停的Youbike (來源:筆者2025年5月攝影)



▲ 圖12 放學時間牆邊出現臨停的Youbike (來源:筆者2025年5月攝影)

建中圍牆在觀看與實作中，不只是阻隔的物質設施，更是權力、日常與認同交織而成的地景場域。翻牆行為與地景的生成是一種交互形塑的結果，圍牆因翻牆而被賦予文化意義，翻牆則因地景條件而得以實作。在翻牆地景中，翻牆者已非單純的規則逃逸者，而是透過身體行動與語言敘事，參與了塑造建中地方主體性的過程，並對建中作為菁英空間的秩序生產提出獨特的日常實作。在此，「翻牆地景」不僅是空間物質與社會實作交織的結果，也成為一種地方記憶與建中人認同的集體見證。它既被觀看，也被實作；既標誌限制，也成為逃逸與自我認同的起點。

三、不只是逃逸：翻牆如何建構反叛的「地方感」

翻牆在建中並非單一的「逃離校園」行動，而是在多重動機、社會想像與權力結構之間，交織出一種獨有的「逃逸地方感」。明星高中的光環，造就了建中生與一般高中生在社會視野中的強烈落差與焦慮。「會讀書、上臺大」標籤之外，翻牆文化成為「好學生」的角色框架中，一種逃逸式的出口，一種反叛式的身份挑戰與自我定位。

依據 John Agnew (1987) 對「地方」的三元分析：區位 (location)、場所 (locale)、地方感 (sense of place)，我們可以這樣詮釋翻牆文化與「建中—地方」的連結。在區位上，翻牆者以最短路徑穿越空間，重新劃定校內與校外的實際地理座標，創造具有能動性邊界。在場所上，翻牆的目的涉及消費行為，牽動與周邊小吃店、超商等的社會關係網絡，翻牆後的街頭日常，因翻牆行動而成為建中生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後，在地方感上，翻牆在校友口述歷史裡已有超過半世紀的傳統，將越界身體化、符號化。每一次翻越，每一次的回想，還有回到建中現場或媒體社群中的觀看，都像是再次「入族」的過程，召喚新舊建中人共享的集體記憶與情感。

翻牆文化歷史悠久，從校友的回憶中至少可以追溯逾半個世紀以上。1979年畢業的校友賴清德總統多次在訪談中提到在個人就讀期間「爬牆去吃麵吃冰」：「（印象最深）就爬牆啊，去吃麵吃冰。那時候國文有一個課文講『有高城深池猶不能禁也』，所以大家一起唸了這句話之後就跳過去」（陳韻平、郭文海，2014）；1981年畢業的校友高志鵬前立委：「有經驗的就知道，哪一段是沒有碎玻璃的，大概就會集中在那個地方，有時候還得排隊，等著爬出去」（宋東彬，2009）；1997年畢業的校友蔣萬安市長（當時應該還叫章萬安）受邀返校演講時自陳高中時的專長是「爬牆、撞球、到北一女站崗」（建中校友會，2021）。

而觀察近期社群媒體上針對建中翻牆文化的討論，可以發現針對2024年入學的新生舉辦的新生訓練中有一張：「學長說沒爬過牆不是建中人」簡報獲得廣泛迴響；2012年入學的受訪者A也提到新生訓練有類似的回憶，可見校方欣然將翻牆、爬牆作為拉近與學生距離、與學生取得一種幽默共感的操作方式，且行之有年。校友更樂於將翻牆回憶作為召喚「自己人」的共通語言，呈現翻牆「符號」的跨世代、跨身分溝通性。換言之，翻牆文化的討論與實作，不管在校生與畢業校友，共同強化了建中地方感，這也是地方可以「製造他者」（Make the others）的特性。「建中人」認同透過「翻牆」達到一種「入族儀式」（Barthes, 1991）。

四、結語：觀看、認同與身體實作

建中圍牆與翻牆文化，透過一看似逃離邊界的跨界行動，共同編織出一種曖昧卻強韌的逃逸地方感。牆是被看見的權力象徵，翻牆是被實作的身體政治。以建中圍牆為起點，揭示了從「被觀看的地景」到「身體實作的地方」之間，權力、日常與認同如何在翻牆行動中交織並不斷再造。身體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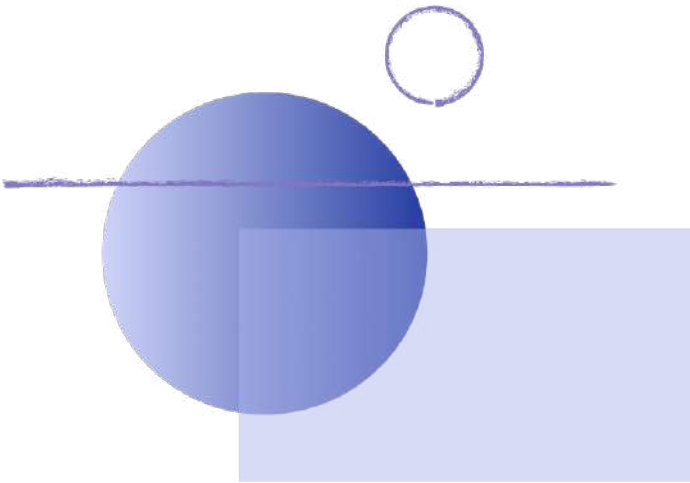


越牆頂，不只是物理位移，也是對校內秩序的日常質疑。牆與逃逸邊界的曖昧張力，具象化為可觀看的翻牆地景，透過在學生、校友、校方、社群與媒體的不斷敘事補充，一再強化了對「自己人」的召喚與認同。翻牆地景的張力在於，它既凸顯了封閉邊界的排除機制，也展示了身體流動的解放可能。沒有翻牆／爬牆經驗就不算建中人？當然這並非事實，而是將「建中生認同」定錨於跨界與反叛行動的一種凝聚機制。以身體丈量而生成的動態地方感，這份逃逸的地方，深藏於每個擁有翻牆經驗的身體書寫中，也不斷因此串連著過去與未來。

我們也必須提出省思，若相同的翻牆行為發生在一所普通高中、職校或偏遠地區學校，可能不會引來社群的討論、共鳴與媒體的浪漫書寫，反而更容易被視為「違規、脫序、不受教」，換來社群上的指責。現行絕大多數的高中職校，都有將「翻牆」這一類非正式進出校園行為列入「學生獎懲辦法」中，其懲處程度約落在一小過與一大過之間，並被實質執行。這也正顯示，建中作為明星學校，其學生的日常反叛行為反倒能被包裝為青春的象徵、一種「建中人」才懂的幽默傳統，並進一步成為文化資本的象徵。這背後，隱藏著不對稱的觀看體制與階級敘事：誰的越界能被稱許？誰的翻牆會被「地景化」？建中圍牆的「可見性」，不僅是地景的展演實作，更是社會權力運作的縮影——「翻牆」看似人人可為，但唯有在特定場域中的特定身份翻牆者，其身體實作才有資格被觀看、被懷念、被書寫。

建中翻牆文化所構成的地景，並非純粹由物質邊界與身體行動構成，而是在教育資源分配、媒體能見度與眾多深厚社經資本校友帶來的文化話語權中，被賦予不均等的觀看地位與象徵意義。建中生翻牆之所以成為「地景」，是因其行動被社會選擇性地觀看與記憶；而翻牆者之所以能建構地方感，是因其身分與場所被置於優勢階級的敘事中心。這

樣的翻牆地景，提醒我們地景從來不是公平的空間舞台，必須反身性地覺察存在於空間之中的權力配置與層層形塑的不公 (Zukin, 2010)。透過揭示翻牆地景生產中的階級與權力差異，我們得以進一步反思：誰有權翻牆？又是誰有資格被記住？



參考文獻

Barthes, Roland. (1991)〈艾菲爾鐵塔〉，收於李幼蒸編譯《寫作的零度：結構主義文學理論文選》(pp. 156-168)，臺北：時報。

Cresswell, Tim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Cresswell, Tim (2006) 中譯本《地方》(徐苔玲、王志弘譯)，臺北：群學。

Wylie, John (2007)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中譯本：《地景》(2021) (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新北市：群學。

Zukin, Sharon (2010)《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新北：群學。

旭日聯合事務所 (2009)，建國中學亮麗圍籬工程，取自：<https://reurl.cc/xN8jV5>。(取用日期：2024年6月2日)

臺北市立建國高中校友會 (2021)，博學講座「今天萬安不演習」，取自：<https://reurl.cc/AMImp8>。(取用日期：2024年6月2日)

@tw_coconoao (2024)，哪個建中學長出來說說，取自：https://www.threads.com/@tw_coconoao/post/C-_vgEtSj23。(取用日期：2024年6月2日)

宋東彬 (2009)，同學別再翻牆了！ 建中試辦外出午餐，TVBS新聞網，取自：<https://news.tvbs.com.tw/life/132472>。(取用日期：2024年6月2日)

陳韻平、郭文海 (2014)，畢業35年賴清德首度回建中，民視新聞報導，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8MMkULlzM>。(取用日期：2024年6月2日)。

受訪者清單：

受訪者A	2012年入學建中
受訪者B	2012年入學建中
受訪者C	2005年入學建中
受訪者D	2014年入學建中



▲「相同但不同」2025春分集體行為主視覺
(來源:阿川行為群活動頁)

行為藝術的 臨時性空間生產和 微觀政治： 「相同但不同」2025 春分集體行為分析

◎ 撰稿：曾曉渝 | 審閱：張維哲

一、前言：一場只發生在此時此地的遭逢

國際黑市也是遭逢(encounter)的藝術。我們從來沒有一個主題；作品根源在於開放合作。每一個表演必須創造出一個特殊的複雜時空，挖掘出遭逢的結構，如此我們才能收復擁有空間並拉住那形成它的隱形連結(Black Market International, 2006-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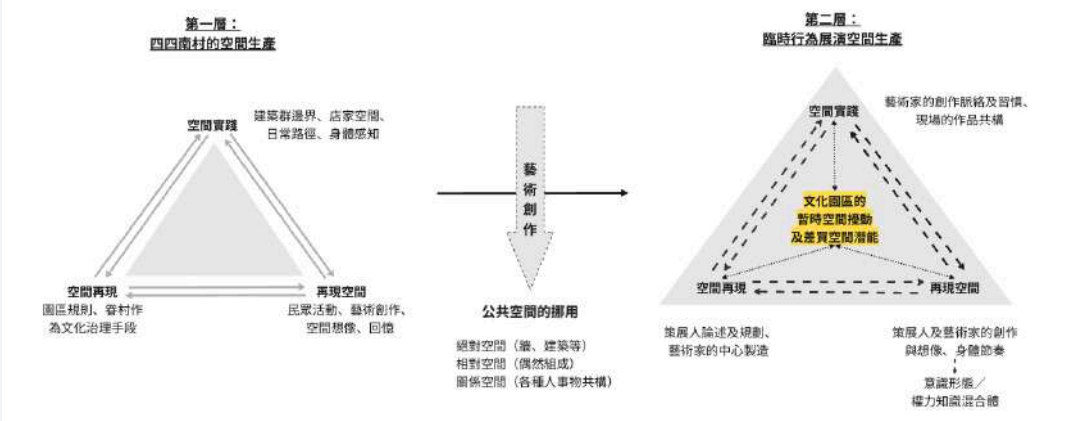


2025年3月8日，11位藝術家於臺北四四南村參與「相同但不同」春分集體行為展演，藝術家散落各處，既專注作品又即興地與人群產生各種互動。主辦方阿川行為群說明活動乃「每年的春/秋分，全球晝夜持續時間大致相同……為在公共場所一起以行為藝術創作的人們，提供了全球性的聯繫」。

臺灣的行為藝術歷經時代變遷，80到90年代「以邊緣的姿態游擊於主流空間」(姚瑞中，2004: 4-5)，經典作品曾於西門町、拉票的街頭展演(姚瑞中，2005)。行為大多不具戲劇結構和敘述性，一次可能持續數分鐘或數小時(Goldberg, 2001:9)，而除了物品的活用，身體更是「藝術家最熟悉的武器，逾越傳統的規範與禁忌」(練捷明，2009:15)。鄭美玲(2019:253)強調集體行為「像隱形的線頭與其他同時發生的行動綁在一起，形成一個似亂有序的分型結構」。

列斐伏爾的概念三元組因而特別適合分析如此複雜面向的空間生產。空間實踐(感知空間)，指涉社會生活據以生產和再生產的時空慣例和空間結構；空間再現(構想空間)是科學家、規劃師等以構想方式所概念化的空間，是知識與符碼的系統；最後再現空間(生活空間)是居民的使用和想像之所在(Lefebvre, 1991:33, 38-9)。

參考Harvey(1973:13-14)三種空間存有論，筆者把展演空間如此劃分：四四南村是藝術家與策展人創作的基礎，它與臨時性的展演空間，形成了相對空間的關係。絕對空間如牆、橋、街道等，也是影響藝術家作品最終呈現的重要元素。另本文因行為藝術展演場域的臨時性、人事物偶然匯集的特質，以及空間的歷史脈絡，指出當下形成的臨時性場域乃



▲ 圖1 本文論證架構 (來源:筆者繪製)

關係空間。本文將把四四南村及臨時性的展演空間分別指認為兩層次的空間生產，便於後續分析，並突顯展演空間的臨時性和在四四南村的日常基礎之上進行展演的特殊狀態，而本文將聚焦臨時展演空間的部份，如圖1。

本文透過空間生產分析試圖回應作為邊緣的行為藝術，如何突破資本主義社會空間，以及暗藏之權力關係。先從「相同但不同」集體行為對四四南村展演場域的意識形態的反叛與挪用開始探討空間實踐與再現空間的動態關係，展開本案例空間生產的討論。其後本文將分析內部的辯證張力，最後討論現場及身體為主要媒介的行為藝術推動差異空間的潛力。

二、意識形態的反叛及挪用：公共空間、身體與物件的鏈結成網

本次行為展演的場域為臺北四四南村，場地為策展人黃彥超與李瓊蝶所選擇，並未經正式申請。四四南村在民國八十八年變更為公園用地後成為舉辦活動的開放空間及市集場地，前身為四四兵工廠旁的眷村。韋昕華(2021)與施長安(2003)就指出媒介與制度將眷村經驗選擇性再現，成為地方政府文化治

理與認同政治運作的展演場域。作為治理成果，該園區反映著進步及消費地景的意識形態，民眾也會相應地被要求遵守場地規則以及潛在的身體規訓。以下將分析行為過程中的空間實踐與重製再現空間的動態關係，而參與者分別為藝術家和觀賞民眾。

(一) 藝術家的實踐與想像再現

參與藝術家在事前大多會參考策展論述再規劃自己的作品。但行為藝術沒有劇本與充滿不可預測性，藝術家大多只會先計畫多種物品材料及場勘，並構想大概流程。空間實踐具有例行活動的意涵。可見於大部份藝術家多出身於藝術科班，也承繼了藝術創作的方法系統，如練捷明(2009)所梳理的1970-2007年的作品特質，也可參考鄭美玲(2019)分析一次集體行為展演所使用的架構，分類包括分歧世界的匯聚、政治化的身體、個人／人際儀式、互動交流及場域會說話。作為上述補充，巴特勒的「操演」(performativity)概念，提供了理解不斷操演而形成的認同及「效果」的理論視角(Butler, 1990:33)，形成非先驗存在的一些形式。以上藝術家在展演場域的中的普遍空間實踐，也當然內蘊在這次現場與物質空間結構互動的身體感知及展演慣性中。



然而，我們更需要體認到行為藝術的每件作品也是與身體、觀眾、物件、絕對空間中的物理環境的共構，因而組織成獨一無二的現場。展演現場的歷史象徵意義，同樣是編織部份藝術家作品重要的創作背景。四四南村的脈絡與軍事相關，並且在區位上與城市品牌象徵物台北101接近，因而出現具戰爭或和平涵意的作品（李瓊蝶、Florence Lam、曾曉渝等人），等同是對建構的眷村文化的再次挪用。

此外，藝術家的身體作為在此治理場域中不適切的主體，出現在此建築群，並破壞著整潔和美好的想像（物質層面上，各藝術家甚至會使用不同物料並散落場地），開展著與物、場域與群眾的關係，以個人身體召喚關注，本身就是種對官方建構的都市治理意識形態的一種反叛。當作品現場在行為藝術的邊緣脈絡下經藝術家轉化為抵抗的空間，也就成了充滿想像、情感及再身體化的再現空間。

作品所編織的網絡，以及藝術家反覆操演的創作脈絡，與展演場域的歷史共同再現著空間，疊加了意義。但同時，作品創作的過程，也與藝術家的身體實踐與想像反覆作用著。

（二）參觀民眾的日常建構與突破

在創作過程中，藝術家經常透過現場互動與參觀民眾（路人與特地前來的觀眾）建立短暫的關係。例如李瓊蝶用曬衣繩串連民眾的衣服以表達反戰訴求、黃彥霖把飯碗放在相機穩定器上並迴盪在眾人面前以自嘲是「要飯吃的藝文工作者」等。當檢視四四南村的日常空間實踐，參觀民眾或路人可能都有既定的路線，甚或想像使用這空間的方式，例如草地上休憩、逛市集等，都暫時受到藝術家及作品的擾動，並被迫打破了對此空間甚或主流論述中的感知及認知。部份民眾露出疑惑目光，但也有民眾選擇佇足觀賞，不論哪一種，大家都成為了作品網絡中的一部份。當民眾成為觀眾，便出現了溝通的可能，例如成為深刻記憶、共同參與作品創作等。



▲ 圖2 Florence Lam作品（攝影：應學堂Nelson IN）



▲ 圖3及4 散落各處的作品（攝影：應學堂Nelson IN）

三、集體行為的空間權力動態：中心與邊緣

藝術家在集體行為中擁有隨時進出互動與他人作品的能動性，因此展現出行為藝術的即興特質，而所有作品的同時性，加上建築群在物理空間呈現的擴散形態，也理應象徵著一種中心的破除。然而在歷時三小時的展演後，阿川行為群創辦人葉子啟與藝術家在分享時，卻不約而同指出了這次展演因為某些藝術家使用的媒材及佔用的空間尺度而意外形成了觀看的中心（例如曬衣繩的橫跨尺度以及所需的觀眾投入），並指出這是集體行為應避免的狀況，因為這即剝奪了其他邊緣作品被看到的機會。這種非因語言法則而形成的秩序會否轉變成另一種空間再現，以身體及作品形交織成的禁閉與開放空間，值得觀察。

四、結論：行為藝術家作為擾動空間的魔術師

本文同時旨在提出公共空間中的行為藝術推動差異空間（differential space）的可能。當列斐伏爾（Lefebvre, 1991）指出從絕對空間到抽象空間的

演變歷程中，展現出去身體（non-body）的特質，行為藝術作為身體必須在場的藝術形式就有其必要性，同時凝結了情感、想像、時間、空間與各種人事物。這次集體行為是對資本主義空間商品化和再魅化的一次挑釁，即均質化領域外的「對抗性空間」，以身體佔用和發明新空間形式。就如呂佩怡（2024:17）指出藝術作為戰術媒介，「脫離常規、令人困惑、曖昧、模糊的特徵，這些特質可以創造可感知的空間，讓藝術家與觀眾在此空間之中擁有詮釋的自由」。甚至意外地以身體銘刻了消失的地景，策展人黃彥超（2025）就書寫了有關2024年在兩備方案和平新生天橋進行的春分展演，「身體記憶的殘影，我們就像是天橋上的魔術師，將那一個多小時的行為時刻，加密凝結成為一個具特殊意義的集體時刻」。

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行為藝術在此只是一種暫時的擾動。當差異空間強調的是使用價值的回復，我們需進一步深思藝術創作的使用價值為何，何以引導眾人反思交換價值為先的社會？但筆者認為正因行為藝術的多維度媒介，具備連結與逾越傳統的特質，也因此拉近了形成差異空間的距離。也就是當行為藝術試圖聚焦城市權的議題時，必須推動得更深更遠，甚至持續連結其他社區力量，共同佔領空間，例如「貧窮人的台北」的倡議展覽、或過去「大猩猩游擊隊」的佔領形式，避免成為小部份菁英的消費美學。而當我們說行為藝術是邊緣意象，此藝術類型置放於全球及在地藝術市場中，會出現何種資本主義社會的利益與權力，並框限了行為藝術的反抗潛能，這有待後續研究。



▲ 圖5 意外形成的中心（攝影：應學堂Nelson IN）

參考文獻

- Black Market International (2006-2008) liveartwork editions, (https://www.liveartwork.com/editions/full_bmi.htm), 2025/4/14.
- Butler, J. (1990) *Gender Trouble*. New York: Routledge.
-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London: Edward Arnold.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Goldberg RL. (2001) *Performance Art—From Futurism to the Present*. London: Thames & Hudson.
- 呂佩怡 (2024) 《「藝術／運動」作為公共平台：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台北：典藏藝術家庭。
- 姚瑞中。(2005)。〈行為藝術搞什麼鬼〉。《中國時報》。
- 施長安 (2003) 〈都市保存：後殖民都市政治系譜學〉。《城市與設計報》13/14: 395-409。
- 韋昕華 (2021) 《眷村空間保存的文化政治與歷史記憶重構》。台中：海大學建築系碩士論文。
- 黃彥超。(2025)。〈無題〉。個人Instagram。<<https://bit.ly/3UICfEm>> 取用日期：2025年4月14日)。
- 練捷明 (2009) 《台灣行為藝術的淵源與特質》。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論文。
- 鄭美玲 (2019) 〈阿川2017 多歧異行〉。《中外文學》48卷3期: 231-255。

BP's Picks

城鄉所靈感清單

每一期我們將邀請受訪老師與校友跟我們分享最近的靈感來源，也許是一本書、一部電影、一首歌，又或是一個展覽。

劉昭吟學姊

劉可強老師

劉柏宏老師

劉可強老師 x 劉昭吟學姊

❶《大風之島》| 導演：許雅婷
導演用20年的時間，記錄了樂生保留運動從最初抵抗拆遷，到如今走向重建的過程。本片榮獲2025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



(提供：許雅婷導演)

❷《早安孟買 (Salaam Bombay!)》| 導演：Mira Nair
《早安孟買》講述了一個印度底層社會的小孩一天的日常，從這部電影可以看見印度底層社會的生活狀況，揭露出底層的街頭生活以及貧民的生活困境。老師希望同學們藉此認識導演Mira Nair的兒子，即下一任紐約市長的熱門人選Zohran Mamdani，他的社會性倡議已對美國政壇引發很大的衝擊。老師認為，透過這部電影或許也可以看見Mamdani受其母親啟發的影子，因此強烈推薦這部電影。



(來源：維基百科)

❸《作為方法的空間：嘉庚故里模式語言》
作者：劉昭吟、張云斌 |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劉昭吟在書中使用了《模式語言》的方法及框架，透過長時間的現地考察、訪談等方式，從中國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大社（為著名華僑陳嘉庚的故鄉，故稱嘉庚故里）的空間形式中提取並整理出了30個不同的模式。奠基於《模式語言》的影響與構框，本書更深入分析了地方模式形成的原因以及其形塑的社會關係與意義，讓我們對社區公共的想像更多元且有活力。本書已於聯經書局上架。
「在裝幀設計上也有許多的巧思，我與此書的編輯團隊期望讀者在這本書中感受到空間的複雜性，從圖去感覺到身體、感覺到空間。而且封面設計以插畫風格繪製，嘗試跳脫以往較為呆板的學術作品。」——劉昭吟學姊



(提供：劉昭吟)

劉柏宏老師

《道法自然進行式》(Design with Nature Now)
作者：艾倫·M·伯格等22人 | 出版社：田園城市
本書回顧過去50年生態規劃思想的重要著作《道法自然》(Design with Nature)問世對道法自然理念發展的影響，以及如今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應對的永續設計方向。
「我們在做規劃、設計與環境的工作時，現在我們要回到最古典的概念——用自然的方式來進行環境設計，讓環境在人的使用之下，也能更友善地容納生物多樣性。臺灣人口逐漸減少，我們有機會讓環境變得更友善，讓更多生物與人能夠同時在這個環境裡生存。我比較偏愛景觀這個專業，因為它的尺度比較大，但更需要有自然這樣的核心與關鍵。這個概念不只適用於景觀設計，城市規劃也是一樣。我現在做公園設計和開放空間時，都盡量用這樣的概念，讓城市空間更好，例如現在在做的臺北降溫策略，其實就是『design with nature』的實踐。」——劉柏宏老師

相關議題這邊看……

關於實習課，那些年的爭議、創新與變革。

No.17_2019 秋季號 〈專題報導：城鄉所介紹〉

所上學生在106學年度之初，發起「課程改革小組」，提供系統性的意見供所上老師參考，而老師們也積極回應，並在107學年度嘗試落實改革方向。該期編輯群訪問了教師、學生(修課學生與課程改革小組)，檢視一整年改革的成果。



▲《城鄉通訊》第17期封面及內頁